

周恩来总理纪实



序

罗青长

周恩来总理故去已经十多年了，然而，千千万万的人们仍从心底深深地呼唤着他，怀念着他。

周总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誉满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建党、建军、建国的创始人之一。他革命一生，多次遭遇惊险危难，但他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超凡的智慧、渊博的知识、灵巧的斗争艺术。在危险局势面前，他总是以大无畏的气概，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处险不惊，舍己救人，常常勇敢沉着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据粗略统计，周总理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所遇险境达 20 多次，本书所记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当前众多的缅怀周总理的影视和书刊文章中，很少写到周恩来同志遇险和脱险经过的。毛崇横、何谦、成元功、高振普、赵桂来等都是做警卫工作的老同志，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总觉得不把自己耳闻目见或亲身经历周恩来同志多次险遭不测、化险为夷的经过写出来，公诸于世，便对不住周总理的教育，也有愧于后世。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邓大姐和他们原所属单位——中央警卫局的鼓励与支持，以及过去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赞同。1988 年他们开始写作，走访当事人，实地考察遇险地点，查阅资料，得到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他们态度严谨，在撰写过程中，坚持历史的真实性。1990 年在大型文学期刊《啄木鸟》陆续发表几篇之后，获得了邓大姐以及当年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首肯。同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不料毛崇横同志脑血管病突发，未竟全功，不幸英逝，我深表悼惜。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九十五周年诞辰。根据出版社的建议，他们决定将前后已经完成的十三篇，连同邓大姐 1988 年撰写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先行付梓出版。为此，我谨向作者表示祝贺。同时，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希望学习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革命精神，珍惜今天的中国来之不易，使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所启迪，对今天的安全保卫工作有所借鉴，是为序。

1993 年 6 月 5 日

从沙面射来的枪弹——记周恩来沙基遇险

赵桂来

渊薮

周恩来这次遇险发生在“沙基惨案”中。

周恩来生前曾向我们警卫人员谈过他两次遇险的情况：一次是我将在《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一文中所介绍的，另一次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沙基遇险。

“沙基惨案”发生于1925年6月，当时年仅27岁的周恩来，正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沙基惨案”是英、法等帝国主义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事件。

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也奋起罢工，声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23日，广州的罢工工人、农民和学生10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支持和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街的时候，早已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枪猛烈射击，致使游行群众50余人当场死亡，170余人受伤。当时一左一右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两位同志，第一排枪响，即被帝国主义军警的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倒在血泊中，周恩来幸免于难。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

沙基街位于广州城城垣的西南角。这里原本是个荒凉的河滩，自对面的沙面岛“繁荣”起来之后，才沿着河滩建起了一条西式街道。这条街道与沙面隔河相望，相距不过50至100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木桥，与沙面相连。“沙基惨案”后，革命政府为铭记国耻，已将其改名为“六·二三街”。

沙基街对面的沙面，原来是个小渔岛。沙面的南面是珠江和白鹅潭的汇流处，北面有一条小河汊，与沙基街的陆地相隔。现在的沙面，已成为广州市的骄傲，这里街道宽阔，树木苍郁。现代化的白天鹅摩天大楼直插云天，就像广州市高高扬起的改革开放的风帆。

但过去，这个渔岛却是帝国主义圈定的殖民地，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志。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入侵者就看中了这个可以由水路直达的小岛。他们贿赂清廷广州府的官员，以此作为“夷人”的“居留地”，允许他们在此居留和他们的商船在此停泊。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占领了广州及广州附近许多城镇，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屈服议和之后，英法联军才在1861年退出广州。但这个小岛及小岛附近的水域并没有交还，作为租借地硬扣下来。到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时，这个小岛已被他们整治成可以代表“西方文明”的橱窗。他们不但在这里设了政权和管理机构，建了英、法、日、葡领事馆，开办了许多外国企业，还修造了当时看来相当豪华的维多利亚大酒楼。许多富豪就是鸦片战争前被欧洲人和亚洲人称之为“海盗”的人。这些海盗，一

种是属于某国政府的，另一种则是当时所谓的冒险家们。当时他们合伙入侵，大肆抢掠，如今早已变得“文明”起来，成了“国中之国”的官方武装力量。在岛上为他们服役的中国人，不但备受虐待，而且进出小岛要持有他们颁发的证件，以及检查搜身。

小岛虽是弹丸之地，但它的辐射力却非常大，辐射面非常广。广州的官府、广州的社会都被它以高速和高效能地扫描着。他们自信已创造出一种新“模式”，即半殖民地的形式，可以收到统治印度、来律宾、印度尼西亚那种殖民地模式的同样的效果。这种模式，始于清王朝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从未有过失败的纪录。但是，自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帮助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增添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实现了国共合作，帝国主义者感觉到与过去不同了，他们的“西方文明”屡遭失败。他们敏感地感到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而且是发生在西方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派兵企图扑灭列宁在俄国的革命失败之后。他们深深感到这是继俄国之后，在东方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险情，于是把这种险情概括叫“赤化”。

当时，一位英国人曾著文分析说：广州已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国民党已经有一种共产主义的趋向。军事学校已经在黄埔建立，学生由俄国军官训练，一般说来抱有俄国的观点。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发展到加入抗议“五卅案件”时就尖锐化了。

广州是他们侵略中国首开纪录破门得分的地方，他们要将这一得胜纪录保持到终场。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破门得分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武装方式。于是，1924 年 10 月间，在广州城发动商团叛变；1925 年春支持陈炯明攻打广州；1925 年 5 月唆使据守广州城区的滇、桂军阀头子刘震寰、杨希闵兵变。“沙基惨案”就发生在 6 月 12 日平息滇、桂军阀头子的兵变之后，两者相距只有 11 天。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西方帝国主义者一再叫嚷“孙中山赤化”、“广州赤化”，似乎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永远保住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保住中国这块国土庞大，物产丰富的半殖民地。

当然，那位英国人说“赤化”是别有用心，但是 1925 年广州确实曾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许多共产党人曾经来过或集中在广州。其中著名的就有：李大钊、彭湃（时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苏兆征、杨匏安（时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董必武、谭平山（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林伯渠（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吴玉章。此外，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还有聂荣臻、肖楚女、熊雄等。

弄潮

周恩来是 1924 年 9 月初，奉党中央调令从欧洲回到广州的。回到广州后，10 月便被委派开始组建中共广东区委，并任区委员长兼宣传部长。接着又到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11 月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是这年 6 月建立的，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国民党左派主要领导人

之一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来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襄助他工作。廖仲恺对当时年仅 26 岁的周恩来，非常器重，曾在家对他 16 岁的儿子廖承志介绍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广州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不再听任帝国主义宰割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也是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最光荣的阶段，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的最佳年代（可惜好景不长，1927 年即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所破坏），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并掌握一支武装力量的开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周恩来。

1924 年冬，黄埔军校第一批学员毕业，组建了两个团，周恩来在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连队国民党党代表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除此而外，由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提议，经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同意，还组建了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共产党人徐成章和周士第担任队长。车队的活动直接由区党委和周恩来领导。铁甲车在当时是攻坚和防守的最先进的装备。党史权威著作认为，铁甲车队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而且是现代化的武装。

笔者为写本文收集资料时，在广州有幸拜会了当年铁甲车队的队员现在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魏鉴贤老先生。据魏鉴贤老先生说，那时外国的铁甲车还没有运到，队员先学驾驶汽车和军事，车子一到，就能参加战斗了。笔者认为，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是看得很远的。

1924 年 2 月，周恩来回国前、在巴黎的《赤光》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鼓舞革命青年要冲上前锋去做弄潮人。他说：“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做弄潮人。”他 9 月回到国内，10 月就参加了平息商团的叛乱，次年（1925 年）3 月又参加了黄埔军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进攻，6 月参与了粉碎滇、桂军阀在广州市内发动的叛乱。我们想，这时平生第一次投身戎伍的周恩来，是充分领略了在武装弄潮中的那种特有的风味的。

1925 年 1 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对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作了决议，要求猛力开展群众运动。也就在这次大会之后，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对中国民众大出杀手。这也许是他们从以海盗方式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时起，一贯沿用的对付群众反抗的“传统经验”。这年 4 月 8 日，美国军队在福州开枪杀伤数十人；5 月 28 日，日本军队在青岛包围工厂，开枪打死打伤 20 余人，捕去 70 余人；5 月 15 日，日本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枪伤 10 余人；30 日，英国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捕去 100 余人；6 月 1 日以后，英、日、美帝国主义又出动军舰，陆战队布满上海，对工人、学生大捕大杀，死 66 余人，伤 70 余人。

生活在帝国主义炮口下的广州人民，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五卅惨案”发生后，对帝国主义的暴行，群情激愤。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陈延年和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党在广州工会的负责人苏兆征、邓中夏，决定 6 月 19 日举行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为了组织好这次罢工、罢市，6 月 18 日在广东大学召开了由广州各界 120 个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会上，各界代表愤怒声讨了帝国主义近年来在华的暴行，并决定成立“广州各界对外协会”，隆重推举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为协会主席，还决定以抗议“五卅惨案”声援上海工人和支持“省港工人罢工”名义，于 6 月 23 日上午举行 10 万余人的集会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军队列队参加，

廖仲恺为大会和游行总指挥。

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自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若干年后，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这场斗争。他说：当时我从黄埔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6个连——每个团的一、四、七三个连，组成了一个营，从（国民党）党军里同样再抽调两个营去参加这次游行。要党的骨干去带领。周总理在这里没有提到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也参加了游行，很可能是一时忘记之故。据魏鉴贤老先生的回忆和资料记载，那次游行示威，铁甲车队被安排在在讨逆中屡建奇功声名大振的黄埔学生军和党军队伍的后面。而这种安排，可能是周恩来把它看做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的缘故；因为他可以直接领导这支铁甲车队。

对周恩来决定抽调黄埔学生军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无奈国民党中央党部已正式通知他，要黄埔军校参加，欲阻无法，也只好装装左派的样子。到23日那一天，游行他没有去，连集会的会场（演说）也没有去。只是在黄埔学生和党军发生严重伤亡之后，才在以他的名义写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呈文里，指责了一下帝国主义的暴行。

蓄谋

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在沙面的军警，突然开枪射击，残杀游行到对面沙基街的队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行动。他们害怕中国革命。害怕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赶走他们，害怕摧垮他们凭借中国人民的尸骨在香港、沙面建筑起来的所谓西方现代文明。他们设在沙面的英、法、日、葡领事馆，早已知道上海、青岛、福州等地中国平民的不停的“骚乱”。也早已知道6月18日广州120个团体的集会和决议。广东和香港外国工厂的中国工人19日开始罢工，23日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军警全体支持并参加。在对付清王朝时就已联合起来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对当前广州群众日益高涨的反帝情绪，自然惶惶不安。英国沙面总领事詹美逊与其他三国（法、日、葡）领事频繁协商，制定了一系列比上海、青岛等地帝国主义屠手们更富有西方高度“文明”特色的办法。

6月22日一早，詹美逊代表英、法、日、葡四国政府，向广东革命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我从可靠资料获悉，而我也理由相信，安排在明天的爱国游行的学生分子中准备进攻沙面桥，侵入沙面，而企图成为烈士。”我“庄严地警告广东政府，如果任何企图入英国租界沙面，将会引起武力抵抗，而其后果将由你们政府负完全责任”。“照会”最后说：“我写的语气很严重，以便将来不致有人再说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无辜杀死毫无防备的中国青年。”

这份“照会”，可谓是世界外交老手大英帝国的高水平之作，他给广东革命政府打来一个无法接的擦边球，看你怎么办？第一、它送得不早不晚。你不是筹备好明天游行吗？我今天给你送来，叫你收兵不成，不收也不成。第二、“照会”言辞彬彬有礼，满腹慈肠，却又将消息说得准确无误，把责任踢给你。第三、它并不讲反对你举行反帝游行示威，而仅仅指出你“侵入沙面”。第四、他们是与“广东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与当时的合法政府北平北洋军阀政府打交道，第五、最后一段话，其讥讽、其恶毒、其刁钻、其

阴险，可以说是集帝国主义文献文明之大成。它说明我的屠杀决心已定，看你怎么办！这是恶人先告状，杀人者有理。

他们开枪杀人的计划到底是怎么部署，我们无法找到他们的档案资料，不过，从当时广州的报纸刊载的一些报道上可窥见一斑。其中一家报纸写道：“22日沙面东西桥铁闸完全关闭，并派水员登陆，所有沙面之重要地点，高筑沙包，如临大敌。又，是日上午11时许，英国浅水舰罗便号驶入我华界同德大街海面寄碇。又，是日下午2时，有日本兵舰两艘驶进白鹅潭水面。统计现湾泊沙面之外国军舰，英国三艘、美国两艘、日本三艘。”

这大概就是詹美逊与其他领事频繁协商密谋的主要内容。

詹美逊22日递交的“照会”，其实19日他们就封锁了沙面东西两桥，即使持有通行证的中国人也一律禁止入内。岛上的妇女儿童，一些去了香港，没走的也搬到船上去居住。

看来，他们还是怕中国人民！

侵略者既然已经把箭搭在弦上，那么射谁？怎么射？什么时候射？他们事前的计划机密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但随后随着疯狂的屠杀行动便全部曝光了！

沙基屠杀的第二天，詹美逊在代表英、法两国政府答复广东革命政府的抗议书时，就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他说：英、法租界仅仅是为了对付来自沙基方面中国军队和军校学生的进攻而进行的武力自卫行动。他所说的“自卫”纯粹是谎言，但也供出了他们的射杀目标，是事前就进行了选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惨案死难的50多人中，黄埔学生军和党军就占24人（许多资料中说是23人，而校长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呈文中则说是24人，此处按蒋说——笔者注），受伤的170多人中，黄埔学生军和党军占53人。后面还有记载可资佐证。

血火

6月23日这天，是夏至后的第二天，广州的太阳从头顶直射，可说是落地无影。虽然未近中午，但早已炎热得如火烤笼蒸。

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反帝示威大游行的会场，设在东校场。大广场设总会场，因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将总会场又分成为三片，各设一个分会场，每个会场都有主持人和演讲人。军警界划在一个会场。总会场的执行主席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由他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文告，支持这次集会游行的是代理大无帅、广东省长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演讲的是廖仲恺。各界也都有自己的代表发表演讲。军警界分会场，则由汪精卫、周恩来、何应钦等人主持。23日午时，周恩来和我党在黄埔军校的几位骨干，就率领黄埔学生军队进入了军警界分会场，党军师长何应钦也率领党军队伍进入分会场。

1988年，笔者访问已84岁高龄的魏鉴贤老人时，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集会那个雄壮的日子。他深情地回忆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是陆海军大无帅府铁甲车队队员，队长是周士第（周士第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我军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授上将军衔，1979年去世——笔者注）。那年我20岁，对周恩来早已闻名，但没有机会看到他，我是站在队列里，经别人指点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当时“他站在主席台上，整齐地穿着一身黄

埔军校的黄色军装，缠着武装带，打着裹腿，不时有人找他说些什么事情，他的样子很突出。他在黄埔、在东征、在平息杨、刘叛乱（即滇、桂军之乱）中，名声特别大，所以我印象很深。”

集会在下午1时半完毕，10万人的队伍，开始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香港罢工工人的大队走在前面，其后按顺序是工、农、商、学、兵。每个人都臂缠黑纱，以示对上海等地被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哀悼，手里执着红旗，红旗上写着口号。军警队伍每四个人为一列，按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堂学生、党军第一师，黄埔学生军次序行进，铁甲车队殿后。路线两旁，布置了荷枪的军人维持秩序。（何应钦没有在队列中亲率党军，而是高骑大马，由数骑簇拥，和几位军警首领走在整个军警界大队的前头）。他们是为向帝国主义显示自己的力量，为庆祝东征陈炯明的胜利，庆祝平滇、桂军的叛乱，为党开始获有武装力量，以阔步雄姿出现在这次革命高潮之中的。

这天尤为壮观的，是革命政府的两架飞机，不时在游行队伍的上空飞上飞下，投撒彩色传单。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

下午3时20分，队伍行进到沙基街，面对近在咫尺的沙面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们意气风发，情绪激昂，呼声震天，脚步撼地，铁臂如林，扬中国人之眉，吐中国人之气！

然而就在这时，盘踞在沙面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强盗举起了屠刀，再一次开始血洗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人民。排枪声、机关枪声骤然大作，如雨般的子弹射向游行的人群。与此同时，停泊在白鹅潭的强盗军舰，也开了炮，炮弹在街面的人群中和建筑物上爆炸。站在街道两旁观看的人群和游行队伍，秩序顿时大乱。

由于帝国主义的屠刀是直接冲黄埔学生军和党军来的，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自然首当其冲。第一排枪响，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同志，左侧的一位，右侧的一位，当即被帝国主义的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扑倒在革命行进的前列！周恩来听到枪响，当即和同事们匍匐在地，迅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

面对帝国主义强盗的屠杀，他们既没有攻击的任务，也没有还击的命令，只有怒火沸扬，恨不得把沙面烧掉！

周恩来这次之所以幸免于难，笔者以为：一、可能与他当时思想上对帝国主义警惕有关，因为他知道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帝国主义强盗都是突然开枪的；二、可能与他左侧的同志有关，左侧的同志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射向他的子弹；三、迅速匍倒并转到后巷。

帝国主义强盗开枪射击的主要目标，是黄埔学生军和党军，铁证如山，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据魏鉴贤老先生说：我们铁甲车队走近东桥之时，枪炮齐鸣。我队便行隐蔽，没有伤亡。约有一个小时，枪炮声才停。上级命令我队到沙基街救护死伤人员，因为下了雨，满街是血水。我们个个都是热血青年，对身遭国耻气愤万分。当时受命在沙基街维持游行秩序的广州警察第九医署署长、分署长、署员，在事后呈报的公文中说：“（下午）三时廿分钟，巡行大队前队已过八、九，工人、学生已转入内街时，对面（沙面岛）外人忽已躲避不见。（黄埔）学生军将至西桥，正到沙基调元街口之际，沙面维多利亚酒店（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大厦——笔者注）楼上，不知何故竟开枪向巡行队伍射击。而英工部局（那阶建筑中的洋兵）一闻枪声，即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射击，未几何时，对面射击之枪声如串炮，白鹅潭之外国兵舰，更

开炮向北岸遥击。”

何应钦是骑马走在写警队伍前面的，他说当时已经和队伍的前段转入内街：“当巡行经过晒桥沙基向栏杆街前进时，予在先头部队，正发令暂停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之际，卜卜之声遂由予之后面而来，初尚不料帝国主义者有如是之凶残，犹泰然疑为民家燃放炮竹也。”当时不少报刊报道，军界中伤亡者以黄埔学生和党军尤多。蒋介石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称：“军校入伍生死 12 人，伤 23 人，党军官长死 4 人，士兵 8 人，伤者 30 人。”

在这次惨案中，周恩来幸免于难，可说是万幸。邓大姐曾说：我在一个多月后从天津调到广州，任党的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这时才听到恩来说这段情况：枪声一响他立即匍下，在左右两旁的同志中弹牺牲了，军校队伍马上撤到后街去了。大姐深沉地说：那次恩来幸免于难。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帝国主义的屠杀，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这次惨案的发生，促进了省港大罢工的深入，7 月初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使这一运动坚持了 16 个月，将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对此，史学家胡华曾评论道：“省港大罢工促进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稳固，罢工工人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伟大支柱。如果没有省港罢工的斗争，1926 年的北伐战争是不可能的。”

· 作者附记 ·

夜泊话险

这篇《沙面射来的枪弹》和下篇《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两篇遇险资料，是依据周恩来总理在 1958 年夜晚船搁浅滩时，口讲的遇险情节以及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和采访有关人员写成的。

周总理为什么忽然讲起这两次情节，说来倒是一桩颇有兴味并且深有意义的事。

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清晰地记得这段难忘的情景：

1958 年夏，周总理从 7 月 1 日起，到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台山、开平、江门等县市视察了 7 天，去了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农村和居民家庭，还出席了会议，作了讲话。在当时南方特有的热浪里，周总理身穿短袖白绸衫，浅灰布裤，脚登圆口黑布鞋，手握折扇，头戴草帽，在群众中不时说着自 1926 年后已经生疏了的客家方言，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对经济文化发达的三角洲，大为赞叹。逝者如斯，周总理原定活动的时间已满，7 日晚间和随行人员离开江门市，赶回广州。

广东主人为周总理备好了电船（广东人对机动船只的称谓）。这是一只木结构的小船。为了使周总理夜间能够安静地休息，小船的马达并不启动，而由另一只电船在前面用绳索牵引。可见广东的同志们想得周到。

小船 10 点左右启航。船被太阳炙烤了一天，舱里的桌椅都还‘烫’手，没有风，十分闷热。无数小蚊虫从四面八方扑来，用扇子和手掌轰打不迭。不要说我们北方人忍受不了这种炎热，就是周总理也一样，在 7 天视察中我们虽然不断催促他去冲凉（广东人管淋浴叫“冲凉”），还是满身生了痱子，大片大片的红肿，这时在船上就更加作痛得难受。我们八九个人挤在船舱里，都巴望着航速能加快一点，早一点到达广州。

周总理本来是可以坐汽车回广州的，为什么他乘船呢？主要是珠江三角

洲到处是河湾沟汊，公路上架的桥又少。若乘车去广州，必须经过好几个渡口，要叫那些排队等候过渡的车辆、群众靠边让路，方能通过。广东的同志们知道周总理不会允许这样做，于是决定让周总理乘船，这样反而比乘车能早回到广州。

小船在港汊水面上熟悉地前进着，不料到了12点左右，前边的拖船加大油门，怒吼挣扎了几番之后再也不动了。驾驶人员断言，航道并没有错，是正赶上落潮，水位下降，因此搁了浅。原来，这三角洲大小河道的水位是随着珠江口外海潮涨落而变化的。航行无望，只有坐待涨潮。

四野漆黑，河网交错。船在什么位置？附近有无城镇？同行的广东省公安厅冠延庆同志等一时弄不清楚，焦急地上了岸，彼此轻声打着招呼，显然是在布置力量加强警戒。这也难怪，当时，台湾特务机关在香港澳门负责行动破坏的站组，不断制定计划，专程派遣运送爆破器材和选择破坏目标的特务分子，到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前不久，公安厅还曾截获到特务的计划。周总理在此活动多日，难免不为港澳的台湾特务分子侦知。他们如果采取行动，乘船偷渡，几个小时即可抵达这一带。因此，冠厅长他们自然不敢疏忽大意。

周总理了解这里的破坏和反破坏的情况，然而他说：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会在这里，不必布置，等候涨潮开船就是了。冠厅长他们虽然也相信敌特不会知道周总理就停在这里，但坚持说这里情况复杂。又说，我们不会打扰群众的，请总理放心。

总理这时指示说：你们搞警卫工作的人，没有理由到处担心出事，现在怎么能出现不安全的情况呢？这时，他就给我们讲了1925年他在广州遇到的两次险情：一次是“沙基惨案”那天，他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党军队伍参加游行。当行进到沙基街时，沙面岛上的英法军队突然开枪向游行队伍扫射，他身旁的两个同志中弹牺牲，自己立即朝地上一匍，没有被打着。另一次是两个月后，廖仲恺先生遇刺，他在宵禁中乘汽车回党军第一师司令部。蒋介石和何应钦把戒严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原来的口令作废并颁发了新的口令。当他的座车开到司令部门前，因口令不符突然遭到门卫的机枪扫射，当时，他朝座椅下一躲，没有打着，但是那位很好的司机和警卫员中弹牺牲了。这时广东随船的一位同志，凑到电灯跟前，掏出本子要记，可能是总理以为要在报刊上发表便摆手制止，说：这你不要记录。接着说：那两次都安然地过来了。那时广州的局势非常乱，目前广东总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吧。

大家听了，一时寂然。只有灯光微黄，蛙鼓喧哗。无论是我们随行人员，还是广东省公安厅的同志，谁都不知道总理当年在广州曾接连遭遇到这样的险情。据成元功回忆，总理当年在处置廖仲恺被刺案遭到门卫枪击的事，他曾在怀念为他而牺牲的同志时提到过，再就是在一次险遭车祸时提到过，此后再没有听到。

周总理讲这两次险情自然很简略，当时在场的人又不便细问，以致今天在撰写和整理《沙面射来的枪弹》和《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两文时，对那些牺牲的同志的姓名和许多重大情节都未能知道。真是不可弥补的憾事。然而使我们这些从事首长警卫工作的人得到最大安慰的，是终于把这些即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濒于泯灭的史料，得以整理出来，问之于世，将以永存！

找不到答案的枪击——周恩来遭蒋介石门卫枪击纪实

赵桂来

事情发生在 1925 年大革命已经到来的广州城。

1925 年 8 月 23 日，也就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中坚、共产党的挚友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骑楼门口连遭枪击，身中四弹殒命血泊的第四天，晚上 9 时许，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乘坐汽车去司令部。驶近营门时，守卫哨兵呼问口令，随即开枪射击。随身护兵中弹倒地。身已中弹的汽车司机，急忙调转车头开进小巷。周恩来大吼：“我是周恩来！我是周恩来！……”哨兵才中断枪声。

周恩来为什么在这天晚上遭到哨兵的枪击？是什么人下令干的？下面我将尽力把当时的历史镜头寻觅出来，重新推到读者的面前。

—

1925 年，沙基惨案一周之后，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将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军事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左派领袖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廖仲恺为常委和财政部长，仍兼国民党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当时是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将，国民党右派势力对他极为不满，一心要锄掉他。锄掉他的主谋是许崇智。许崇智是当时的粤军司令，他自恃是粤军的司令，国民政府的武装主力又是粤军，有军队在手，便纠集了一些人，半是公开半是秘密地在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家中开会，策划倒廖。会上，多数人主张把廖仲恺刺死，以绝后患。

倒廖会议先后聚首了 11 次，风声传出，汪精卫在 8 月间一次国民政府会议桌上，私下写了个条子给廖仲恺，告诉他：听说将有人对你不利，请注意。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当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面见了当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把有人要加害廖仲恺的事告诉了吴铁城，并提请吴铁城注意。与此同时，何香凝女士提出给廖仲恺加派卫兵。廖仲恺很不以为然，他说：那刺客要是装扮成记者或工人，派了也没用。当时，他只以为有人即使要害他，也只有暗中暗中进行，却没有料到右派势力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布阵，对他狠下毒手。

8 月 19 日，廖仲恺接到通知，要他在 20 日上午 9 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06 次会议。次日，廖仲恺按时到达。汽车在中央党部大楼门前停下，廖仲恺刚登上门前的台阶，就遭到了预伏在骑楼下的几名刺客的枪击。随身护兵开枪还击，展开了一场枪战。廖仲恺身中 4 弹，当即送医院抢救。

周恩来闻讯后，迳奔医院，见了廖仲恺最后一面。

廖案一发生，国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共产党人杨匋安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并担任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周恩来提审了被捕的刺客。刺客供认：“有人花费了几十万元买枪手，专门刺杀猛人。猛人为廖仲恺、谭平山。”还说：香港有人花 200 万元买凶手，刺杀共产党。

早在前一年，即 1924 年 10 月出刊的《向导》上，周恩来就曾用“伍豪”的署名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当前的急务是‘肃清内部’”。这时，他又写了《勿忘党仇》和《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两篇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指出：“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并主张处置廖案要同肃清革命政权内部的右派联系起来。他自己这时当然自觉地站到了肃清右派的前锋线上。

二

这时，国民政府能倚仗的武装力量，只有 8 月 25 日编成的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他既是黄埔军校校长，又是广州市卫戍司令和长洲要塞司令（长洲要塞为黄埔军校学生驻守）。他设官邸于长洲，邸前竖一大，上写一斗大的“蒋”字。他这年 38 岁，在江湖上已经厮混了 20 年，学了一手权术。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知道与粤军干系不浅，而粤军又正驻守在广州城内，便命蒋介石在全城实行宵禁，以防不测。蒋介石接到命令后，便下令立即出动，占领军事要地，实行戒严。许崇智见情况不妙，急调城外粤军入城，企图反扑，但为时已晚，城内粤军的军事生命线已被蒋所属部队全部控制，城外粤军入城的大门也被封死。

尽管如此，“廖案检查委员会”开展工作仍然困难重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乃倒廖的主要成员；汪精卫又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相威胁，反对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扣押胡汉民的主张。因此，一直到 8 月 24 日，一些主要案犯仍然逍遥法外。

8 月 24 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一起集议，决定在当天晚上加强戒严，组织兵力进行搜捕。他们决定开始戒严的时间为晚 11 时，内部联络口令为 × ×。

决定之后，蒋介石怕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刺廖凶犯又行逃匿，忽然念头一转，又多出一个心眼，独自召集亲信，更改了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戒严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并更改了原来的内部联络口令。

这几天，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奔忙。这时，国民党右派正在策划新的破坏，中间派动摇日渐明显，左派势力正在发展时期，需要他去忙碌；廖案检查缉凶，省港大罢工，需要他去料理。他乘着汽车到处奔波。这天，苏联政府为支援中国人民抗议沙基惨案的斗争派遣的“国际工人沙基惨案调查团”，又乘列宁号轮船抵达黄埔港口。那时真正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国家只有苏联，周恩来当然要代表革命人民和政府傍晚专程去港口欢迎。他很清楚，获取“沙基惨案”的全面胜利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到廖案斗争的胜利，而且对取得省港大罢工的胜利，也是一门重炮。

当晚 9 时过后，戒严缉凶的时间即将来临，周恩来与苏联使者匆匆话别，钻进汽车，急忙赶往司令部，督察部队行动。

汽车司机不但知道周恩来工作重要，尤其感到周恩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周恩来开车以前，他曾在洋人的工厂里做过工，吃过洋人和洋奴的苦，受过洋人和洋奴的气，活得简直不像个人。自从给周恩来开车后，他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知道了工人阶级是非常光荣的人群。他知道这段时间情况紧张，特别是廖仲恺遇刺后，更提高了警惕，

每天跟着周恩来，车不离人，人不离车，随时等着出发。周恩来也感到这位汽车司机非常忠诚，对他的工作活动帮助很大，看到他的政治觉悟一天天在提高，非常高兴。

汽车在不平坦的马路上疾驶。夜幕中，人影稀少，枪声时闻。周恩来坐在车上，正在等待着新的胜利的来临。

由于时局紧张，不时有消息说城内粤军要叛乱，城外粤军要来偷袭，司令部特地加强了警卫。特别是今晚临擦黑又接到命令，9时全城戒严，搜捕在逃刺廖凶犯。于是门卫个个枪上刀，弹入膛，机枪手也匍匐在工事里，手握枪机时刻提高着战斗警惕性。

汽车司机按周恩来的习惯加大油门。汽车驶到可以看得见司令部的街上，车灯已经照见司令部大门。按说已经是平安返回了，然而就在这时候，门卫忽然大声喊叫“停车”。汽车司机从来没有想到周恩来的汽车会在离大门较远的地方被叫停下，仍旧向前行驶。门卫又大声呼问：“口令——？”当即按原定口令作了回答。门卫见眼前的汽车是在戒严当中应停而不停的车，回答的口令不是新口令，便大声喊叫：“再不停，我就开枪了！”在喊的同时，门卫搂动了枪机。汽车司机还未来得及煞车，一串无情的弹丸射了过来。汽车司机见情况不妙，赶紧调头把车拐进小巷，由于身负重伤，倒在了驾驶座上。周恩来听到枪响，急忙把身子伏下，才幸免于难。他走下车连声高呼：“我是周恩来！”门卫听到喊声，这才察觉错打了政治部主任，一个个恐慌异常，急忙赶来抢救汽车司机。但他早已被无从解释的“误会”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周恩来此次遇险，几乎丢掉性命，究竟蒋介石和何应钦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历史的案卷里并没有作出解答，但蒋介石和何应钦是难逃其咎的。周恩来既然是执行搜捕廖案凶犯的，又是“廖案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变更戒严时间和口令为什么不通知他？

三

由于缉拿廖案凶犯任务在身，当时周恩来在简单处置了两位牺牲者的事务之后，立即又奔赴各搜查点检查部队执行情况去了。

当晚，在部队的严密搜查下，抓获了三四个刺杀廖仲恺的凶犯。对刺廖的真凶——国民党中的一些右派，虽未触及，但却给予了很大的打击，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不得不出洋，粤军司令许崇智被赶下台逃出广州，左派势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搜捕凶犯的任务完成之后，直到深夜周恩来才返回文德路文德里他的寓所。自从廖仲恺遇刺事件发生后，他还从来没回过家。

新婚的妻子邓颖超，听到他回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她是周恩来1920年离开天津去巴黎以前，在“觉悟社”工作的时候和周恩来相识的。周恩来在巴黎期间，两人书信相通，结成同心。1924年9月周恩来从巴黎奉党中央之命回国到广州任职后，第二年8月初，也即廖案发生前不久，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区妇女部长的邓颖超，也奉调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他们分手5年后，于1924年8月8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周恩来进屋后，邓颖超在灯下见他的灰色西服上血迹斑斑，以为他可能是在缉捕凶手时沾上的，就没有问，周恩来也没有细说。

周恩来生前，在人们面前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为保护他而不幸牺牲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位汽车司机。

写到这里，我不禁由衷地感谢那位汽车司机，是他，在弹雨加身之时，仍然尽心尽职，将车急调头开进小巷，为我们党保存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周恩来！当然，也为至今没有弄清他的姓名而遗憾！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邓颖超

1982年夏，我翻阅一本《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有一段以《机智的周恩来》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描述1928年恩来同志和我在大连遇险事件。嗣后，我又看到几份资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当事人，都是别人对他们说的，内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时以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情节是作者推测的。总之，他们所写的情节不很准确和完全。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虽然恩来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简要他讲过此事，但听到的人并不多。现在，既然有几个刊物先后发表过，我想将它的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是必要的。

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旅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上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她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个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

察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樣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说说笑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要做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近，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军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后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我从没想到会在 57 年后的今天，满怀愉快的心情，在人民的大连回忆这段往事。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欣幸。

1985 年 8 月 1 日于大连

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读后

高振普

最近，我又一次读了邓大姐写的《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的回忆文章，引起我的一些回想，邓大姐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情景历历在目，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在1985年夏天，我和赵炜同志陪同邓颖超同志在大连休息，住在棒棰岛五号楼。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郑淑云同志寄来《黑龙江日报》登载的一篇《周总理三到哈尔滨》的文章，请邓大姐看看，是否属实。文章是赵炜同志读给大姐听的，大姐听后问我们，周总理到过几次哈尔滨，我说记不清楚了，反正不止三次。大姐说：“文章中所说的三次到哈尔滨的过程，有两次我不清楚。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这一次，我是作为列席代表与恩来一道去的。写这一段经过的人我是没听说过，更不相识，他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传奇小说，与事实相差太多。”邓大姐接着说：“在这之前我也看到过一篇《机智的周恩来》，也是说这件事的，那里面也有好多是作者推测的。”大姐问我们看过没有，赵炜同志和我都回答说看到过。邓大姐稍事思考一下说：“我应该说话了，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我们说，大姐应该写，你和总理是当事人，只有你的回忆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我们劝她不要着急，慢慢写。大姐把手一挥说：“只争朝夕。”马上叫赵炜同志拿出纸和笔，她说，赵炜记，大姐一口气把怎样从上海上船，到大连后怎样等总理被放回，又由大连去哈尔滨的经过很详细地讲完，赵炜同志整理抄清后，又经过大姐一字一句的修改，然后以《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为题，发表在1985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就是邓大姐写这篇回忆文章的前后过程。

有关周总理、邓大姐去莫斯科出席“六大”的经过，过去邓大姐讲过，但是没有像今天讲的这么详细，这么严肃。周总理过去也对我说过，只是说了他在大连被拘留，又是怎么样与警察斗智而瞒过敌人被放回的经过，叫警察厅代买火车票是为了减少警察的怀疑。对我讲的目的是教我做好警卫工作如何机智果断地处理问题。邓大姐的叙述和周总理讲的完全一致。邓大姐还说，“六大”开完以后，代表们是分批回国的，她和周总理商定，为减小目标，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二人是分开回来的。

今天，我再次读了大姐的这篇遗作，很受教育，邓大姐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81岁高龄的老人，但她不顾身体有病，天气炎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写下了这篇纪实文章，体现了她对革命、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表现了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她说：“这不是为周恩来，也不是为自己，是对人民负责，对后人负责。”她风趣地说：“我这也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嘛！”为了缅怀邓大姐，我把当时她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情况记录下来，以激励我们更好的学习邓大姐的高尚品德，沿着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一生。

长征途中的一次医疗奇迹——记周恩来肝脓肿破裂获救

王斌口述 卞志强整理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决定作战略转移，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秦邦宪）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做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准备与计划的执行。长征一开始，敌人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恩来同志出发时，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和作枕头用的包袱，里面装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灰绒衣。他平时身穿军装，脚穿草鞋。在急行军中，他经常将他的黄骡子给生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常利用行军小间隙或防空时间，找机会和战士们拉家常，讲战史。一到宿营地，便抽空到部队看望指战员，查看地形，调查行军路线。到达驻地以后，就叫人马上架起电线，接收电报后并阅读电文，观察地形图，研究敌情，起草和下达作战命令。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却和部队一起行军，吃同样的伙食。

11月14日，在红军通过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战斗空前激烈，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最艰苦激烈的一次战役。恩来同志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同时向后方交代任务。

过湘江后，全军的实际指挥工作已由恩来同志担当。12月18日，恩来同志曾主持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由朱德、周恩来负责部署执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困境。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建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由于采纳和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路线，周恩来同志亲自具体指挥，终于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进入川西地区，取得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后，红军又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直至6月12日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以后在执行已定的战略方针时，却不断遇到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使红军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恩来同志为此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艰苦复杂的工作。就在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之后，周恩来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终于病倒了。

在那个时期，红军中主要流行4种疾病：痢疾、腹泻、疥疮和下腿溃疡，很多病都与上述因素有关。恩来同志从8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粘液，体温从38℃上升至40℃，全身逐渐发黄，神志不清以至到高烧昏迷，病情发展快，病势重。红军中的主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中央决定将我从长期患病的王稼祥同志身边调来，给周恩来同志治病。我给他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4横指。我认为，恩来同志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是

无疑的了。幸而西药箱中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肌注 1—2 支，治疗了两周左右。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当时红军中医药条件极差，穿刺抽脓或开刀都不可能。但是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得了化脓性胸或腹膜炎，肯定有生命危险。我只好让人到 60 里以外的山上，找些冰块来放在恩来同志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 10 时敷到下午 6 时，使脓肿不致于向胸发展。同时由组织决定，把邓颖超同志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恩来同志。

邓颖超同志从长征开始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来到恩来同志身边时，恩来同志已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同志就在地上铺上点草睡，她将恩来同志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查看，捉到了 170 多个虱子，虱子的血把手都染红了。在这生死关头，恩来同志却神志逐渐清醒了。他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在 8 月 11 日的上午，邓颖超同志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这是由于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他的高烧也慢慢退下来了。

周恩来同志清醒后，看到邓颖超同志在身边，感到有点意外，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刚刚苏醒过来，就惦记着给一、三军团发电报，督促作战计划的执行。其后，恩来同志的病情日渐好转，但身体非常虚弱。8 月 20 日未能参加在毛尔盖召开的会议，8 月 21 日就开始北上过草地了。

这时，彭德怀同志下令，请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同志负责组织担架队，由陈赓同志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同志组织担架，向那荒无人烟，充满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恩来同志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身不由己了。恩来同志病愈恢复以后，我又回到王稼祥同志处任保健医生，恩来同志由戴济民同志负责照顾。

回忆起恩来同志 50 多年前九死一生的医疗上的奇迹，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紧密粘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入腹腔，那么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恩来同志是不可能被救治的。记得恩来同志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医生和我说：“您 40 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 40 年……”其实，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危难，但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些生死关头的大转折，又怎样解释才好呢？

危难中的转移——周恩来撤离瓦窑堡纪实

赵桂来

1936年，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撤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进行新的战略转移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当时，红军大部队已经踏上征程，中央身边仅有警通连和保卫队少数武装，情况非常危急。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以超人的勇毅和非凡的智慧，指挥很少的兵力，掩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枪林弹雨中安全撤离了瓦窑堡，实现了预定的战略转移。

一

1936年6月21日，这天恰好是农历五月初五，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相传，这一天是战国时期楚国忧国忧民的大诗人、三闾大夫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按照传统的习俗，每到这一天，瓦窑堡人家家家户户都要挂艾虎（即艾蒿），包粽子，驱虫祛毒，以禳不祥。

这年与往年不同。这年的端午节，瓦窑堡人是把它当做喜庆的日子来过的。这也难怪，因为红军把盘踞在瓦窑堡的陕北老军阀井岳秀的国民党兵赶走之后，在这里进行了土改，给穷人分了地，分了浮财，过上了有衣穿有饭吃当家做主的日子。尤其是1935年冬天，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之后，周恩来副主席又为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刘志丹等人平了反，让他们重新领兵挂帅打白军去了；对土改进行了复查，原先被错划为地主成份的铁匠任兴盛、银匠孙成娃，改成了富农，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地主，也给留下了相应的土地和财物，以养活自己；至于国民党官兵的家属，也受到了正确对待……这一切，不仅给动乱岁月中的瓦窑堡人带来了安定，而且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他们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感激红军。

他们不但把一大早从路边沟坎或河畔采来的散发着清香的青翠艾蒿，挂在红军指战员居住的房门上，而且把用当地出产的粟米和大红枣包成的黄米粽子，塞到红军指战员手里。他们要和红军指战员共享欢乐，共禳不祥。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疯狂的敌人，在骑兵张的率领下，正在悄悄向瓦窑堡逼近。

二

对敌人这次突然偷袭，不但瓦窑堡人没有料到，就连周恩来副主席也没有料到。

21日早饭后，周恩来正抓紧撤退前的一点时间坐在瓦窑堡自己住的小院里的枣树荫下批阅文件和前方来的电报。他是非常珍惜时间的，尽管他已做好了撤离的准备，等毛泽东主席一起床，便立即出发，对临出发前这点时间仍然不肯轻易放过。

这次主动撤出瓦窑堡是中共中央于6月14日决定的，撤出的目的，是为

了挫败蒋介石妄想将红军一举消灭于陕北的企图，避免军事对抗，使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实现全国一致抗日，首先在西北地区开创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这次撤离工作，是在周恩来的统一计划和周密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撤离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天了。驻瓦窑堡的红军部队，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已分别离开瓦市，踏上了新的征程；驻瓦市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各单位、陕北省委机关，以及学校，也已陆续转往新的驻地：这天早饭后，中央机关的炊事班、辎重队等也已起程，机要人员正在将无线电等通讯器材装箱待运，随中央一起行动的警通连、保卫队，以及警卫参谋人员、译电员……也在早饭后，收拾好了行囊，单等一声令下，立即开拔。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毛泽东主席起床，毛泽东一起床，大家就可离开在这里驻了7个多月的瓦市了，尽管大家从心底里不愿离开瓦市，不愿离开瓦窑堡热情好客的乡亲们，但是为了全民族的大局，为了实现全国抗日，大家还是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毛泽东是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川大相寺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之后，于5月21日回到瓦窑堡的。回来之后，一直很忙，不是开会、找干部谈话、给红军大学学员讲课，就是总结红军长征和东征作战的经验、批阅文件和电报，夜里还要伏案疾书写文章，常常是废寝忘食，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昨夜，他一直写到天亮，才上炕躺下。

周恩来坐在枣树荫下，一边等待，一边抓紧时间批阅文件和电报。

“砰！砰！”突然传来几声枪响。

枪响，在战争年代本来算不了什么。但红军指战员一向纪律严明，加上子弹异常匮乏，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是不会随便开枪的。瓦窑堡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更不能随便开枪。听到枪响，周恩来把目光从文件上收回，警惕地抬起头。参谋陈友才匆匆走来，向他报告：

“周副主席，好像有情况……”

“哪里打枪，查去没有？”周恩来问。

很显然，周恩来想很快弄清情况。

陈友才当即转身，快步去找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他跑到张云逸的住地，只见院门大开，早已人去房空，就连平时拴在院子里的两匹战马也不见了。他问担任警戒的哨兵，哨兵告诉他，张副参谋长他们去西门了。

陈友才转身又往西门跑去。

瓦窑堡西门外，此时枪声正烈。

张云逸听到枪声，火速离开住地前往西门外察看，途中恰好遇上安定县委派来的人。

据来人报告，枪声来自横山石湾方向，估计可能是驻扎在石湾的敌人出动了，而且人数不少。县委书记李合邦派工会主席郝振廉，带两名战士立刻前往侦察，之后又集合县游击队、赤卫军，前往阻击。郝振廉和两名战士赶到栾家坪，便和敌人遭遇上了，双方展开了枪战。游击队、赤卫队赶到后，也投入了战斗。来人还说，游击队和赤卫军武器不行，用的主要是长矛大刀，不是敌人的对手，估计不会坚持多久。县委特意派我来报告，要中央领导做好准备。

张云逸听了来人报告，皱了皱眉头，当即把几位随行参谋人员叫到身边，

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让他们分头去布置，然后又派孔石泉参谋速去报告周副主席。

三

孔石泉一路小跑，赶到周恩来的住地，一五一十把安定县委报告的情况复述了一篇，然后报告说，张副参谋长已调红军大学学员前往奕家坪方向，进行警戒，现在正组织警通连、保卫队一应战斗人员，准备迎击。

“来的敌人是石湾的？”周恩来叮问了一句。

“是的。是石湾方面的。”孔参谋回答。

石湾驻扎的是榆林 86 师高双成的队伍。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了，随即顺口说了一句：“这里没有防备，他倒来了。”

瓦窑堡是陕北的一个重镇，它坐落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峦中间。自 1935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进驻以来，一直处在蒋介石几路大军的包围之中。东面，一过黄河便是山西反共老手阎锡山的地盘；东北，汤恩伯的中央军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驻扎了 4 个师；北面，以榆林为中心，驻扎着地方军阀高双成、高桂滋 2 个师；南侧，洛川、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地区，有西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 2 个师，东北军张学良 4 个军 15 个师；西部，陇东和宁夏地区有马鸿逵、马鸿宾两个师 5 个旅。

1936 年 5 月初，为了抗日大局，红军东征回到河西之后，接着又转向西征。这时，蒋介石又严令东北军向北推进。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和推进抗日统一战线，决定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向保安转移。

6 月 14 日，主动撤离的决定做出后，周恩来作为实施撤离的负责人，很快做了部署。在部署中，因盘踞在绥德一线的汤恩伯部对我威胁最大，特意派了阎红彦、蔡树藩部红 30 军赶赴延川城，准备侧击敢于进犯之敌，并命谢嵩、甘渭汉部红 29 军，进至延川冯家坪待命；守卫瓦窑堡的卫戍部队，全部调往前线，其卫戍任务由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赤卫营接替。对东北军，周恩来没有派一兵一卒，仅以个人名义给东北军 67 军工以哲军长发了一份电报。电报称：“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

对东北军（包括西北军）没有派军队牵制，主要是考虑到东北军的处境和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是“直罗镇战役”之后开始的。1935 年，红军对蒋介石的“围剿”针锋相对，先是打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接着又打了“直罗镇战役”，三战三捷，给了“进剿”的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东北军首当其冲，受到的打击最大。其事实正如后来 1937 年周恩来在会见记者李勃曼时所说：“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首先把东北军一个师、一个旅打垮了，后来又打垮了一个师。于是东北军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后，双方互相往来，特别是 1936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亲赴肤施，和张学良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双方不但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面达成了共识，而且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默契。

至于北面的高双成、高桂滋部，没有派兵去牵制，一则是 4 月张学良、

杨虎城曾两次飞到榆林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打内战都表示忧虑。二则，他们自身矛盾重重。特别是高双成，他是这年2月井岳秀死后，接替井岳秀任86师师长的。他尚未站稳脚跟，蒋介石就放风要对86师进行整编，并派了大批政工人员到86师。他感到自身难保，加之井岳秀生前86师曾吃过红军的亏，在静边县城一个精锐营被全歼营长屈自鹏自戕，启然也就没有进攻红军的打算。

然而，威胁恰恰来自86师。关于这一点，就连高双成自己也没有想到。

四

枪声，打破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短暂的平静生活，也打破了中共中央进驻后给瓦窑堡人带来的欢乐。

1936年4月，红军在城门滩大操场，又叫中山会场，召开庆祝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大会，红军指战员、村镇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市民和机关干部有一万多人参加。大操场彩旗猎猎，锣鼓喧天。军委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讲话。他讲述了红军先遣队东渡黄河，所向皆捷，在山西取得很大胜利的过程，接着列举了所缴大炮、长枪的数字，全场掌声雷动。之后，他又讲了红军回师陕北，目的是为了联合抗日，促进民族统一战线。全场顿时喊起了“联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5月1日，在龙虎山下教堂广场，又召开了瓦窑堡有史以来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副武装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有身背大刀、手持红缨枪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也有手拿彩旗的妇女队伍……洛甫、博古、王稼祥、董必武、张云逸、杨尚昆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在主席台就坐后，阅兵式开始，周恩来头戴红星帽，身着蓝军装，骑着枣红马，长髯飘逸，绕场一周，与受检阅部队和群众见面。每到一方阵，周恩来便大声鼓励大家：“同志们，努力抗日！”方阵内齐声回答：“努力抗日！”随即唱起了“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我们是抗日先锋……”歌声雄壮嘹亮，响彻整个广场。

5月21日，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那天更是热闹，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南门外，排列在秀延河边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董必武、张云逸等领导同志都去了。在热烈的掌声中，人们高喊：“欢迎毛主席回后方来！”“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此后，大大小小令人鼓舞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先是以徐特立为校长的列宁小学开课了，接着又成立了以董必武为校长的中央党校。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又在瓦窑堡市内米粮山一座旧庙前的空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祝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是为了适应变化着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他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中国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战争的成功。但是直到现在，黄埔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抗日红军大学，要继承黄埔的革命精神，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三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抗日红军大学的校长是林彪，教务长是罗瑞卿。学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抽调来的营、团、师各级干部。

从此，瓦窑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都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便成

了引人注目的中心。

五

周恩来走出小院，穿过几个院落相隔的小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

这个小院坐落在中山西街，院内一共有五间平房。靠东边一溜四间，一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其余几间是会议室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紧靠这排平房西头的一间，盖得比这排平房略高一些，房前竖着一架木梯，登木梯爬上屋顶，依山而建的瓦窑堡全城一大半即可尽收眼底。但毛泽东却没有登高远眺的兴致，在这里住下后，他除了开会、找人谈话、批阅文电之外，常常是彻夜伏案疾书。他的一些名著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警卫员、机要员、秘书，一见周恩来到来。一拥而上围在了他的身边。从他们的精神上看，显然是想弄明白敌情如何？我们怎么办？

其中，警卫员贺清华是最着急的，他急切地脱口问道：

“叫不叫主席起来？”

周恩来没有马上回答小贺，而是向在场的陈参谋说：“迅速去查厂下，看郭洪涛他们撤完没有？通知林校长、罗教务长、除有阻击任务的以外，其余现在即行撤离。”

向陈参谋交待完，周恩来才对警卫员和秘书们说：“迅速做好转移准备……不要忘了检查保密和群众纪律……”

他仍然没有回答小贺。因为他知道，此时睡眠对长期挑灯夜战的毛泽东是多么重要。现在虽然敌情来得突然，但也还没有到非叫醒他不可的时候，让他多睡一会，就意味着使他养精蓄锐，好更好地应付即将到来的斗争。

呱哒哒！随着一阵马踏石子路面的马蹄声，张云逸来到小街毛主席住所门前，一偏身跳下马，匆匆走进小院，来到周恩来面前。

张云逸比周恩来大五岁，也蓄着长长的胡须。尽管他的胡须远没有周恩来的胡须那么浓密，但在当时红军中留胡须的人中，也还是数得着的，因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张胡子”。他为人谦虚热情，个子不很高，但却充满了活力，做事周密，行动敏捷，一点也看不出他已是年过40的人。他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向周恩来报告了敌人来犯的情况和我方的布置，然后说：“栾家坪一线已被突破，来犯之敌已进至米粮山北麓，很快就会到达通讯连和保卫队的警戒区。估计通讯连和保卫队他们也不会坚持多久……”

“无论如何要留下一定的机动兵力，以防不测……”周恩来说。像是向张云逸交待注意事项，又像是下达命令。

张云逸点了点头，答应下一声“我明白”，随即匆匆走出毛主席居住的小院。接着，一阵马蹄声“得得”，很快在街衢尽头消逝了。

张云逸走后，周恩来才把和蔼镇静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贺清华，说：“小贺，该叫醒主席了。”

毛泽东昨夜工作到很晚，直到天亮才躺到炕上呼呼睡去。他睡得很香、很沉，连外边的枪响也未听到。

贺清华虽然搞不清敌情到底有多严重，但从周副主席要他叫醒毛主席这一点上，他已猜到了情况的紧急。

他立刻转身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轻声叫道：“主席，主席！”毛泽东在酣睡中，听到小贺的呼唤声，呼地坐了起来。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紧急事

情，在他熟睡的时候，警卫员是不会轻易惊动他的。

“什么事？”毛泽东定了定神。

“周副主席让我叫醒您。安定川那边正在打枪，可能有敌情……”小贺向主席报告。

“参谋长呢？请参谋长来……”毛泽东对小贺说。

小贺立即让等在外边的其他警卫人员去找张云逸，他们找来找去，却不见张云逸的踪影，原来张胡子跑到抗击入侵之敌的第一线去了。

瓦窑堡西门外，警通连和保卫队的战士，以及从栾家坪撤下来的红大学员，正利用沟坎、田埂、屋宇、断墙等有利地形，抗击敌人的进攻。

瓦窑堡是陕北著名的第一大镇，有 1800 余户人家。城池依山而筑，分外中内三城墙。延秀河从东边流来，将山分为两半，一半在城里面，一半在城外。在城里的一半叫米粮山，在城外一半叫龙虎山，米粮山是城内最高的点，控制了米粮山，便可控制全城。米粮山位于内城。所谓内城原是国民党的一座兵营。中城系老百姓杂居之地，全是民房。外城则是一条商业街，店铺门面有 100 余户。

张云逸来到西门，保卫局李科长向他报告：“据了解，来犯之敌是骑兵张的炮兵营，还有一些民团、地主武装，大约有上千人。”

张云逸说：“必须顶住，争取时间，掩护党中央转移……”

作为指挥员，他自然清楚敌我的态势和实力，但眼下，除拼死顶住，别无其他选择。

六

在毛泽东住的小院，几位整装待发的警卫员、机要译电员站在小院西侧的一间平房顶上，边了望边议论。

原来这个小院建筑在高坡上，是瓦窑堡城内的一个制高点，站在这里的房顶上，不但能看到瓦窑堡城池全貌，而且可以看安定川、米粮山……

“瞧，那一股，正往米粮川那边冲呢！”有人指指点点。

“我们的人呢？怎不见我们的人……”有人对不见我们有人抵抗感到惊讶。

“瞧，这里又一股，向城里冲来了。”机要译电员刘三之焦急起来，“我们的人呢？为什么不进行抵抗……”

“熊包、熊包，全是熊包！”有人责骂。

警卫员、机要译电员们的议论，正好被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毛泽东听到。

毛泽东移动瘦长的身躯，手把扶梯一级一级登上房顶，与大家一起，二目越过鳞次栉比的房舍，向瓦窑堡西门外望去，只见高高低低的黄土坡上，人影绰绰，尘土飞扬。从那边飞过来的子弹，呼啸着打在院子里的枣树上，细细的枝条和翠绿的叶子应声飘落下来。

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虽然，偷袭的敌人正在步步紧逼，很快就要迫近城下，进入市区。

就在此时，张云逸骑着马再次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小院前，翻身下马，急匆匆走进小院，他刚从前线返回，见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机要译电员，正在平房顶上了望，便登上扶梯。

“报告主席，经查，前来偷袭的敌人，是驻在横山石湾一带 86 师高双成

那个炮兵营，还有一些地主武装，不到一千人……”张胡子向毛泽东报告说。

“唔，炮兵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不到一千人？”毛泽东沉吟着。

他，对这个炮兵营多少有些了解。这个炮兵营，名义上叫炮兵营，实际上没有一门炮，倒是拥有不少骡马。出发可以骡马代步，收兵回防抢了老百姓的东西，又可用骡马驮载，所以有的人干脆叫它骑兵营。营长姓张，人们都管他叫“骑兵张”，至于叫张什么，却无人去深究。所以直到今天，不少人谈到此次偷袭时，也只知道来袭的是“骑兵营”，带队的营长叫“骑兵张”，而根本不知道这个营是高双成的炮兵营。

张云逸深知毛泽东的用兵策略，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见毛泽东沉吟不语，断定他正在琢磨如何对付骑兵张的来犯。便说：“主席，来犯之敌多倒不怕，问题在于我们只有警通连和保卫队，总共不到100人。红大学员虽然上去了，可他们有的没枪，有的只有短枪，而且没有多少子弹……”

毛泽东似乎品味出这位打仗一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闻名的指挥员的忧虑不无道理，便风趣地说了一句：“这个骑兵张倒有些胆识，竟出我意料，攻我不备，不像反动派那些脓包将军。”继而又眨眨眼，问张云逸：“嗯，周副主席呢？”

此时，周恩来跨进小院，沿着扶梯登上了房顶，站在毛泽东身边，与毛泽东共同向瓦窑堡西门外了望。

“主席，您看，敌人的右路显然是要向水沟坪方向挺进。那一路已突破我们的防线，冲上了米粮山……敌我对比，力量悬殊，恐怕我们的人坚持不了多久，是不是……”张云逸指着西门外尘土飞扬的地方，不无忧虑地说。

“不要急嘛，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毛泽东仍然很沉着。

“郭洪涛他们已经撤出，全部转移了，林校长、罗教务长，他们也已知道，没什么问题。”周恩来也插进来劝说。

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和机要人员，早已收拾好行囊，做好了转移准备。就连毛泽东经常骑坐的那匹小黄马，也已备好鞍辔，牵了出来。这匹小黄马，个头不大，却很强悍，曾伴随毛泽东进行过长征，毛泽东非常喜欢它。单等一声令下，立即开拔。

西门外，枪声越来越激烈，并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凌空而来的飞子，不时落在院子里枣树上，稚嫩的枝叶被打落在地。显然，入侵之敌正在加紧进攻，直逼瓦窑堡。

“主席，快下去吧！”周恩来从安全出发，向毛泽东提议。

“我再看一看。”毛泽东毫不在意。

“还是下去吧，主席。”周恩来面色严肃，再次催促。毛泽东虽不情愿，但不愿拂周恩来的意，便手抓扶梯一级一级下得地来。

“准备走。我到前面去！”周恩来说罢，大步向小院外走去。尽管他听到后面传来的毛泽东的深情话语：“恩来，我们一起走。”他头也没回，直奔院外。

他刚走出小院，迎头碰上了张胡子。

张云逸是什么时候下了平房，离开小院骑马到前方去察看的，当时谁也没注意。见到周恩来，他马也没下，便对周恩来汇报说：“前边打得很激烈，敌人已攻进街巷……请周副主席和主席先走，我殿后……”

枪仍在响，手榴弹仍在爆炸。

警卫员、机要译电员、秘书，一致劝说毛泽东启行。毛泽东依旧镇静如常：

“机关都走了？”

“早走了。”一位秘书回答。

“主席，您……”

毛泽东并不理会别人的劝说。他低头不语，在自己的住房门口往返徘徊；像是在检查是否有什么遗漏，又像在仔细反省这一段工作。

见毛泽东不听劝说，大家只好无可奈何地静静地等待着。周恩来与张云逸分手后，返身走进毛泽东居住的小院，来到正在低头徘徊的毛泽东身边，神情十分严肃他说：“主席，您该走了！这里，我和张胡子殿后……”

毛泽东显然已经意识到周恩来已经做好了安排，没有再在这里停留的必要了，于是不等周恩来说完，便说：“好。恩来，你们也不可久留，要很快离开。”接着回过头来，看了早已准备好整装待发的警卫员、机要译电员、秘书们一眼，说：“那好嘛，咱们现在就走。”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一是林彪，一是古远兴。

作为红大校长，林彪是红大最后一批撤出的。他住在米粮山南侧的一个院落里，撤出时他的战马不见了，不知受惊跑了，还是谁忙中出错给骑走了。已经占领米粮山的敌人，由山上向山下乱打一气。一向行动谨慎强调万无一失的林彪，急得团团转，冲着警卫员大叫大嚷：“马，马……”后来，教务长罗瑞卿把自己的坐骑交给他，他才说了声：“快走”，和警卫员扬鞭而去。

后来曾担任过张思德的队长的古远兴，这时任军委总政治部警卫班长。他的经历，则是另一番景象。敌人占领米粮山时，这个警卫班正准备开饭。一盆黄橙橙的小米饭，还有一盆香喷喷烧肉。这是为过端午节而特意准备的。大家围拢来，正要打一次丰盛的牙祭，命令来了，要他们立即撤退。眼看这顿饭吃不成了，大家都用眼睛盯着古远兴，作为班长，古远兴自然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命令必须执行，绝不能吃了再走。他果断地下令：“全班注意，执行命令。出发！”站好队，他指了指排尾两名战士，“端上，一点也不能留给敌人！”这两名战士也真有办法，他们把烧肉连汤带水往米饭上一扣，来了盆扣盆，端上就走。据说，一路之上饭没有撒一粒，汤也没泼一点，在行军休息时，全班吃了个痛快。

七

从毛泽东的住地小院出来，往左一拐，不多远便是一个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往南，便可直达南门，往北再拐个弯，走不了多远便是西门。瓦窑堡的店铺大多集中在这里。要在往日，此时店铺早已开张，小贩们也早沿街摆起了小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熙来攘往，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但现在，店铺大门紧闭，小贩绝迹，也很少有行人走过，整个十字路口显得空旷而寥落。

这里不单是敌人从西门或北门进来扼握全城的要隘，而且是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从南门撤出的必经之路。

周恩来在前，陈友才等随后，从毛泽东的住地小院出来，直奔十字路口。

“机动部队在哪？”临近十字路口，周恩来边走边问。

“就在前边，是刘排长带队。”陈友才用手指了指路口向北的街道。

街道空寂寥落，不见有人走动。

但是，只要懂得一些军事常识的人，一看街道两侧的矮墙、门洞、厕所等处，立刻便会发现成梯次配备的散兵线观察哨，正在那里巧妙地隐蔽着。

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从到达陕北后，陈友才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不仅勤奋肯干，而且有一定指挥才能。那还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有一次周恩来到红28军与刘志丹、宋任穷研究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不意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三路包围。其中一路已迂回到红28军指挥所侧后，爬上山来，直到逼近指挥所哨兵才发现，情况十分危急。陈友才得悉后，组织指挥警卫连来了个正面出击，一个反冲锋，把爬上山来的敌人打了个屁滚尿流，滚下山去，掩护周恩来，刘志丹、宋任穷等领导同志，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然，在这次战斗中，陈友才腿部中弹也负了伤，并且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

这一次，情况远比国民党军队三路偷袭红28军指挥所严重得多，敌人来了上千人，而我们的兵力却少得可怜。因此，必须根据这次任务的特点来进行部署。为此，周恩来特意吩咐陈友才：“告诉刘排长还要往前布置，要完全控制这条南北通道，并保持接触，待撤出南门之后，再分出一半兵力，迅速向右翼前进，进行战斗警戒……”“是。”陈友才应了一声，匆匆前去找刘排长调整部署去了。就在这时，毛泽东、洛甫等一行已走出住处，向十字路口这边走来。尽管枪声不停，不时有飞子从头上掠过，毛泽东、洛甫等一行，仍旧不紧不慢地走着，对从头上掠过的飞子毫不理会。西北方向，枪声、手榴弹声突然大作，喊杀之声也隐约可闻，显然来犯之敌又一次向我发起冲锋。

为了确保毛泽东、洛甫等一行安全转移，周恩来立在路口一侧，向陈友才、刘排长打了个手势。

刘排长看到周恩来的手势，立即率十几名红军战士，像离弦之箭，沿街道两侧迅速向前运动，并占据有利地形。这些战士，都是爬过雪山、越过草地、久经锻炼的战斗骨干。平时看起来有的穿着灰布军衣，有的穿着青色或蓝色的制服，枪械也不统一，很不正规。但打起仗来，在紧要关头，却一个个如猛虎下山，机警勇敢，身手不凡。

毛泽东、洛甫等一行，拐过弯，来到十字路口，正要南行出瓦窑堡南门，突然，从瓦窑堡西门突破我军防线冲过一股敌人。他们哇哇叫着，边冲边向十字路口打枪。子弹吱吱尖叫着，从毛泽东、洛甫等一行身边飞过。

陈友才见状，立即率领一个班冲上去，来了个反冲锋，当场打死打伤几名敌人。敌人不知虚实，生怕中伏全歼，当即狼狈鼠窜败逃下去。

南北街衢又恢复了宁静。

毛泽东、洛甫等一行，穿过街衢，继续南行。毛泽东在前，洛甫在后，不紧不慢，两人不时还说几句风趣话，仿佛不是在枪林弹雨中撤退，而是在闲庭信步。

洛甫说：“我们得走快些，我们走不了，他们下不来。”他指的是殿后的周恩来和张云逸他们。

毛泽东说：“告诉他们不要打了，他进他的，我们走我们的。敌人的目标是要占领瓦窑堡，不是要打我们这几个人嘛！”说话之间，已经到了瓦窑堡南门。

出了砖砌的拱形门洞，便是架在秀延河上的石头桥，桥两头各有一截凸

凹不平的石头路面。过了桥再往前，便是在陕北常见的那种圆顶山头，远远望去，就像了个个大馒头。其间有一条窄窄的小道，蜿蜒于深深的山崖和沟壑之间。

周恩来目送毛泽东、洛甫等一行，出了南门。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传来。参谋长张云逸和几名随从，乘着各自的坐骑来到周恩来面前。

“红大和保卫队已经撤出战斗，沿两沟向保安方向转移。敌人已占领西门，正在向城内推进……”张胡子向周恩来报告。“主席他们已经出了南门，我们也该撤了。”周恩来说。张云逸把眼镜往上扶了扶：“是，周副主席。您先走，我们随后就撤。”

周恩来转身向陈友才交待说：“告诉刘排长，不可恋战，要尽快脱离接触，掩护转移。”然后又转向张云逸：“我们一起走。”

八

毛泽东、洛甫等一行，出了瓦窑堡南门过了石桥，刚刚转入蜿蜒于山崖与沟壑之间的窄窄的小道，忽见城墙两侧半山腰上，顺着一坡到底的城墙边上的小路，有几个人背了一名伤员下来。等他们走近一看，大家都认得，伤员不是别人，而是保卫局李科长。据背他的人介绍，他是在西门外和来犯之敌进行战斗时，腹部中弹受伤的。此时，他脸色灰白，呼吸微弱，昏迷不醒，显然流血过多，伤势不轻。

毛泽东让人把给自己预备的担架拿来，让李科长躺上去。这担架是用竹子做成的，长征时从南方带来的，准备毛泽东行军走累了，可在上边坐一坐。但毛泽东总也不肯坐，行军实在走累了，最多骑一下那匹小黄马。今天，这担架终于派上了用场。把李科长在担架上安排好，毛泽东、洛甫等又查看他的创口。当时由于急救止血药品奇缺，仅用绷带包扎了一下，鲜血仍不断往外流。

李科长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两眼，见毛泽东、洛甫等同志围在身边，不由吃了一惊。他万没想到，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到现在还停留在这危险的地方。他的嘴角蠕动了几下，显然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只是吃力地挥了挥手，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让毛泽东赶紧离开。

毛泽东点点头，抚摸着他的手，安慰他，要他好好养伤。然后对抬担架的同志说：“路上小心些，要好好照顾他。”

担架抬走了，毛泽东仁立良久，直到担架走远了，他才和洛甫等同志继续前进。

后来，听说李科长因伤势严重，救治无效牺牲了，毛泽东很难过了一阵子，并对身旁的同志说：“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

毛泽东、洛甫等一行送走担架。又走了一段，来到沟底。沟底很深，沟壁上长满了荆棘，野草，沟崖上隔年的蒿草足有半人高。

他们进入沟底小道，没走出去多远，便见红石峁山上有十几个敌人，身背长枪，正往山下走。随行的警卫员、机要译电员，登时紧张起来，他们一个个枪上膛，刀出鞘，紧紧跟随着毛泽东和洛甫一行，随时准备与敌人厮杀。尽管他们装备很差，警卫员每人只配备了一只盒子枪、一把马刀，但他们决心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保证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随后赶来的周恩来，也发现了这股敌军，他压低声音告诉大家：“不要紧张，快速前进，迅速摆脱他们！”

他让陈友才带领一个班，进占沟右侧的高坡，隐蔽观察，进行警戒。

陈友才奉命，带领战士迅速爬上高坡，占据有利地形，做好了应急准备。

然而这股敌人并没有往山下来，他们的目标是进出老百姓的房舍，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压根就没看到毛泽东、洛甫等一行。

其实，就是发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打一仗，敌人决没什么便宜可占，因为周恩来早已做了布置。

一场虚惊过后，毛泽东、洛甫等一行，顺着沟底小路，继续前进。小路弯弯曲曲，拐来拐去，加之沿途两侧是荆棘、荒草、野蒿遍布，障人眼目，毛泽东、洛甫等一行很快便脱离了险境。当晚在一个山村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启程，几天之后便到了保安县，在保安县住了下来。

九

骑兵张攻占瓦窑堡之后，瓦窑堡顿时陷入黑暗与恐怖之中。赤卫队员的武器被收缴，贫苦农民被迫退地还租，农民协会会员、红军眷属被肆意逮捕和杀戮，老百姓的财物被肆意抢劫……几天工夫，把一个好端端的瓦窑堡搞了个乌烟瘴气。

骑兵张这一招，自然受到了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欢迎。他们大吹大擂骑兵张是什么“智勇兼善”、“攻无不克”，还敲锣打鼓将一块上书“首梟匪逆”的大匾，送到他的住处，以表祝贺。

骑兵张进攻瓦窑堡，既出乎我方的意料，也出乎其他奉蒋介石之命“围剿”红军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的意料，就连他的顶头上司——86师师长高双成也被蒙在鼓里。

此时，高双成刚上台担任86师师长不久，内部不稳，加之自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保住实力，自求苟安，尚恐不能，况且，已与东北军、西北军有某种默契，自然不敢孤军深入，去进攻红军，自寻烦恼！

原来这次行动，完全是骑兵张一次私自行动。骑兵张原是土匪出身，吃喝嫖赌抽大烟，什么都干，他带的那个所谓炮兵营，多是这类货色，光靠国民党发的那点薪饷，自然不够他们挥霍。前不久，他探知红军驻瓦窑堡的人数不多，而且大多是后方机关、医院，或者学校，并探知红军准备放弃瓦窑堡，让给东北军。他觉得正可乘虚而入，大捞一把，于是于阴历五月初三晚上，亲率300兵丁，再加民团和地主武装，总共近千人，以演习打野外为名，开离石湾，突袭瓦窑堡。当夜他们住在唐家川，第二天，即初四夜间继续开拔，天亮赶到安定县，与当地游击队遭遇，并探明瓦窑堡仍在红军手中，东北军尚未进占，便不顾一切，指挥其手上喽罗和民团、地主武装，向瓦窑堡发起了进攻。

对这次进攻的情况，1959年因牵涉到几起人命案，张云衢（即骑兵张）曾向公安机关写过一份材料。他在材料中写道：

“……我那时住在石湾，所负任务是防备红军和向红军扰害。那时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已进入瓦窑堡，党中央机关和红军已向西撤退。我这时为了妄想游击扰害，阻击红军和机关西撤，劫获物资和行李起见，就率所部和地方团队经李家岔到安定西区一带游击。

“进到旧安定城附近始知东北军未到瓦窑堡，党中央机关在瓦窑堡住有少数部队随时准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狂妄地企图到瓦窑堡附近窜扰……进入瓦市是我私自蠢动……”

骑兵张的突袭，不但我党中央受到了干扰，而且使许多无辜百姓遭受了不幸。

东北军、西北军闻讯张云衢进占瓦窑堡后，当即急电话问86师师长高双成。老于世故的高双成，自然不免与东北军、西北军各方函电往返，很忙了一阵子。但他从中也捞到了好处。骑兵张攻进瓦窑堡之后，他赶紧飞报给了蒋介石，为之请功邀赏。进占瓦窑堡本是蒋介石梦寐以求而一直未能实现的事，现在实现了，高双成自然要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这年8月扩编，86师不但没有被编散，而且大增编制，扩编成了第22军，而张云衢也被提为主力516团团团长。

对于友军，特别是东北军，高双成却又特意说明，进占瓦窑堡并非本人所愿，是对部下督饬不严，并明令斥责张云衢“胆大妄为，擅自行动，目无军纪”。念其初犯，“从宽免究，下不为例”，并说明已明令张云衢立即撤回石湾。

高双成之所以对友军特别是东北军作此说明，是因为他早已获悉，在骑兵张进占瓦窑堡的当晚，东北军已接到中共中央的急电，王以哲当即派了一个团向瓦窑堡开进；我红29军也于是日包围了瓦窑堡。他怕骑兵张被歼，这才来了个顺水推舟，急令张云衢撤出瓦窑堡，回防石湾。

骑兵张自然不会空手而归，临行抓夫拉差，数十辆大车为之送行，车上除了部分伤兵和士兵尸体外，大部是抢掠来的财物。

十

由于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和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在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中，有些人不愿再打内战，并同共产党保持了一定关系，邓宝珊、高双成部就是其中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同共产党一直友好相处，双方领导人之间经常函件往来，重要人物有时互访。在蒋介石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中，邓、高所部均未参加。至于张云衢本人，虽做过进占瓦窑堡的蠢事，但也做了若干于抗日有利的事。

张云衢本是陕西蒲城县人，1929年太原军官学校毕业后，曾任过教官，当过营长，至于杀人反共，那是国民党军官常有的事，并不稀罕。值得一提的倒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做的几件事：

1938年他驻防陕北府谷时，高双成曾派他赴晋西北兴家崖去会见贺龙师长和罗荣桓政委，并拜访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先生，他不但受到了热情接待，而且与之合影留念。告别时，贺龙师长还把缴获的日寇两把战刀交给他，让他转交给邓宝珊和高双成，留做纪念。因而他也被看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1940年6月，柴磴战役，高双成任右路军指挥官，张云衢亲率516团，向日寇进攻，毙敌百余，其部死伤40余人。是役，共击毙日寇300余人，击毁日寇军车10余辆，俘获日军两名，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和马匹等。尽管这次战役不过是一次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但在当时消极抗战的国民党营垒，也堪称得上是英雄。后来，他又被调到国民党远征军训练团，远征缅甸、印度等地，同日寇交火。

解放战争期间，张云衢任邓宝珊部少将高参，1948年底，随邓宝珊赴北平，并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衢随之赴甘做了参事。

对偷袭瓦窑堡一事，他一直念念不忘，作为一生中莫大光荣在国民党同僚中大肆吹嘘，直到解放后，他还说过：“假若瓦窑堡那一仗搞成功，活捉了毛泽东的话，哪那还会有今天！”

的确，如张氏所说，当年如果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落入骑兵张之手，落入蒋介石之手，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有可能改变、会推迟，今天的历史就会重写。但是，当年张氏遇到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周恩来。在突变面前，尽管对手兵力强大，来势凶猛，而自己又缺乏可以与之对垒的必要兵力，但他处变不惊，机警沉着，亲自指挥，亲自殿后，终于保护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安全撤离了瓦窑堡，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活着的人对这次战斗仍然记忆犹新。

1990年7月，张闻天（即洛甫）的夫人刘英说：“那次（指撤出瓦窑堡战斗）很危险。张闻天曾说，当时严重得不得了。那天，董老（董必武）、罗迈（李维汉）、蔡大姐（蔡畅）和我一些人先走的。已经打起来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他们几个最后走的。是敌人进了城才撤走的。罗瑞卿讲，林彪连马都找不到了……我们走了3天，才到达保安。”

1991年3月20日，中顾委委员罗青长同志说：“1947年，中央转战陕北到达安塞王家湾时，保卫中央的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加上机关工作人员不过800人，遭到了强大敌人的包围，常常处在敌人的夹缝中，环境非常艰险。周副主席鼓励大家说，这比瓦窑堡撤退时情况还要好，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当年陕北有名的骑兵张袭击时，我手头只有两个班的兵力，抵挡一阵子，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掩护毛主席转移，情况才转险为安。当时，周副主席教育我们，说做保卫工作，一是要绝对保卫领袖的安全，一是保证领袖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两者缺一不可。”

劳山枪声——周恩来劳山遇险纪实

赵桂来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党和政府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一生曾经历过许多次危险，其中之一就是1937年他从延安乘卡车赴西安的途中，在劳山遭到土匪的伏击。在这次伏击中，周恩来乘坐的卡车被打坏，司机和他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以及护送他的特务队排长陈国桥等十余人壮烈牺牲。由于周恩来沉着机敏，遇险不慌，在突发的危险情况下，一面指挥还击，一面向密林深处转移，才得以突围脱险，幸免于难。

1973年6月，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陪外宾到延安访问。故地重游，在谈到此次劳山遇险的经过时，周恩来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毛泽东主席生前对警卫工作曾有过多次批评，大多是嫌警卫形式张扬，脱离群众；也有批评缺乏警惕的，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劳山遇险这一次。

周恩来劳山遇险，发生在1937年4月25日。

一、风尘

1937年4月25日，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筑成的黄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驶去。

这是一辆军用卡车。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着的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这些都是他此次出行的随从人员。除此而外，就是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以及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还有与他们同行的，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的孔石泉。他是奉调前往西安，任刚刚建立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

他们这一行，包括正副司机在内，总共有25人。

周恩来副主席这次离延安出行，是肩负着党中央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后来还到庐山同蒋介石会谈。

这次国共两党谈判，先是在西安，3月下旬移到杭州。在谈判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和几点具体要求，既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又有理有据，机警应变，使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在有利于抗日的大局下，有了新的进展。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本乘飞机离开杭州，飞抵西安，当晚就接济红军给养等问题，同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交换了意见，4月初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住在一起。朱德住在凤凰山下原先一家吴姓的大户宅第里。这是一座一溜三孔的窑洞，坐北向阳，青砖到顶。窑的正面上方有一砖刻匾额，曰“泰伯貽谋”，意在倡导谦恭礼让，治学立身。三孔窑的格局是一明两暗，朱德住西孔，周恩来住东孔。因此时天气仍

有几分寒意，周恩来所带行李又极简单，朱德便把一条红白相间的花毛毯给了他。周恩来常年在外奔波，缺少的就是毯子，这次外出就把它带上了。这条花毛毯是 1931 年 12 月 14 日，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17000 余人在宁都起义胜利后，在庆祝会上董振堂送给朱德做纪念的，不论是在血与火的反“围剿”战斗中，还是在艰难的长征行军途中，一直是他的随身之物，即使再困难也没有舍得把它丢掉。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一连住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此后，又以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即延安——笔者）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议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说，会后即将南下与蒋介石会晤。周恩来此次乘卡车出行到西安，正是为了不久后南下去晤蒋。

对周恩来这次赴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周兴为处长、杜理卿（即许建国）为副处长的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并对沿途情况做了分析。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已收起了反共打内战的破旗，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话，沿途驻扎的又是友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前正在对之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当然也不敢搞什么大的名堂。但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他们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排，由排长和副排长率领，前往护送，且令三辆卡车同行。这样，不但有情况相互可以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知晓。当时特别注意行踪保密，甚至有的随行人员前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对汽车也是早几天就加哨看守。不料想对汽车加哨看守，恰恰为匪徒探知。

周恩来这次出行，本来决定 4 月 24 日一早起程的。但是，这天卡车发动，担任护送任务的警卫战士分别在指定的车上坐好后，周恩来和张云逸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对国共合作新一轮谈判中的许多问题，还在进行商讨。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前往催促，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让特务队一排排长带两个班护送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由副排长陈国桥率一个班于次日也就是 25 日起程。周恩来还特意嘱咐陈友才，告诉先行的人注意安全。

这天早饭后，周恩来、张云逸与前来送行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和红军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后，便在供给部大院登上卡车起程了。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这次赴西安的途中，正预伏着危险。

二、遭伏

卡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着，车后扬起一股灰黄的烟尘。

坐在车厢里的干部、战士，说说笑笑都很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坐汽车长途行军这还是头一次，特别是去西安这样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自然兴奋异常。

警卫员刘久洲坐在后厢帮上，望着路旁的树木、房舍、田垌……飞一般地往后倒退，兴奋之余，又有几分担心。他下意识地摸摸腰间的手枪：“这家伙跑这么快，有了情况怎么办，能打准吗？”

“是不好打。”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接过话茬。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中，卡车过了三十里铺，进入了劳山。路弯弯拐

拐，上上下下，颠颠簸簸，黄土弥天，卡车更加难开。

这劳山，本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它绵延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之上，山脊蜿蜒曲折横穿于延安、甘泉两县之间，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分水岭。自古以来，甘泉人把它看成是甘泉北侧的天然屏障，而延安人则把它看做是延安南边的门户。以山而论，它算不上高，也算不上险，但沟壑纵横，满山都是梢林和齐人深的荒草，所以历来的军事家都视之为用武之地。清朝同治年间，此地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便利用此地进行埋伏，消灭了数千清兵，并杀死了三个总兵。至今那三个总兵合葬的大坟堆和数千清兵合葬的所谓“白骨忠义坟”，遗迹犹存。1935年10月，蒋介石派兵对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一一零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也是在此地被我由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卡车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鼓作气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而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接着，穿过层峦叠障的峡谷，峰回路转走了一段，绕过一段弯道来到一个宽阔山坳。这里是个下坡，卡车自然轻快了许多。

“砰！”突然传来一声像是枪又像是鞭炮的声响。

“什么声音？”陈友才警惕地问了一句。

“好像是鞭子。”刘久洲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这里人烟稀少，又不见有放牧的，哪来的鞭子响！”不知是谁疑惑地插了一句。

话音未落，接着又是“砰砰”几声。

听到枪响，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战斗经验的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出现枪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他透过驾驶室的玻璃，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和卡车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中间有一被当地人称之为“湫”的深水潭，公路路基建在潭上，将潭一分为二。潭左是一片大苇塘，苇塘后边是山崖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大梢林之后是连着一个又一个圆形山包的大山沟。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条300多米宽30多米高的大坝梁，坝梁的一侧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从坝梁下望，谷地一览无余。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后侧的崖畔间，也都响起了枪声。他立刻断定，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于是命令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快速前进，冲上坝梁。他认为，只有冲过坝梁，才能摆脱敌人。

司机老李也感到情况危急，立即加大油门，向坝梁勇猛冲去。就在这时，埋伏在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

周恩来更加断定，这是敌人搞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在车轮被打瘪，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后，他敏捷地跳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也断定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他首先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保护周恩来迅速转移，接着又命令陈国桥，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一个个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又都是长枪，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他们带的都是短枪，百米以外难以给敌人造成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枪弹，但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也

许是因为他挥舞手臂示意警卫员掩护周恩来撤离的举动，也许是因为他头戴礼帽，穿着的那套他随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西服，吸引了众多敌人的注意，一齐集中火力向他射来。当敌人集中火力一齐射向他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人力，就越能减少周副主席和同志们的危险，便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伏击周恩来一行的，正是在这一带活动的股匪。为首的头目叫李清伍，本是河南人，早年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从小就不安分，耍枪弄棒，且长于心计，长大以后，很快成了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万泉，李清伍股匪被收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一说是独立营），李被任为指导员（一说教导员），在黄龙山金盆湾和黄泥湾一带驻防。但他匪性不改，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1936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围攻陕北红军，他带人杀了万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收缴了县机关枪支，率众反水。

这一带土匪众多，有数千之众，大多三五成群，夜聚昼散。其中人数最多（有一二百人）、危害最大的就是李清伍、齐金权这一股。他们以封建帮会哥老会为依托，和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为首的民团（有90多人）相勾结，四出抢掠。前不久，在劳山北麓三十里铺发生的东北军卡车被劫事件，就是他们干的。4月23日，他们接到安插在延安城内的坐探冯长斗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即率领100多名匪徒离开金盆湾，连夜翻过龙盘山来到沿湫山附近埋伏。

李清伍之所以选择沿湫山畔这个簸箕形的山动作作为伏击点，是因为这里左右陡峭的山崖，左右纵横交错的山沟，南有坝梁，只要控制住南北东三个方向，就能使对方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唯一的出路只有弃车而走。这样，他们就可如探囊取物，既捞到肥油，又不受损失，还便于撤退。前不久，他们拦劫东北军的卡车，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

李清伍指挥部设在坝梁顶上的山神庙里，透过在后墙上挖的了望孔，一边观察，一边指挥。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站在庙门口守卫的护兵李卓才，挟着支马枪跑进小庙，对李清伍说：“看，那几个……”

李清伍一看，见谷地上有几个人下了公路，进入梢林。他“嗯”了一声，说：“早就看到了。”

“那就快叫人去追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得意洋洋地说，“细软都在车上呢，他们带不走多少，不要那么小气嘛！”

三、突围

李卓才说的那几个人，其中就有周恩来。

根据敌人的射击位置，周恩来判定坝梁已被封锁，左翼峭壁和苇塘那边的山谷，也有埋伏，唯独右侧荒草和梢林那边一派沉寂，于是当机立断，把手向梢林那边一挥：“突围！尽快摆脱敌人！”随即带领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草地和梢林。

他们进入梢林后，虽然敌人也劈劈啪啪打来一阵枪，直打得树枝、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他们转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有人堵截。这时，才发现张云逸手部被子弹擦伤，伤了一点皮肉，孔石泉衣

领右侧被穿了几个洞，但未伤着。最使大家欣慰的是，周恩来安然无恙。

正行之间，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四人不由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红军战士。临近一问，才知这战士叫曹鸿都，是特务队的，奉副排长陈国桥之命撤出战斗，赶来保护周副主席的。

五个人透迤而行，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高处的一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沿湫山的枪声。周恩来向枪响的方向久久地仁立着，一声不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倒像一帮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周恩来点点头。

于是，五个人沿着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这一带树林稠密，路径七弯八拐，很难辨别方向，所幸此时正是春天大忙季节，山岭上已有不少老乡在耕作。曹鸿都便跑去向一位老乡问路。谁知老乡神色慌张，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

“老乡当然不敢说话了。人家哪里知道你是好人！”周恩来微笑着，指指曹鸿都手里的盒子枪，“还是装进套子吧！”

曹鸿都这才恍然大悟，把盒子枪装进套，再次去向老乡问路。老乡得知他们是红军，很痛快地告诉他：“从这个山梁下去，就是三十里铺。”特务队的人都知道，延安保卫局在这里设有一个检查站，他们便奔三十里铺走去。

就他们这次突围的过程，我们曾访问过原成都军区政委现已82岁的孔石泉将军，也访过曹鸿都。

孔石泉将军说：“当时敌人很疯狂，不断向我们射来密集的子弹。我们撤下公路，是凭借着茅草、梢林的掩护，迅速转进一个小山坳的。……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几个人并不集中在一起走，而是分散开，相互保持一段距离。……那里没有路，一路都是山坡坡，很不好走……”

除上面孔石泉将军讲的这一段情况外，曹鸿都的回忆则更具体。他说：“我们转过几个山头，来到一个山谷。糟糕！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满是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首长们怎么能通过？我急得满头大汗。周副主席鼓励说：‘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我忽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丈许。我往上一跳，抓住了树枝，一摇一荡，脚在崖壁上蹬了几蹬，像猴子一般。竟然上到了崖上。”按他的说法，接下去就是他把绑腿解下来，用绑腿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分别拽到了崖上。

周恩来能够脱离险境，自然也与陈友才、陈国桥他们的奋勇抗击有关。

周恩来等人撤下公路后，作为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拖着受伤的腿，利用卡车掩护，拼命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

陈国桥见陈友才壮烈牺牲，眼里喷出了火。他强压着悲痛，鼓励特务队的战士们：“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

战士们在副排长的鼓励下，顽强地战斗。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步步进逼。

陈国桥打算组织火力，进行更有效的反击。他喊班长邓庭荣，这个在红军长征路上参军、爱说爱逗、打仗灵活快速的四川籍战士，早已倒在血泊中牺牲了。他又喊副班长王开明，王开明腿部已负了伤，无法向陈国桥靠拢。

他把几颗手榴弹摆在面前，准备和敌人最后一拼。再往远处一望，一个身穿灰布军服、头戴红星军帽的战士，倒在血泊中。面对这些牺牲的战友，陈国桥恨不得迎上去和敌人同归于尽。但是——他估计周恩来等首长已经走远，不能再让战士做无谓的牺牲。他看了看战士小向、小陈，还有温太林、曹鸿都，对他们说：“这里由我和王开明顶着，你们赶快撤出战斗！”

正说着，又一排子弹打来，刘久洲、温太林、小向相继负伤，昏迷过去。

“副排长，要走咱们一起走，要打咱们一起打。我不能先走。”19岁的曹鸿都不愿撤。

“快撤！这是命令！”陈国桥急了。

曹鸿都还要争辩，陈国桥爬过去，揪住他的后衣领子揉了一下：“这又不是叫你去逃命，是要你去保护首长！”

曹鸿都无奈，只好撤出战斗，钻进梢林去追赶周恩来等人。

陈国桥和王开明等继续同敌人战斗，子弹打光了，仅剩了几颗短把手榴弹。敌人见我方停止了射击，嚎叫着立即向卡车扑来。

等敌人临近了，陈国桥和王开明抬起身，甩出了两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与此同时，敌人向他们射来一排密集的子弹。陈国桥这个宁都起义的老战士，和王开明都被夺去了生命……

匪徒们一窝蜂似地拥向卡车，搜检财物。谁知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更无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两只上了锁的铁皮箱子。

李清伍的小护兵李卓才，什么也没搜到，气恼地拿牺牲的战士撒气。另一个拿鬼头刀的匪徒，则对周恩来丢下的那条花毛毯乱砍乱剁——如今这条花毛毯保存在革命军事博物馆。

李清伍和齐金权指挥匪徒，对牺牲的战士一个个搜检，当他们搜到陈友才时，不由一震。他们见他相貌堂堂，兜里又装着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其实，这张名片是他为了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带在身上的），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

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李清伍听说那就是周恩来，又惊又怕，不禁脱口惊呼：坏了，这下敦下乱子了，快，快跑！”

他们见闯下了大乱子，便抬上那两只铁皮箱子，仓皇而逃。他们原以为箱子里会有金银财宝和烟土，结果抬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山坳里，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全是中外文书籍和文件。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四、驰援

周恩来一行，离开那位指路的老乡，进入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岔，穿过密密的林莽，拐进另一个山弯，见山崖上有几孔窑洞。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叫马布塔河村，刚才穿过的是劳山的支脉火焰山。这里离三十里铺，还有好几里地。

他们继续趱行。当钻出梢林，接近咸榆公路时，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站住！干甚的？”几个人不由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是几名红军战士，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这几名战士是陕北独立师三连侦察班的。他们在班长侯彦明率领下，从劳山一边甘泉县的驻地，去延安公干回来，正在此打尖休息。孔石泉便走过去招呼：“你们连我也不认识了。”侯彦明也认出了他是师部参谋，

其实是政治部主任。孔石泉简要地介绍了一个沿湫山发生的情况，然后命侯彦明带战士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抢救伤号，警戒现场。

侯彦明带领战士跑步出发后，周恩来一行往三十里铺赶去。

三十里铺检查站，是延安南边的一个重要关卡，南通甘泉、洛川、西安，东至临镇，金盆湾、黄龙山。检查站的任务，是检验进入延安的车辆、人员，查缉贩毒走私，防止坏人混入延安和保障边区的经济秩序。

周恩来等人来到检查站，检查站云站长立即安排他们上炕休息，同时报告了延安。

周副主席一行遭到敌人伏击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延安上上下下都很震惊。

消息怎么传到延安的，历来其说不一。有说是驻守在附近山头上的通讯班，听到枪声后立即打电话报告红军总部的。有说是当时电话线已被切断，他们是起用了另一条备用线报告的。有的说，他们见电话不通，便派人与附近的驻军联系，通过附近驻军报告的。也有的说，周副主席的车从三十里铺过去不久，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听到劳山方面传来的枪声，立即打电话报告延安的。不论哪种说法正确，反正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

军委警卫团团团长黄霖，接到总参一局的电话，当即从床头抄起警卫员的一支手枪，冲出窑洞去集合队伍。他刚冲出窑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下令把集中喂养的中央领导人的马匹通通牵来了。黄霖顾不得清点人数，便命令几十名干部战士上马出发。正要起程，毛主席赶来了，他向黄霖抬抬手，告诉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然后示意黄霖迅速出发。

保卫处周兴得到消息后，也很震动，他一面向党中央报告，一面派于桑带特务队骑兵排前往驰援。骑兵排一走，他又派人送鸡毛信给白寿康、李太渊，命他们率独立团增援，然后又派人送信给正在前线执行剿匪任务的南区司令员吴台亮，令他火速返回延安商讨对策。

此时，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一部分民兵，准备出发。

随着一批批骑兵出发，延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市民百姓，再无心办公、生产，纷纷涌向街头，打探消息。清凉山红军大学的学员，也无心上课，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担任四大队政委的董必武，不得不出面召集他们讲话，要他们安下心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延安南门外广场上也集聚了很多人。有党政机关干部，有市民，也有工人和农民。有的打探消息，有的子搭凉棚跷脚向劳山方向眺望。朱德、张闻天都来了，李富春也夹在其中。

毛泽东也来了。他一向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从容不迫，甚至还讲几句风趣的话。此时，他却一反往常，不与任何人讲一句话，手里夹根纸烟，也不吸，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焦躁不安，急切地期待着周副主席安全归来。

五、清场

黄霖骑的是肖劲光的马。这马本来比别的跑的就快，再加上他不断扬鞭，离开延安一个多小时，黄霖就赶到了三十里铺检查站。

一进院，他就冲正在院中警戒的曹鸿都问：“周副主席在哪里？没事

吧？”曹鸿都告诉他，周恩来、张云逸等人均没事，正在屋里休息。他三步两步进了屋。

周恩来见到黄霖，知道他是来增援的，就问：“来了多少人？”“一百多”。黄霖回答。

“他们呢？”

“在后边，就到了。”

正说着，有七八名红军战士，气喘吁吁地走进来。黄霖当即分配任务：“你们几个留下放哨，无论如何要保证周副主席和各位首长的安全。其余的人跟我出发，坚决消灭这伙坏蛋！”说着，提枪就要往外走。

“嗯，先别忙。”周恩来拦住他，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干部了？”

“我是班长。”一位红军战士答道，“指导员和排长马上就到。”这时，又有十几骑到达。“哪一位是干部？”周恩来又问。指导员答话后，周恩来叫黄霖把干部组织起来，分分工，并交待说：“再派些人去现场，看有没有负伤的，走散的，好好找一找，要首先进行抢救……”

随即，由指导员率领几十骑陆续到达的红军战士，出发前往沿湫山。张云逸和检查站云站长，也随队前往。

沿湫山离三十里铺约有 15 华里。他们到达时，战斗早已结束，匪徒们也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卡车停在山坳谷地的公路上，车头和车厢弹痕累累。公路边，田埂旁，到处是血，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红军战士的，也有匪徒的。行李卷、文件袋杂乱地丢弃在卡车周围。

不难猜到这场战斗是何等惨烈，红军战士是何等英勇。看到眼前的景象，身经百战、不知打过多少大仗恶仗的张云逸，眼里不由滚起了泪花。

他们顾不上别的，首先对躺在血泊中的战士，一个挨一个进行察看，看其中还有没有活着的。察看的结果，他们发现，刘久洲、温太林、陈贤仁和李生财脉搏还在跳动，便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云站长已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从附近的苏家河、登山峪、林沟等村子，动员了一部分群众，带着门板、铁锹和独轮车前来，帮助抬运伤员和打扫战场。

在血泊中，张云逸找到了曾洪才。他已经壮烈牺牲了，但他随身携带的电报密码本还在。张云逸看了看，没有发现被人翻动的痕迹。尽管如此，他考虑到安全，考虑到密码本已失控几小时，根据保密原则，还是把它销毁了。

于桑率领的骑兵排是第二批赶到三十里铺检查站的。周恩来嘱咐他：“马上去现场，要把受伤的同志和牺牲同志的遗体都带回来。”

于桑赶到现场时，已近傍晚。

负伤的同志已经由担架和独轮车运走了，只有烈士的遗体还没有运。要动员群众往回抬，这里离延安有 50 多里地，差不多得甲一天的时间。于桑他们看了看那辆被打得满目疮痍的卡车，发现它轮胎虽然瘪了，但发动机还完好无损，还能发动。于是，于桑便指挥大家，将烈士的遗体抬上卡车，发动引擎，离开现场，缓缓向延安方向开动。

至于丢弃在那里的十几个匪徒的尸体，则由当地老乡，拖到路旁的破窑里埋了。

周恩来一直留在检查站，直到张云逸从沿湫山现场回来，得知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有了着落，才离开检查站，和黄霖等人乘马返回延安。因马匹不够，孔石泉、吴涛、曹鸿都等，只得步行，回到延安，夜已很深了。

六、征程

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和谈代表。尽管昨天遭到了伏击，又在突围时爬山越岭、披荆斩棘，步行走了几个小时。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还是在4月26日一大早就做好了再次起程、赶往西安的准备。真是硝烟未尽，又踏征程。

这次，周恩来没有再乘卡车，而是电告西安国民党行辕主任顾祝同，要顾祝同派了一架小飞机到延安来接。

他的安全太重要了，这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更重要是关系到他所肩负的使命。

昨天，周恩来和张云逸脱险归来，从三十里铺骑马还未到延安南门，就远远地看到南门外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冲他们来的方向翘望。显然，在期望他能安全归来。临近广场，周恩来翻身下马，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如滚雷，如波涛，经久不息。这是对周恩来崇敬之情的感情迸发。在掌声中，人们自动闪出一条通路，毛泽东大步迎上来，伸开双臂，周恩来也紧走几步迎上去，伸出双手。四只巨手紧紧握在一起，四只眼睛深情地对望着。朱德、张闻天、李富春、肖劲光等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围拢来，和周恩来握手和问候。今天，起程前，周恩来匆匆吃过早饭，就赶到军委医务所，向医生询问每一个负伤同志的伤情和救治情况，嘱咐医生要千方百计给予救治，使这些同志能尽快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随后他又走进病房，对伤员逐个进行探望和慰问。

刘久洲伤势严重，子弹打伤了臂部，中枢神经受损，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

周恩来走进刘久洲的病房，首先问在场的医务人员：“久洲怎么样，脱险了吗？”接着走到刘久洲的病床前，见刘久洲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他爱怜地弯下腰，轻轻去抚摸。

刘久洲是周恩来的警卫员。他14岁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在半睡半醒状态中，感到有人抚摸他的脸，他努力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看，吃力地：

“周副主席……”

“小鬼。”

“你没事吧？”

“我很好。”

想到自己是警卫员，短时间不能再去保卫首长，刘久洲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周恩来安慰了他几句，转身又对在场的医护人员说：“这小鬼机灵，打仗很勇敢。这次是九死一生……”

1969年，周恩来去北京前门饭店。这时刘久洲已是前门饭店革委会主任。他高兴地指着刘久洲，对在场的人说：“30年了。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看完伤员，周恩来才乘上飞机去西安。这是一架双座的小型战斗机，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这次到西安，周恩来带去了《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他会见了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和国民党方面的张

冲、顾祝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仅迫使杨虎城交出兵权，而且逼着他出国“考察”。对这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做出特殊贡献的将军，周恩来进行了抚慰。

这时邓颖超同志正在西安养病，周恩来向她谈了在劳山遭土匪伏击的事。后来邓大姐在谈起这件事情时，仍然记忆犹新。她说：“那时我们不像你们现在这么紧张。人平平安安回来了，就行了，就没有把它当回事。”

5月中旬，在劳山脱险的张云逸、孔石泉到了西安，在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把他们介绍给了童小鹏等：“他们是我在劳山遇险的战友和难友。”童小鹏提议为他们照张像做纪念，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都赞成，于是，童小鹏拿出相机，对好焦距，为他们拍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照片上，周恩来居中，张、孔分立左右，周恩来、孔石泉剃着光头，孔石泉的军服显然长了。

50多年过去了，孔石泉将军在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周副主席称我们是战友和难友。他总是这样平等待人。”他还指着保存下来的照片说：“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乡下，不像城里人，不会照像，我的年不应该又在腰间的。”

在西安，周恩来同样没有忘记那些在劳山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听张云逸、孔石泉讲述了延安对11位烈士的善后安排，心里才宽慰了一些。

在11位烈士中，有8位是在沿湫山当场牺牲的。和温太林一起被抬回延安住进医院后的李生财，因伤势过重未能抢救过来，几天后牺牲了。

对11位烈士，红军总参谋部于4月29日，即“劳山事件”后的第四天，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开了有党政军各界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议由肖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延安党政军各界，送了花圈，进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将烈士的遗体用棺木盛殓，分别安葬进凤凰山麓和嘉岭山（今宝塔山）下的公墓。

七、除恶

周恩来在劳山遭伏击的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由省委书记郭洪涛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兼南区剿匪司令吴台亮作了检讨。会议就剿匪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对策，责成吴台亮具体组织实施。

鉴于当时对匪情不明，他们一方面以伏击周恩来卡车一案为突破口，迅速调集兵力，实施四面包围，切断匪徒逃窜的退路；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土匪线索。很快，已暴露的一些小股土匪纷纷落网。

边区保卫处由周兴主持，从所属各县保卫局和区政府锄奸人员中，选调了一批干练人员，组成了若干侦察组，化装深入土匪经常出没的村寨，进行侦察。边区保卫处侦察科长谢志群，还带了两名侦察员，化装到国民党统治的甘泉县，进行隐蔽侦察。

延安保卫局的张丕谋和李树标，则化装成货郎，去了金盆湾、麻洞川、老沟一带。

当时，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也发表电讯、文章积极配合。

张丕谋和李树标接受任务后，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破案，他们决定分头行动；张丕谋去麻洞川、老沟；李树标去金盆湾、赵家河。一天，张丕谋在老沟村获悉，在黄龙山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李清伍，最近很少回家，偶尔回

来一次，也是晚间悄悄地来，天不亮就悄悄地走。张丕谋抓住这一线索，进一步深入了解，得知李清伍在劳山事件前四五天，曾带几个人回家一次，从那之后再没回来过。恰巧，这天赵家河的了凤山来到老沟，在李清伍家坐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走了。

丁凤山曾是土匪的坐地大爷，曾为土匪搜集情报和传递消息，窝藏赃物，坐地分赃。张丕谋觉察到他到李清伍家去，绝非偶然，便挑上货郎担跟踪而去。在麻洞川一家小酒馆抓住了丁凤山。经过做工作，丁凤山交待，劳山伏击卡车事系李清伍股匪所为。这股土匪由李清伍率领，现隐藏在赵家河，因害怕被歼，准备三四天就离开。他去老沟，是受李清伍之托，给李清伍的家属报信的。

张丕谋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向上级作了报告。吴台亮立即率领精锐部队，对李清伍股匪进行了围歼。但没有抓到李清伍。

原来，伏击周恩来的卡车后一直惶惶不安的李清伍，凭借自己的狡猾，躲过了赵家河的围歼，利用哥老会的关系躲到了韩城，后又觉得韩城离延安太近，就又跑到山西临清县樊条屯，躲在一户姓张的同乡家里。

延安周围的土匪，在剿匪部队大力进剿下，很快就被肃清了。曾经潜伏在延安城内，为李清伍提供袭击周恩来卡车情报的坐探冯长斗，也被捕获，受到了镇压。这年冬天，李清伍见政府再没有追究伏击卡车的事，便潜回了老沟家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一潜回家中，就被我锄奸人员发现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终于没有逃脱人民的惩罚。

劳山事件多少年过去了，周恩来对在这次事件中，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一直念念不忘。1950年，周恩来和邓大姐去大连。周恩来对大连警备司令、1937年曾任军委警卫团连长的陈美福说：“那次，若不是陈友才他们硬叫我先走，恐怕我早就完了。”1970年6月，邓大姐去延安，在对在场的人谈起劳山事件时说：“陈友才是个好同志，他是代替周恩来同志牺牲的，我们现在想起他，还觉得难过。我们会常常记得他的。”

1973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访问，曾询问在劳山事件中牺牲的陈友才等同志坟墓在什么地方，准备前往祭扫。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没有保存下来。周恩来十分惋惜，建议地委同志好好找一找，并说：“陈友才同志死得很英勇。要把牺牲的同志姓名搞清楚，将他们请进烈士陵园。给他们立个碑。”周恩来的这些愿望，有的实现了，有的还在继续努力之中。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的沿湫山发生战斗的地方，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周恩来这次遇险事件。正是：

望青山苍苍，听松柏涛涛；
忆劳山枪声，念壮士悠悠。

夜出水西门——周恩来太原突围纪实

赵杜来

9月，周恩来随同派去保卫山西省会太原的八路军到了前线……但太原还是没有守住。日方大量增兵，周恩来在掩护人员退出城外最后一座桥时几乎遭到不幸。

这是英籍著名作家韩素音的新作《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的一段话。话虽不多，但却给我们点明了一个事实，即当时担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撤离山西省会太原时，“几乎遭到不幸”。

—

在看到韩素音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这本书之前，笔者曾沿着当年周副主席的足迹，就这次撤离太原时的前后经过，向当年跟周副主席一道撤离的一些同志做过采访，并查阅了当时的一些文件和资料。

据当年跟周副主席一道从太原撤出的同志回忆，和有关资料的记载，周副主席这次“几乎遭到不幸”，发生在1937年11月5日，也即“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不到4个月。

“七七”事变，是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整个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在侵占北平、天津之后，又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攻破了南口、张家口，继而进逼晋西北的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攻打河北省会保定，准备夺取河北的战略要地石家庄……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我党就已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要求，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派周副主席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但蒋介石毫无诚意，致使谈判一再陷入僵局。“七七”事变之后，举国上下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此起彼伏。但蒋介石仍旧抱着那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放，直到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借口日军驻上海特别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在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卫士兵击毙，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用重炮轰击闸北，其海军陆战队也于同时向闸北、江湾方面大举进攻，妄图占领上海，从而威胁到南京。“八一三”事变爆发，蒋介石这才慌了手脚，被迫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革命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3个师。

8月22日，八路军——五师先头部队从陕西三源地区出发，于31日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9月3日，八路军一二零师主力也从陕西省永富平出发，随一一五师之后，东渡黄河入晋。

周副主席是9月3日，同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离开西安，第二天到达潼关，由潼关渡过浊浪滔滔的黄河进入山西的。

周副主席进入山西时，由于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已逼近山西东北边境，山西境内兵荒马乱的景象到处可见，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加之这年秋天暴雨成灾，一些地方田地被毁，房屋被淹，几万

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以致广大居民人心惶惶，坐不安席，寝不安枕，不知所终。

周副主席进入山西后，立即和彭德怀、徐向前赶到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会见了正在那里指挥晋北军事防御的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同阎锡山商谈了八路军入晋后以太行山脉和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配合友军打击日寇的问题。接着，又同彭德怀赶到晋东北重镇大同，同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进行会商，强调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正规军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之后，又同彭德怀赶到保定、石家庄，会见了国民党在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徐永昌、程潜、刘峙、冯同安等人，腐谈了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在阜平等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有关事宜。

尽管周副主席等人入晋后，向阎锡山等人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八路军在林彪和聂荣臻指挥下，平型关一战，消灭了占领大同后，挥师南下，企图突破平型关、雁门关防线，进逼太原的日寇坂垣师团 1000 余人，击毁敌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余辆，取得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尽管阎锡山组织了 8 万兵力，在离太原以北 90 公里之处的忻口，由刚率部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举行了忻口会战，对南下的日军进行了狙击，但是由于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中国守军偏重于正面阻击，打阵地战，也即搞单纯的军事防御，没有听从周副主席的建议，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从侧面去袭击日本侵略军，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从而有效地阻止日本侵略军前进，结果导致进攻忻口的日军主力受挫之后，日本侵略者转而加强了沿正大铁路向晋东的进攻。这一路中国守军本来就弱，不顶打，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下，接连失利、致 10 月 10 日石家庄失守，10 月 28 日娘子关失守。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阎锡山生怕在忻口作战的部队被包抄，于是下令，退出忻口。11 月 2 日，忻口守军一退，从忻口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很快便逼近了太原。

二

忻口会战从 10 月初开始到 11 月 2 日撤出，打了将近一个月。

早在忻口会战一开始，周副主席就估计到，日本侵略军在占领石家庄之后，太原将是他们下一步进攻的主要目标，而忻口和娘子关又难以久守，于是向阎锡山建议，对太原的保卫应及早部署，并建议，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得胜利，不要拿众多的兵力去守城或正面进行阻击。但阎锡山根本听不进去，仍按他那套子进行防御。

11 月 2 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出席的有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以及赵承绶、傅作义等人，周副主席也应邀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首先强调了保卫太原的重要性，指出：“太原乃山西省城，且为华北军事重镇，如果太原失守，将影响整个战局。”接着提出了他坚守太原的作战方针，即以太原城为重点，依城野战，阻敌于太原以北，以掩护大部队及太原市民和物资的转移。并提出，太原城应以一有力部队据守。守城部队要与城外野战部队密切配合，以城内的存粮、弹药支援城外野战部队。守城部队和城外野战部队，统一由战区长官部指挥。

11 月 4 日，在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先头部队已抵达太原外围的紧急情

况下，阎锡山在他的长官公署再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的防守。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卫立煌、傅作义等晋军和中央军高级将领外，还特地发电邀请了黄绍竑、孙连仲。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楚溪春也在座，周副主席也应邀出席。

会上，阎锡山再次强调了固守太原的重要性之后，又扼要地谈了他的作战计划；以忻口撤下来的部队去守太原北郊既设工事。并派一部去汾河西岸的高山设守；从娘子关撤下来的孙连仲部去太原以东的高山工事据守；城内由傅作义部死守，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其实，阎锡山早已知道周副主席另有主张，卫立煌对此电不赞成。他之所以拿出来叫大家讨论，无非是故作姿态，想给人以民主的好印象，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孙连仲率部很快进入城东高山阵地，一旦太原失守，蒋介石怪罪下来，也好有个替罪羊。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的反对。黄绍竑说，不要说忻口和娘子关两个方面的部队正在败退。进入城外阵地来不及，即使来得及，那些工事由于督工官员的腐败，偷工减料，也靠不住，娘子关的工事就是实例；再说，太原四周都是高山，城在锅底，有这么多人马混杂其间，城池一旦被攻破，其危险将难以设想。与其让败退部队进入城外阵地，不如让败退部队撤至交通线两侧，进行休整，相机牵制，侧击来犯之敌。

黄绍竑的主张，立即获得了卫立煌、孙连仲的赞同。阎锡山部下的一些青年将领却无人表态。

阎阎双方争来争去，相持不下，在座的其他人有的闷头不语，有的因为几天没有睡觉，干脆打起了呼噜。

会议开到午夜一点多，也没争出个结果。阎锡山说：“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就按原来的部署办吧。”说完，又对赵戴文、朱绶光、楚溪春说了一句：“咱们走吧！”起身就往外走。

“你还没宣布散会呢！”楚溪春提醒说。

“这，你就不要管了。”阎锡山不耐烦地说。

阎锡山不宣而退，离开了会议厅，赵戴文、朱绶光、楚溪春紧随其后。

阎锡山一出来，就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在守城部队的引导与护送下，出了城门，越过戒备森严的汾河桥，连夜奔临汾方向而去。

阎锡山抗战不坚决，在一些将领中早有议论，但谁也没有想到他整日讲“要死守太原”、“与太原共存亡”，太原还没有打起来，他就溜了，而且溜得那么快。

三

阎锡山等悄悄地走出会议厅之后，再未回来，人们也都纷纷起立，离开了会场。

周副主席和卫立煌离开后，两人肩并肩走着。对今天的军事会议（尽管这时他们还不知道阎锡山已溜之大吉），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觉得傅作义守城担子太重，处境不会遂意。

两人肩并肩走了一段路之后，周副主席提议说：“走，我们看看宜生兄去！”

宜生，是傅作义的字。

“好吧！”卫立煌爽快地赞同。

这天，卫立煌的气色比之前两天刚从忻口前线下来时好多了，眼睛也不那么红了，沙哑了的嗓音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他虽不赞同周副主席的信仰和主义，但对周副主席的为人，特别是周副主席的军事才干和魄力，非常钦佩。

早在北伐战争前，卫立煌不仅在广州听过周副主席的讲演，而且听到周副主席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亲赴前线督战，攻下了粤东重镇惠州。1926年北伐，周副主席任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当时卫立煌在第一军当团长。从那时起，他就认为周副主席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次忻口会战，更使他加深了对周副主席军事才干的认识。

在组织忻口会战时，南京方面和阎锡山都希望让周副主席派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忻口阵地，和他们一道与日军打阵地战，作为忻口前线的指挥官，卫立煌也希望一二九师能加入，以加强他的正面防御力量。但周副主席坚持认为，“在决战问题上八路军不是主力，而在敌后打狙击才是它的特长，要给八路军以独立自主打击敌人的机会”，不赞成加入去打阵地战。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向阎锡山等人指出，挽救危亡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

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周副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卫立煌按阵地战的打法，打了23天，尽管杀伤不少日军，但自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损兵折将，而八路军一二九师侧面狙击和奇袭日军，却接连获胜，10月19日夜，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三营奇袭戒备森严的阳明堡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人在一周多的时间内，再没有能力对忻口友军阵地进行轰炸和扫射，创造了抗日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战绩。

周副主席和卫立煌走到傅作义的守城部队指挥部。此时，傅作义的指挥部已迁到阎锡山长官公署大门以里的“东花苑”内。

当时任指挥部机要秘书科长的茹润生，闻报将周副主席和卫立煌接了进去。据茹润生回忆，他接周副主席和卫立煌进去之后，见他们与傅作义交谈，自己没有什么事，就退了出来。他们谈完之后，茹仍把他们送了出去。

他返回后，听傅作义感慨地说：“听周将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周副主席究竟向傅作义谈了些什么呢？

傅作义将军自接受守城任务后，全然抱定了与太原共存亡的决心，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快速部署。

为了造成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傅作义下令将城堵死，并实行分区防守，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因为他自己带的最有战斗力的35军3个旅，加上其他由散兵、败兵组织起来队伍，也不过万余人，要想守住周长32华里的太原城不被攻破，实在是捉襟见肘，令人堪忧。

就在傅作义忧心如焚的时候，周副主席和卫立煌来了。

他们寒暄了几句，接着谈起了防守太原的问题。

周副主席听了傅作义关于守城的部署之后说：“傅将军是守城名将，勇敢善战，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当前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由于日军的强大和武器精良，这就规定了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复杂的。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对我们来说，能够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够保持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因此，在战略上不应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务请傅将军能够深思熟虑。”

傅作义听了周副主席的话，频频点头，抑郁的心情顿时开朗多了。

三人又谈了一会，周副主席和卫立煌便起身告辞。告辞前，卫立煌写了一个“相机撤退”的手令，交给了傅作义。

四

周副主席从傅作义指挥部出来，回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连夜伏案起草给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的电报：“东线八路军应以一个支队向山西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侧翼运输和收容散兵。”并令一二零师在忻口通往太原的路上多处设伏，延缓和阻击南下之敌，为守城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11月5日上午，日军已逼近太原市郊，和守城部队的前哨交了火，并有几十架日机不时飞临太原上空，进行轮番侦察和轰炸扫射。

由于督建防御工事官员的腐败，贪污受贿，偷工减料，城外所建工事糟得不能再糟，一遭日炮轰击，即被摧毁。尽管守卫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于不支，火车站、大营盘、双塔寺等地沦于敌手。

太原四周多山，城区就像一个锅底，城东高地特别是双塔寺的失守，使太原更加岌岌可危。

双塔寺位于城东南，是太原城东南的一处制高点。它背靠太原，有一片开阔地，登塔远眺，一望无际的古晋阳平地 and 太原城内鳞次栉比的建筑，可以尽收眼底。

下午，日军占领城东高地之后，便在牛头寨等制高点，架起大炮，居高临下，向城内猛烈轰击。城内多处建筑被击中起火，烈焰腾腾，就连傅作义指挥部院内的勤远楼，也被日军炮火击中，顿时烟雾弥漫，铺天盖地。

阎锡山放弃守城指挥，悄悄溜走，本来就已造成人心动摇，再加上日军逼近，各机关、团体争相撤离，宪兵、警察大批出走，散兵游勇乘机抢掠，更使全城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傅作义虽及时任命了戒严司令，并派兵上街弹压，也无济于事。

太原城内虽然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仍然一如既往，在周副主席领导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线电仍；日不停地向天空发射电波和接受空中传来的信号。

周副主席从傅作义指挥部回来，拟完给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的电报，下达了给八路军一二零师的命令后，略事休息，便坐在用课桌拼起来的办公桌前，正襟危坐，或临轩阅读刚刚收到的电报，或伏案疾书起草文稿。或找人谈话，布置办事处撤离太原后党的地下工作，以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事宜。

办事处彭雪枫处长，则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部署和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

由于阎锡山，黄绍斌等已走，太原虽留下傅作义守城，周副主席估计守也守不了几天，于是报告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将办事处撤出。

上午，彭雪枫处长让办事处参谋张震将汽车送出太原，过了汾河，隐蔽河西待命，其他人一律坚守岗位，就连阎锡山长官公署派到办事处值班的汽车司机，也不例外。

汽车司机见其他机关溜的溜。走的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仍然一如既往，镇定自若，很不理解，就问办事处工作人员：“连阎长官、赵主席都走了，

情况这么紧，你们怎么还不快走？”

办事处工作人员回答：“他们走他们的，急什么！”

话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急。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廖其康和办事处机要员李金德，就一再催促过周副主席，要他尽早离开。但周副主席仍旧不急不躁，安之若素，一直工作到晚上，把所有应办理的事情办完，这才起身，收拾了一下，对廖其康和李金德说：“我们走吧！”

这时，办事处的同志已分批走了，只剩下了周副主席、彭雪枫、廖其康、李金德、王选文、张震和司机7个人。张震是上午将汽车隐蔽在城外汾河以西，又返回来迎周副主席的。廖其康将炊事员给他们留下的馒头热了热，把留给他们的鸡蛋打成蛋汤。7人吃完，已经晚上9点多了，他们才离开办事处，趁着夜色匆匆上路。

五

11月5日，太原城东、南、北三面城郊都被日军占领，只有西面未占。西面出城不远，便是汾河，河宽千米，河水滚滚，深可没人。河上没有渡船，只有两座陈旧不堪可单车通行的木桥。南边的一座已被日机炸毁，仅剩北边的一座尚可通行。

当时太原城西边有两个门，一个叫大西门，一个叫水西门。周副主席等一行，离开办事处后，在夜幕下冒着寒风直奔水西门。汽车开到水西门，水西门早被守城部队用沙袋堵死了。彭雪枫立即下车，与守门军官交涉，好说歹说，守门军官就是不答应，一定要傅作义亲自批准，才放出城。

彭雪枫虽然很气，但也别无他法，只好向周副主席说了一声，让周副主席和其他同志下车暂等，便带张震乘车前往城防司令部，去找傅作义。

他们走进傅作义的会客室，傅作义倒背着手正在踱来踱去。彭雪枫把来意说明后，傅作义立即提笔写了一道准予出城的手谕。彭雪枫拿着手谕和张震返回水西门，将手谕交给守门军官。这时城门已经封死，要扒开很难，但门旁事先挖了一个人行暗道，用沙袋围着，以备急需。守门军官令士兵搬掉沙袋，露出暗道。暗道很窄，汽车根本无法通过，周副主席只好将汽车丢掉，提上随身携带的电台和必需的物资，通过暗道，出了太原城。此时，城外混乱已极：马路上，军车、装甲车，你挨我我挨你；马路两旁，全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逃难的老百姓，携儿带女则被挤在马路两边的田地里。前边的走不动，后边的还要向前挤，开车的直按喇叭，当兵当官的骂骂咧咧，老百姓喊儿喊女，哭爹叫娘。

一打听，原来是往西和往东的汽车在桥上顶了牛，往西的汽车要往东的汽车退回去，往东的汽车则要往西的汽车退回来，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这么多车辆，这么多逃难的群众，这么多残兵败将！这是在夜间，如果是在白天，敌机一来，不知将有多少人死伤于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不知令多少车辆和物资毁于日军的罪恶之手。

周副主席一行走上桥头，从车辆、人群中迂回穿插，左拐右弯，也难以前行。只见宽不过丈许的木质桥面上，堵着东行西往的汽车，丢弃着难以辨认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地方的桥板已被拆掉，仅靠临时搭在正面的一根一尺多宽的木板过人。

目睹此情此景，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见周副主席紧皱的双眉和感觉到他那

深长粗放的呼吸。他心系群众，为国担忧。他对在侧的傅作义部的一位守城军官交待，要他马上下令，让部队原地待命，不得与逃难群众争路，抢道，严禁打骂百姓。并马上组织工程兵抢修桥面，派人疏导交通，务于次日拂晓之前，让拥挤在桥头的众多老百姓通过这座汾河桥。

这位守城军官不知是感于周副主席当机立断，明确安排，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选择所启示，还是被周副主席临危不慌，热爱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他就像常见的我军指挥员那样，很干脆地答应，一切照办。

周副主席并不仅仅是策划者，发令者，更不是旁观者。一方面，他协助城防军官劝导东来的车辆退回桥面，一面协助组织工兵清理丢弃在桥头的物资，以利修理桥面。直等到疏导、清理和修理等工作就绪，周副主席这才低声命令大家迅速过桥，并嘱咐：“文件要保管好，电台也要带好，一个紧跟一个，不要掉队！”

走着走着，前面有一处桥板已被装甲车轧断，一辆装甲车还停在那里，挡住了去路，空手人也难通过。周副主席当机立断，命令大家丢掉个人用品，全力以赴，把办事处的档案、电台等重要物资你扶我扛地弄过去。踩着桥上的丢弃物，从车辆、牲口中穿行，走了一段，又是一处难行之处，桥面塌陷，桥板已经掉到水里，只有一条宽不逾尺的活动木板架在塌陷的地方，踩上去颤颤悠悠，弄不好就会掉进河里。周副主席在前，大家在后，一个牵着一个，一步一步往前挪。周副主席过去之后，又一个一个把大家接应过去。然后又穿越丢弃物，绕过车辆、牲口。不到 1000 米的木桥，大家在寒风中借着微弱的星光走得满身是汗，走了几十分钟才穿过去。

到了河西，找着上午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开出来隐蔽待命的部分大小车辆，这时，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派来护送周副主席的一个加强班，在班长赖国柱和副班长李国良的率领下也赶到了。周副主席和彭雪枫分别乘上第一、第二辆卡车，旷伏兆带领警卫班乘上第三辆，便起程向汾阳方面进发。

这次撤离，由于周副主席率领大家连夜闯过了汾河木桥，才没有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也由于周副主席心系群众，不顾个人安危，命令并协助守城部队疏导交通，修理桥面，让逃难的群众和溃败的士兵、车辆、牲畜在拂晓之前顺利通过了汾河木桥，才未受到重大损失。

此后，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周副主席所料，在周副主席撤出的第三天，也即 11 月 8 日夜间，傅作义虽然指挥守城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终于不支，只好将太原放弃，把山西这一军事重镇丢给日寇。

太原虽然丢失了。但人们谁也不会忘记周副主席在太原的那些日子，更不会忘记周副主席在撤出时，不顾个人安危，处处为群众着想，疏导逃难群众和溃退官兵，免遭敌机轰炸、扫射的情景。

火海夺路——记长沙大火中的周恩来

陆高冲

1938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猛烈攻势，以35万陆海空部队北攻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中原腹地武汉，以7万陆海部队南取我唯一的国际通道、南方重镇广州。10月21日日寇占领了广州，接着又陷武汉，南北夹击，有如一把钳子钳住长沙。抗日战争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采取了火烧长沙的行动。

当时身处第一线的周恩来，面对这一局势是相当费力的，他利用这场大火去匡正国民党当局的荒唐的军事思想。

长沙大火这矢夜间，周恩来、叶剑英等4位同志正酣睡在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突然烈焰封门，全城街巷皆成火海，周恩来、叶剑英等惊醒后，拨火夺路，幸循一石板小路跑到湘江岸边。

整个长沙在大火中连续烧了两昼三夜，全城80%的房屋化为焦土，死伤两万余人，数十万灾民啼饥号寒，资财损失难以计算。

这是1938年11月12夜间到14日夜间发生的事。

—

周恩来是10月25日凌晨从汉口撤到长沙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领导机关，本来都设在汉口原日本租界的大石洋行的房子里。撤离汉口之夜，也是一个恐怖之夜。

撤离之前，武汉外围整整一天已经没有枪炮声。从安徽方向溯江进攻武汉的日军已兵临城下，中国抗战部队先几天早就开始转移，市郊市内无一兵一卒在抵抗。依照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作战部署，本来是要在武汉外围歼灭一股日军的，不料蒋介石的嫡系不听他指挥，撤走部队，留下了一个大口子。李宗仁眼看自己的广西地方部队将要被快速进军的日本军队合围，成为囊中之物，于是日夜兼程，大踏步撤向襄阳方向。

估计翌日晨日军必将入城，周恩来在夜幕中来到一家印刷所，要求他们留在汉口，转入隐蔽斗争。同时口授了《新华日报》最后一期社论《告武汉父老兄弟书》，阅了清样，准备明晨印发，并决定《新华日报》重庆版于25日接力出版。然后才握手话别乘车离去。街巷空冷，四野漆黑。

次日上午，江汉关大钟发出耻辱的悲鸣。这是武汉历史上最耻辱最黑暗的时刻！作为中国抗战中心的武汉，作为我国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完整地落入了敌寇之手。

凌晨1时过后，周恩来、叶剑英乘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给的那辆草绿色轿车，向长沙方向急驶。开车的是司机祝华，负责安全警卫的副官是邱南章，后面跟着的是一辆卡车，车上坐着电台人员和武装警卫。

那时公路路况很差，能做到汽车通行就算公路。天亮后要随时警惕日寇飞机的空袭。我《新华日报》包用的新升隆轮船，在驶往重庆的江面上就遭受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沉于江底，致使25位同志牺牲，蒙受了很大损失，幸而周恩来撤离武汉的当天天气变化，第二天又是大雨滂沱，日寇飞机无法肆虐，然而道路泥泞，不得不时走时停。

50多年过后的今天，祝华谈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可见当时作为司机他和负责安全警卫的副官邱南章，当时精神是何等的紧张。

周恩来选择的是沙市——公安——常德——长沙一线。一路之上食宿之处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这中间有个特别的原因，周恩来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在滂沱大雨中有人拦路挡车，此人便是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原来他的汽车坏了，周恩来便邀他一同上路，白将军和周恩来早有来往，他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很感兴趣，曾要他的广西部队学习，他的广西学生军开往抗日前线途经武汉时，还亲自邀请和陪同周恩来前去讲话。在这年3月保卫徐州时，他被派从武汉去徐州协助李宗仁，行前他登门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作战方针，后来获得台儿庄大捷，歼敌两万余人。因此，这位国民党将领中的“小诸葛”对周恩来极为钦佩。

在车上，周恩来分析，广州、武汉沦陷之后，广西桂林必将成为抗战重镇，在这里开辟工作至为重要，于是提出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白崇禧当即点头答应。不久，桂林果然成了中国南方抗战的中心城市。

二

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并没有掌握抗日战争的规律，丧师失地，日子很不好过。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称于世的《论持久战》等许多重要文章，大大安定了人心。八路军、新四军也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这时党中央在延安又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演说，指出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将要到来，我党正面临着更为繁重的任务。会议决定将长江局改为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辖华南、西南各省和上海市等，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在从汉口到长沙的转移途中，周恩来、叶剑英未作停留，日夜兼程，于第二天，也就是27日赶到了长沙，住进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长沙德高望重的老人徐特立。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在长沙就读时，曾受教于徐老。办事处设在寿星街2号一处老式小院，正房是幢两层的木楼，周恩来和叶剑英就住在楼上。寿星街同长沙其他古街陋巷一样，石板铺路，街道狭窄，周恩来乘坐的那辆小汽车往街上一停，行人几乎难以通过。

在武汉撤退以前和初到长沙，周恩来曾先后向蒋介石多次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在武汉撤退前后，提出如何对待武汉失守后将要遇到的新的困难问题：在日寇开始进军广州时，提交了《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书》；在长沙军事会议上谈了游击战问题，之后又与蒋介石面谈了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在武汉和长沙估计到国民党军队今后在敌后难以生存，几次向蒋介石等提出愿帮助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干部，等等。

周恩来这些有利于加强国民党和加强军事抗战的意见，都表示我们党诚心与他们合作抗战，并希望他们强大起来。何等光明磊落！而蒋介石则相反，他一直在利用抗日作战的“良机”，企图消灭或削弱国内的异己力量。长沙大火一个月后，他就当着我党代表的面声称，要取消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里去，“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周恩来虽然当面严正申述了我党的态度，但

并未因其坚持反动立场而改变对他团结抗战和帮助他渡过困难的初衷。

那时敌机经常飞到长沙狂轰滥炸，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在长沙市内同各界代表人物商谈抗战大计，并深入到学生和群众中做宣传教育工作，动员人们深入下层，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三

武汉保卫战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他本着努力抵抗日寇侵略的态度，先后投入 110 多万人，打了近三个月，给了进攻的 35 万日军以很大杀伤。

蒋介石是在 10 月 23 日从汉口秘密转移的。14 日他面见周恩来时，通报他已决定立即撤出武汉，但作为最高指挥官却一直坐镇。22 日他会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周恩来陪同），听取了八路军作战方针和一年的战绩，23 日前线已无战事可言，他才秘密转移，到湖南衡阳山中的指挥部，北御武汉南抗广州两方面的日军。同时，他把中央政府转移到重庆，定其为“陪都”，以表示他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是怎样秘密离开汉口的呢？有知道内情的人写道：那时汉口飞机场有几架飞机起飞向西而去，同时地上又有十分威武的汽车队同向驶去。他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只有极个别人知道。

蒋介石转移到衡阳南岳镇，国民党其他最高决策人物也都跟他一起齐聚南岳镇，而其公开活动地点则是长沙。这便是周恩来和叶剑英赶紧去长沙的原因。

武汉撤退之际，蒋介石本想来个“焦土抗战”，烧掉武汉，只因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并非他的嫡系，考虑到命令下去不仅可能无效反而可能烧身，才没有下。眼下，最高决策机关认为广州、武汉失守之后，自己的战斗部署已经打乱，在短时期内难以形成战斗力量，而日军必然乘锐猛进直取长沙。就这样，蒋介石在衡山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日军是要进攻长沙的，我们是要撤退的。长沙城要烧掉！火车厢要烧掉！拿不走的都烧掉！——后来许多与会将领都证实蒋介石曾数次宣布这一决心。

决心下了，那么让谁去烧呢？从军事作战上讲，长沙属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他的亲信，部队是他的嫡系。从行政上讲，长沙属湖南省，省长是为人忠厚的张治中。蒋介石一时尚未选定。什么时间动手烧，也没有定。

10 日，日军攻占岳阳。岳阳是长沙的北大门。唇亡齿寒。看来蒋介石不相信陈诚不久前吹出他能守三年两载的牛皮，作为最高统帅是他该下决断的时候了。岳阳丢失三天之后，蒋介石在衡山南岳临时官邸将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唤到面前，着令密电湖南省省长张治中执行放火任务。他没有选陈诚而选了手无兵卒的张治中。

张治中在长沙大火后不久写的《长沙火变一日记》中原文照录了这份密电。张写道：“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我正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讲话，适接蒋委员长文侍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旋又接林蔚电话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继又写道：“中午，我同辞修（即陈诚——笔者注）吃饭，低声问他：‘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他说：‘当然要做的。’”

事关蒋介石的电谕，张治中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

省保安处长徐权密定由警备司令部第二团实施，该团团长徐焜任焚城总指挥，并确定了焚城纲要和实施办法，诸如焚城须在军队自汨罗江撤退后，焚城前须施放空袭警报等。之所以施放空袭警报，一是为了排除阻碍；二是为了让居民躲离房屋，免遭烧死。从施放空袭警报看，是打算在白昼纵火的。

军机不可贻误，徐焜当即下令当晚提油举火实行临战演习。因此，晚上全城便布满了纵火的军人。

长沙原本是只有 30 万人口的省城，这时从武汉撤下来的机关、学校、团体、难民和伤兵挤满了角角落落，啼饥号寒、昼有敌机袭扰，夜无容身之所，都盼望中国军队能就此顶住日寇的进攻，在此过一段安宁的日子。加之前几天本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的嫡系陈诚曾当众拍胸脯打过保票，说什么武汉撤退是战略上的需要，军队并未受损失，（我的）九战区有几十万部队，日军已显兵力不足，我们可以支持湖南局面三年两载，因而对这里的战局是乐观的。人们似乎吃了定心丸。不料陈诚话音未落，10 日这天，日寇弄了几只舰船从汉口偷偷摸到岳阳城下，如同天降，一声炮响，陈诚的守卫部队魂消魄散，仓皇而逃，岳阳失守，中央当局随即决定长沙立即实行总撤退。于是整个长沙城军民上下对陈诚失去了信心，有如热锅里的蚂蚁一样，争相夺路，先离开长沙再作计议。

其实，日寇袭占岳阳，只是为了保护武汉的左翼免受威胁，并无力南下长沙。正如我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估计的那样，战争的相持阶段已经相对的到来。五年之后，即 1944 年 6 月，日寇为了挽救太平洋与美军作战的困境，才从岳阳攻长沙，下桂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军队的战斗力已远不如初期，败逃千里，长沙人民终于未能避免被日寇蹂躏的厄运。这是后事。

四

警备二团是在 11 月 13 日凌晨纵火焚城的。周恩来并不知道。他本来可以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人员一道撤离，但他没有走，他觉得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结果烈火封门，他和叶剑英、邱南章不得不拨火而出，夹杂在难民中间，深一脚浅一脚撤到江边。

11 月 13 日的前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依照惯例，上午长沙各界在一个广场集会纪念。虽然当局已下令总撤退，许多单位已经转移，街岗巡哨大部撤销，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但周恩来、叶剑英仍不放弃这个机会，到会讲演，宣传我党目前的主张。

下午，郭沫若的第三厅和演剧队、宣传队员及物资转移遇到困难，无法顺利撤离。正当手足无措之际，周恩来和叶剑英闻讯赶到。周恩来同他们商量，决定把人员和物资分类分车分批分时调度，同时抽调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车辆相助，第三厅和演剧队、宣传队才得以井井有条顺利转移。对此，郭沫若曾钦佩地写道：“周公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刻生出了澄清的感官……”，“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而他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

帮郭沫若收拾停当，已近午夜，周恩来顺手摇电话分别给陈诚和张治中，询问前方战况。回答说没有动静。张治中还热情而有把握地连声说：“风平

浪静！风平浪静！”

周恩来和叶剑英回到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一切已向湘潭县下摄司镇全部转移完毕，只有机要人员和他们使用的同延安和重庆的联络电台，在等候撤销联络任务后才能收机装车出发。夜里过了12点，周恩来让这辆车先走，以免白昼遇到敌机的袭扰和人多道塞，通行艰难，车走后，办事处就只剩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邱南章、司机王应絮四个人和一辆车。负责安全警卫的邱南章，此时不免心情紧张。他和王应絮早已收拾完毕，期待着立即出发，尽早离开这座已无城防的城市和已无防卫的孤院。

我们在采访他时，这位已年逾七旬的老人仍然不寒而栗地说：

这晚我和王应絮收拾好，等着出发。两位首长商量几句，周副主席面对我们说：今晚不走了，安心睡一觉，明日起程。他转脸向王应絮问了一下汽油的情况，然后叫我摇电话给陈诚的副官，问岳阳方面敌情有无变化——我理解：两位首长若再亲自问陈诚，明显不妥，只能叫我打电话——对方回答说，仍在洞庭湖以北未动。两位首长就上二楼去休息。那几天他们大劳累了，一会就都睡熟了。王应絮把车子停在大门当口，人朝车里一倒就睡了。我呢，按警卫人员的老习惯，在首长房门外架张床板，和着大衣就算睡下了，虽然心里紧张，但很快就睡蒙眬了。

凌晨2点前后的样子，接连几声爆炸把我惊醒了。我一轱辘爬起，就看见街上火光熊熊。不好！我赶紧推开首长的房门，喊道：“有情况！”他们醒了。我奔到楼下，看到王应絮在大门口同人争吵。是长沙爷备队的兵，有的手里拿着火把，有的提着洋油桶，粗野地指着王应絮说：“他妈的，再不走就烧死你啦！”王应絮自仗属八路军的机关，大声说：“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楼上还住着人，不能烧！”王应絮打军队的牌子对那帮家伙不起作用，我身穿国民党军官的衣服，大声喝令他们不能放火，他们也不理睬，另一个家伙把脑袋一摆说：“烧！这是上边的命令。你们走不走，我们管不着！”几个人有的撒煤油，有的点火，房子立即烧起来。我头上火星直冒，牙咬得咯咯响，要去揍他们。但一想到这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的目的我不知道，担心他们开枪对首长不利。转身上楼，两位首长衣服还没有穿好，我报告说长沙警备队来人烧着我们的房子。我那时顾不得被窝行李，和首长提着文件箱子立即跑出来。前院一片火，小楼也着了。我和两位首长冒着浓烟和烈火冲出大门，街邻房屋的火和办事处的火已连成了一片。我大声叫王应絮，王应絮和汽车都不见了。我以为汽车被那些兵放了火，后来才知道大火马上要引着汽车，司机只得开跑。王应絮回来找我们的时候，烈焰腾腾，已不能近前。

大火包围了我们，我急死了。这寿星街道非常窄，草木屋又多。我想跑到一条没有火的街上去，周副主席看到全城是火，便说：不要紧张，我知道路。这里离湘江不远，这石板路就是通到江边的，能冲出去。边说边跑。我看见人们被火赶到街上，乱跑乱窜，哭天号地，十分凄惨。烈火烧卷我们的眉发，浓烟呛得我们呼吸都困难。两位首长和我三个人手拉手，跌跌撞撞沿着石板路跑下去。江边已经挤满了难民，而且还在潮水般地涌来。有急急慌慌往前跑的，有呆主观望的。城里是耀眼的火光，江边是咫尺难辨的黑暗。哪里是路，哪里是滩，哪里是水，全不清楚。我们挤在难民中间。人多太乱，周副主席拉着我们往水边走，人少了些。我扛着文件箱子紧靠水边，防止首长踩到水里。高一脚低一脚正走着，忽然一只脚陷进淤泥拔不出来了，首长

拉着我用力一拽，脚倒是拔出来了，高筒皮靴都陷到了泥里。我只有这么一双皮靴，想伸手去摸出来，周副主席说：算了，小心两只脚都陷进去。我只好心疼地把另一只也甩了。后来，办事处的同志把这传说成故事，说我把皮靴挂在脖子上保卫首长。

邱南章老人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也不由得开心地笑了。他继续道。

在江边的时候，周、叶两位首长判断说：敌人一定不会逼近长沙，他们为什么自己要放火呢？为什么没有人救火呢？……人越惠路越长，天亮后才归到公路上。这时，在下摄司镇的武汉和长沙办事处的同志们，听说长沙城起了大火，又不见王应絮把首长拉来，祝华非常着急，忙开着车往城里赶来。幸好在路上遇上了我和两位首长。

对于这次脱险，国民党《中央日报》11月20日曾以《周恩来谈长沙脱险》为题发过一篇不到200字的电讯。电讯说：“长沙大火后，前已不明下落而为一般人士深切关怀的政治部周副部长恩来，今晨忽安全出现于长沙市内。记者得于某处相晤，见其丰采如故。周氏当即说明此次脱险经过，谓本月12日夜照料政治部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长沙后，仅叶剑英与余留长。当酣睡时，室中火起，初尚不知，旋经勤务唤起，火舌已伸入窗内，乃冲向江干遂避，随即沿铁路南去。途中与长沙南下的一部政工人员邂逅，继续南行。事毕乃返长沙。”

关于长沙纵火的情节和居民四处奔逃的情景，后来曾有许多人写文记叙。郭沫若也有记叙。周恩来、叶剑英帮郭沫若把第三厅和演出队、宣传队人员和物资调度好离开以后，郭沫若得悉岳阳前线风平浪静，人员、物资又已撤离，便决定暂住一夜，明晨再走。当夜，忽然警备队队伍纷纷走过来，看样子非常可怕。他在《洪波曲》中写道：“……这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更多了，有的气势汹汹走来干涉我们，问我们是什么机关，有的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枪托去撞各家的门。我便走出大街去看。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每隔十家光景便是一队，一样装束，一样背枪提洋油桶和小火炉。街头的火已经更多了。天心阁都燃烧起来了。天心阁是长沙城内最高的地方，那儿一起火，便好像举起烽火一样，全城的火接二连三地升上……”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大胆地问。”

“——奉命放火！那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敌人进城了吗？”

“——早就杀过泪罗江了。”

郭沫若继续写道：

“谁有办法呢？一街都是火海，一街都是人海，一街都是车子海。”

“放火的人似乎很有计划地为逃难者开了一条道，有那么一条街部没有放火，人和车子就像流水归槽的一样都涌向这里。车子便立刻陷入了重围，只能进不能退，进也像蜗虫一样，慢慢在地面梭动着。”

郭沫若就是这样在完全丧失了个人活动可能的条件下，坐在汽车里面被人拥出城的。如果遇到什么灾难，也只有活活挨着，而没有别的什么逃生之计。

当然，在这场大火中也有幸免的。一位饮食店老板就曾写道：那天晚上，警备队几个人来到他的店门口，肚子饿了要吃东西，他便生火做饭、切肉温酒。几位丘八（对国民党官兵的蔑称——笔者注）酒足饭饱之后，举火令已下，他们手下留情，便急忙出门到别处纵火去了。而这位饮食店老板的店房

才得以保全，没有被烧。

五

周恩来和叶剑英赶到湘潭县下摄司镇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新驻地后，正遇上从大火中冲出来的郭沫若焦急地前来找他。郭沫若诗人一般激愤地说，纵火队竟不顾他们强烈的反对，强行烧了他们三厅和周围的房子。周恩来听后“向来开朗愉快的脸上，充满了怒不可遏的神色”（郭语），断然说：这是当局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干的，而敌人绝未逼近。这仅仅有害于抗战，且会为敌人所利用！他拉着叶剑英、郭沫若两人要立即赶回长沙去察看，设法援救灾民。无奈这时天色已晚，只好作罢。这天是11月13日。

翌日一早他们驱车回城。无奈万千灾民拥塞大路，人车近前不得。他们只好爬到高地上遥望，只见满城烈火，浓烟蔽天，一任火舌舐没，不知何时才能熄灭！

看来一时难以返回长沙，他们只好回到办事处，连夜研究当前的战局和火灾情况，并准备次日去南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紧急会议，要求蒋介石处理长沙大火事件。

在次日的紧急会议上，有史料这样记载说，周恩来激愤异常，强调指出：在“坚壁清野”的口号下，在敌军尚远群众未撤的情况下，对长沙实行“焦土抗战”，实为一次谬举，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人民遭难。同时强烈提出：当前之计，一、拨款50万元救济灾民；二、调集5000民工清理城市；三、严惩纵火首犯。并要求同意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和三厅以及演出队人员，立即调入城内投入救火，并由他们主持发放灾款。

此时，深负内疚的张治中，非常感激自大革命时期便与他有深交的老友的主张。因为他知道这50万元如果由国民党大小官员去发放，克克扣扣，到灾民手里天知道还剩几何！

会上，蒋介石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羞羞答答一面说烧城市是对的，是八路军惯用的“坚壁清野”；同时又说烧长沙是错的，是因为“听信谣言”。他本人以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在向国民政府的呈报中是这样写的：“查我军对于重要城市与军事有关建筑物施行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的必要，长沙既临战区，事前准备亦为当然之事，乃地方军警当局于我军放弃岳州时，即听信谣言，惊慌躁急，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

至于蒋介石把他的“焦土政策”说成是八路军的“坚壁清野”，那完全是胡诌八扯，因为我党是一直反对“焦土抗战”的。

南岳会议一散，周恩来立即返回湘潭下摄司镇去找郭沫若，要郭沫若集合三厅以及演剧队、宣传队人员火速赶往长沙，执行救灾任务。而他自己则先行一步，进城到最高点天心阁察看了全城的灾情，并慰问了灾民。

他知道三厅、演剧队、宣传队那些文化人，他们连搬家转移都不会安排，自然对慰问灾民、恢复生活和发放赈款的工作，更加陌生，摸不着头绪，于是又赶到他们集合的地点，去做具体安排，又一次成为这批文化人活动的“导演”。

对于这段情况，当时演剧八队的刘斐章曾有如下一段生动的描述：

“16日下午一辆无篷卡车突然驶到衡阳含章中学门口，这里住着几个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郭沫若厅长跳下来一扫过去和蔼可敬的面容吩咐

着：通知全队快上车，要轻装。马上开车，周副部长在长沙等我们。除了病员，应召的人们不到十分钟上齐开车，气氛很神秘紧张，但心情很荣幸兴奋，因为周恩来在召唤我们！五个队一百多名男女挤在一幢没有烧的房子里席地而坐。周恩来身穿粗旧的灰色中山装，来到我们中间，站着讲话。

“他首先明白地指出这是当局施行‘焦土政策’的错误所造成的。这是人为的灾祸。施行一片焦土敌人并不怕，也不能说明抗日的决心，这种措施决不是八路军的‘坚壁清野’。”

“大火的仇恨和错误怎么记？他说：一是要向人们讲清楚，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罪魁祸首要严惩，但是若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的身上。

“什么任务？他说，鼓舞人民重建家园，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促进政府抗战，防止破坏统一战线，这是全局问题！”

“什么内容？他说：做好救济和火灾善后工作，做好宣传工作。

“怎么组织，他说：名称叫‘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分成宣传、救济、调查三个组，人人要佩带上盖有‘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关印的袖章，以方便活动。”

“经过他细心指点，这批缺乏办事经验的青年文化人居然成为扭转社会局面的主力，赈款来到。周恩来又来到突击队具体安排放赈，安排完毕，他问大家，几万人在广场里领赈金，敌机临空你们怎么办？他说事先告诉民众，一个人也不许跑动，你们要首先有自我牺牲精神，你们不动，灾民就不会乱，秩序一乱就会挤死人。他鼓励大家说，我和叶剑英同志一定前来帮助你们的！”

刘斐章接着又写道：

“那天敌机果然临空，群众虽极为恐怖，但鸦雀无声，纹丝不动，场面真叫人感动。

“宣传组利用废墟中扒出的铅印机办时事小报（每期周恩来审校底稿），组织难童叫卖，音乐家任光按小风琴教报童唱《卖报歌》。调查组组织群众自救救人，使大劫难后的长沙人民在绝境中兀然站起来。张治中原以为一片‘破砖残瓦败壁颓垣的局面’难以收拾，看到这种情况，他非常感激郭沫若的三厅人员竟做出出人意料的的成绩。他称赞说：‘一部分政工人员特别是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政工人员及早抓了急救工作，使这一个劫后省城逐渐有了生机。’他嘉奖三厅人员3万元，周恩来又和三厅人员把款转赈灾民。”

从刘斐章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次长沙大火中的周恩来料事之精细，见解之深邃，目光之敏锐，思路之缜密，处事之审慎，态度之不苟，情感之真挚，精力之充沛。同时还可以看出他的崇实、务实的品格和苦干实干的作风。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有位古人说得好：“虑于民也深，则其谋也精。”虑民愈深，其谋愈精，这是别的信仰的人所不能及的！

六

此次延续两昼三夜的长沙大火，导致了两万多人的伤亡，百分之八十的房屋化为焦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啼饥号寒，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群情激愤，他们一致强烈要求：彻查火灾，惩办元凶。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调查纵火命令的下达者。

调查结果，省长张治中说他没有下，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说他没有下，省保安处处长徐权和警备二团团团长徐焜也都说没有下。

那么纵火的命令究竟是谁下的呢？

其实谁都没有下，完全是天外来祸！

是11月12日晚警备二团举行纵火实战演习时听信谣言所致。当时人们对国民党军队抗敌已失去信心，好似末日来临，恐怖万分，神经脆弱到再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地步。这天晚上不知是哪个地方冒出了火光，还是传出了敌人逼近的谣言，举行纵火实战演习的警备二团官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误以为下了命令，便一起举火。整个长沙古城登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面对追究，身负焚城“钦差”之命的张治中，虽未下令，但也有口难言，只好引咎自责，表示“腩颜待罪，痛苦殊深”。尤其焚城前那天中午吃饭时还向张治中说过“当然要做”的陈诚，此时对张治中竟施放起冷箭，说他料想不到张治中的火破坏了他赖以指挥全战区部队作战的全部通讯装备，如同缴了他的械！并点名道姓一口咬定放火者就是张治中！张治中有口难言，打掉牙齿往自己肚子咽。

蒋介石听到这种“拆烂污”的消息也坐不住了，于长沙大火第二天，即14日由南岳赶到长沙实地察看。听了张治中原委如实的禀报，当即在会上作了训示：长沙被焚可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承认是我们的失败。目前最要紧是赶筹善后，收拾人心，拨款20万元救灾。严惩纵火罪犯，并要把惩办罪犯的呈文赶快送给他。

看来这纵火罪犯之名非要落到谁头上不可了，到底应该落到谁头上呢？

两天之后，军事法庭终于认定长沙纵火罪犯为长沙警备二团团团长徐焜、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三个人，并在几天后判了刑。徐焜因是当晚演习的指挥者，被判有期徒刑5年；文重孚因这天擅离职守者早带着家眷下乡远离，被判有期徒刑10年；酆悌因当晚火起照睡不误，许多人打电话询问这火是怎么回事，并叫他下令制止，他的秘书回答：司令有言，他就寝后有电话不接，有事情不禀报，否则问罪于秘书。而这晚纵火队又未敢烧他公馆那一片房子，被判有期徒刑20年。

判决书呈到蒋介石桌上，压了两天，蒋介石拟妥批辞，落笔批道：

“徐焜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视怠情，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三个人的罪名没有一个涉及半个“火”字。可见呈文在蒋介石那里压了两天才将批辞拟妥，难也就难在这个讳莫如深的“火”字上。

至于这次将酆悌也列入罪犯枪毙掉，据有关资料说，蒋与酆之间夙有积怨，蒋早几年就讲过要把他弄掉。

张治中身为省长自然不能免咎，也被处以“撤职留任”。灾民救济了，罪犯也惩办了，但群众的愤懑情绪仍旧不能平息，而且向全国波及。这将不利于抗战，因此周恩来在帮助修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委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和张治中省长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两个重要文告草稿时指出，这场火灾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所酿成的，仇恨要记在敌人身上，我们必须坚持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事过十几年后，张治中对周恩来为他“字斟句酌”（张语）修改那篇难做的文告，仍感激不已。

七

然而真正解决火焚长沙的问题，决不在于枪毙几个人，也决不在于善后如何赈济灾民，”而在于匡正国民党中央当局的抗战军事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不匡正，即使不在长沙放火，也会在其他地方放火。

为了匡正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军事指导思想，重庆《新华日报》于1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据刘斐章的文章说，这篇社论是周恩来在百忙中写的。在这篇社论中，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立论开头，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错误，“在抗日战争中，一切能打击敌人的方法和手段，如果运用不正确或不适当，不仅不足以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反而会为敌人利用来打击自己。”社论接着具体指出了什么是和不是“坚壁清野”，然后说，“最近的长沙大火，社会舆论多有非难，……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要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将使群众莫名其妙，将使敌人更可能进行欺骗的阴谋。”

在这篇社论中，不但批评了长沙纵火，应该说也连带批评了将6月间花园口黄河决堤放水的谬举；在批评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同时，也教育了国民党广大军政官员。

抗战形势的变化，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训练游击战干部的建议。随后国共两党合作举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薛子正等人担任教官，周恩来任国际问题讲师。

湖南战局稳定，看不出日寇有由岳阳进攻长沙的可能，周恩来、叶剑英便离开长沙到岳阳和桂林开辟工作去了。

延河坠马——周恩来断臂事故纪实

成元功

周总理无论是走路、和人谈话、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或是看书看报、阅批文件和做其他别的什么事情，他的右臂总是弯曲在身前，人们早已看惯了，以为这是他的耳惯，是构成这位伟大人物特有风度的特征之一，就像列宁总是把两手插进坎肩的衣袋里，斯大林总是用手捏着他那个烟斗一样，倘若有哪位画师或演员，在为他绘像或扮演他的时候，不是将右臂弯曲在身前，而是伸直，人们一定站出来挑剔指责，说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构成他特有风度的主要特征，画得和扮演得不像。对于他为什么不能把右臂伸直，人们却不大过问，当然也不会有人追问他的右臂是怎么致残的，为什么没有医治复原。

我这样说，并非夸大。作为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我是1945年被组织上派到他身边工作的，几十年来，有成百的人在他身边工作过，他们谁也没能弄清楚他的右臂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我，是到1977年才偶然知道的。

1977年，也就是周总理逝世一年以后，我听到一个传闻，说他的右臂致残是当年在延安被江青害的。这是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30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右臂致残跟江青有关。很奇怪，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竟然一点信息都不知？这右臂致残的事，终于水落石出，时间漫长而久远，我感到有些事件被湮没得愈深愈久，一旦被发现，反而使人感到愈新奇愈珍贵，下边，我将按“无端之祸”、“无奈之残”、“无言之苦”、“无谱之歌”四部分把事实真相写出来，告诉读者这个故事。

无端之祸

大凡去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城下有一条延河。延河的水不深流不急，一年四季都可以涉渡。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它有个怪脾气：夏季往往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人们正裸膝涉渡，突然间会出现山洪，滚滚而来将人卷走，带进黄河。这是因为上游某个地方突降倾盆大雨而形成的奇怪现象。

1939年7月10日这天下午，革命圣地延安城烈日当空。中央党校忽然像山洪暴发般的传出消息：周副主席在骑马过河来党校的路上受伤了！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抽紧了心，神秘地互相悄悄地传告着。——在战争年代，每逢我们遭受到意外损失的时候，大家的心都是揪着。他们谁都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谁又说不清楚。于是纷纷猜测，私下议论：

——遭到了特务、汉奸的刺击？

——骑的是一匹驢马？

——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从来还没出过这么大事故。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

中央党校高级班（在这个班学习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的学员更是后悔不迭。有的说今天不该请周副主席来作报告：有的说既然山洪下来了，汽车过不来，就改个日子算了，何必骑马来，畜牲这东西最容易出事；有的说得用马鞭子狠狠地把那匹马抽一顿，好好教训教训它；也有的说干脆把那匹马宰掉，免得以后再出事……

中央党校学员们有个传统的者习惯，每隔一个时期，或每逢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提出请中央领导人或直接点名请某位领导人到校，给他们作报告或解答。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三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搞起抗日反共活动，在秘密颁发了几个内部文件之后，又公然制造了多起反共惨案。抗日征途，风雨如晦。面对当前迷惘的局势，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去给他们作报告，指点迷津。不料这天毛主席赶上有事去不了，便请周副主席代他去讲，说：“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周副主席是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党校高级班的学员一听周副主席要给他们作报告，良机难逢，自然欣喜万分，一个个翘首以望。谁知盼来的周副主席，此时却因右臂骨折躺在党校大门口的会客室里。他们自然后悔不迭，心乱如麻，恨不能以自己的伤痛来代替周副主席的伤痛。

周副主席是这年6月中旬，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乘汽车出发，盘山绕水，晓行夜宿。赶回延安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回来后住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院旁的窑洞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定4月间召开，因那时候他代表中央正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研究新四军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敦促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未能归来，所以推迟到现在。

周副主席躺在党校，毛主席还不知道。最着急的是陪周恩来来到党校去的王来音和蒋泽民。

王来音是毛主席警卫班的警卫员，他的专职是负责料理毛主席的生活和管理毛主席居住的两孔窑洞。毛主席对这个18岁的陇东娃娃很满意。这次周副主席回到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副官，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没有住在这里，毛主席见周副主席生活没人照料，便对王来音说：“你认识周副主席吗？”周副主席，过去王来音从未见过。这次他回来就住在毛主席院旁的窑洞里，他从大后方回来穿得洋气些，先一天他到毛主席这里来时，王来音又给他递过茶水，自然认得，便认真作了回答。毛主席向王来音交代：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派你去招呼他的生活，缺什么东西你就去领，一定要照顾好，我这里的事从今天起你就不用管了，等周副主席回重庆之后你再回这里来。你的工作，警卫班会派人来顶替。

就这样，王来音来到了周副主席身旁。

10日那天下午，他通知汽车司机送周副主席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下去。中央党校在延河的对岸，从杨家岭去中央党校必须通过延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毛主席听说河里涨水，就叫王来音去探水势，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王来音赶到河边一看，浑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着的几块大石头，都已淹没在水下了，汽车根本过不去，骑马倒可以涉过。毛主席就叫王来音把他的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这匹大青马曾经跟毛主席进行过长征，稳当可靠，爬山涉水又是老资格，有经验，所以毛主席叫王来音把这匹马牵给周副主席骑坐，同时又派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随行。

在我们访问时，王来音讲述到这里，说：那时警卫工作简单，毛主席派蒋参谋去就是加强警卫，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警察，还有开道汽车呜呜叫，措施严密。

当时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地位特殊的人物，这便是毛主席的爱人（爱人

是那时解放区对妻子独有的称谓)江青。这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听说周副主席要去党校高级班作大报告,就要求去听。毛主席对她说:“你条件不够(高级干部)嘛。”不同意她去,她还是跟着去了,她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涉过齐腰深的洪水,上了岸,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打马急奔,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原本是一对,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去。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窜出一条狗。这未见过世面的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到周副主席的大青马上,周副主席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摔下来,摔了个臂折肉伤!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向毛主席报告。这是王、蒋两人分内之事。但他们却十分为难,因为江青这个地位特殊的人物夹在中间,要报不敢,不报又不成。还是按原则办事,由王来音骑马回杨家岭如实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面叫他的秘书叶子龙和他一同去党校看望料理,一面对江青发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江青理亏,远远地躲开,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主席。

刘久洲是个倒霉的警卫员,人命关天的大事又一次出在他的身旁。前年(1937年)5月,他随周副主席乘一辆大卡车去西安,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山隘,遭到土匪的伏击,司机牺牲,随行人员伤亡数十人,他身中二弹,幸好周副主席未出三长两短。这次,他听说周副主席身受重伤躺在党校,将信将疑,连走带跑赶到党校会客室。从人丛中挤到周副主席跟前,见周副主席右臂肿得碗口那么粗,流着鲜血,浑身汗透,强忍剧痛,很悔恨自己放假外出没有跟着,要不然也许会像在劳山山隘遭到土匪伏击一样大难得以幸免。

我们访问曾任北京前门饭店经理的刘久洲时,他对这次事故仍旧心有余悸。他说,那天假若总理的脚被马镫套住抽不出来,或者马从身上踏过,就会不堪设想,就会给我们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已经脱离警卫工作40多年的王来音,在回忆当时那种可怕的情景时说,一切都像昨天发生的大祸,安全保卫工作你一会儿也不能麻痹,一点也不能大意,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预先想到才行。那次事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是我们警卫工作的深刻教训!

山洪来得猛退得也快,周副主席乘汽车回到了杨家岭。窑洞虽说有冬暖夏凉的优越性,但这时候令人感到特别的闷热。

周副主席受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延安城。

当时的延安城实际上已不具有城的形象。这座历史上有名的北方重镇,1937年党中央进驻,再度繁荣起来,成为抗战的中心。1938年底就遭到了日本鬼子飞机不断的狂轰滥炸,店铺房屋被夷平,只剩下凤凰山上那道蜿蜒的城墙空围着一片瓦砾场了。党中央各部门不得不分散在许许多多小山沟里,辟窑为居。党中央搬到这杨家岭的山坡上来住。虽说那时延安消息传递还处在鸡毛信时期,但是各部门的领导人 and 周副主席的老战友,还是很快知道了周副主席不幸受伤的消息,一个个先后亲自赶来登门看望。周副主席虽然伤痛很厉害,还是强忍着一个一个接待他们。对他们说:是他骑马去党校,过河以后马一失蹄跌倒一个大坑里面,摔下来,右胳膊肘杵到了地上。医生已经治了,不要紧的,很快会好的,请放心吧!他们虽然相信周副主席的话,甚至有人说那条路上确实有日本飞机扔炸弹时留下的坑,但是仍搬不掉压在

他们心头的那块沉重的大石头。他们严肃地要求中央教导大队（即中央警卫团），认真吸取教训。据王来音回忆说：“随后，中央教导大队领导向我们下了指示：从今以后，首长骑马不论走路过河，警卫员必须牵马走！”

我在中央机关担负警卫工作 40 余年，在回顾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常听到说有警卫员偶一马虎马肚带羁松了，造成了周总理滚鞍落马或是马跑到大坑里周总理被摔下来的事故，却不知道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而知道真实情况的同志，却又消溶在自己的肚囊里，不肯也不敢于说出这次事故的真相。

无奈之残

对周副主席的伤情，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向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作了具体交代。

最近我们访问王斌老人时，他悔恨他说，那时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八路军总医院驻在延安拐峁村）连一架好的调光仪器也没有。到 8 月中旬，才知道总理的右臂已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 X 光片显示是：右肘右肱骨下端成 Y 形骨冠状突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

医治无效之后，党中央决定让周副主席去莫斯科医治。

8 月 27 日，许多同志聚集在延安东门外的机场上，为周副主席送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副主席回来再见的时候，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洒如初的右臂。战友们知道他不能缺少一只健全的右臂。他需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机场的尘埃被螺旋桨扇卷起来，遮天蔽日，飞沙迷眼，尘土扑面。等到送行的人们听不到马达声在山谷中轰鸣的时候，那飞机（当时人们称它为铁鸟）已经是远远的好高好高的一个黑点了。当时延安飞机场是土跑道，根本看不见飞机是怎样起飞的。送行的人群在尘雾里高高地向着马达声响的方向不停地挥手！这是一架国民党军队派来的飞机。苏联飞机，按照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协议，只能在兰州而不能到延安降落。

飞机腾空而去。但周副主席那颗心仍然系在中央的工作上。自跌伤之后，他从未卧床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切要求，邓颖超同志勤相关照，但是，他说他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中央开会他照常参加，文电他照常处理。他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人记录文稿，因为写文稿这件事，并不是可以用左手去写的。

那时派去给他作记录的是陈舜瑶，这位现在已年逾古稀的老大姐回忆说：

1939 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和江青是一个支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组织单位都是支部——作者注）。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写了个条子（当时单位之间的往来文书多系由负责人写的具名便信，故称“条子”——作者注），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写字，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多接触人，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总理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总理很不习惯他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总理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

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总理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总理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

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提问：江青待你怎样？陈舜瑶说：那时她还邀我到她的窑洞去坐（在毛主席的窑旁）。窑很小，布置也很简单，墙上挂着毛主席手写杜牧的诗。我记得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说到这里，陈大姐笑了：“文革”中她果然卷土重来了，不幸言中。但幸而她没有想到我，否则我就不得了啦。其实我也是1977年才知道是江青撞的，当时我只知道是从马上跌下来，江青没有跟我说是她韵责任。别人自然不会透露给我的，那时人们保密观念最强。

陈大姐向我们讲了当时病中的周总理工作精神之后，接着又叙述起周总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繁忙紧张的情况，再接下去就是感叹他在建国后20多年中的重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当时的日记里所写的情深动人的话：“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于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断之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到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正心疼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该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的掉泪了。”

在兰州换乘苏联政府专程派来的飞机，经新疆到达莫斯科已是9月中旬了。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大姐被招待在别的地方住下。

苏联政府派了七、八名专家给周副主席会诊和治疗。当他们了解到延安的治疗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个个摇着头，把肩一耸两臂一摊。他们无法想象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医疗方法失当给病人带来的不应有的痛苦感到遗憾。会诊之后，他们认为周副主席的病情并不复杂，凭他们的医术完全可以使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于是向周副主席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要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个方案，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会很理想，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副主席经过考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作为病人没有不愿意恢复正常的，但是，国内形势日趋严峻，日本帝国主义已宣称不再以蒋介石为主要对手，而用主要力量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又已实施军事反共，血案迭起。抗战前途和民族命运堪忧。我们党随时都要准备应付突然爆发的事变。他虽然身在莫斯科，但知道自己肩负的重担在急剧地加码！他衷心地感谢苏联医生，但考虑到同志们盼着他，国内的工作在等着他，他毅然决然他说，别的就无需考虑了，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强力拉伸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总理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师哲老人对我们介绍治疗情况时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呵，他忍住，也有时受不了那么大的罪呵。邓大姐在治疗的时候都不让她在跟前，她若瞧着是受不了的呵。总理在大姐面前从来不讲那么疼的。

在师哲老人谈到这段情况的时候，我们问老人：是不是应该说这弯曲的残疾是总理自愿留下的？老人肯定地点点头：是这样的。那是他想赶快回国。

经过多次强力拉展，时间不长周副主席的右臂基本上能做伸屈活动了。他高兴地向人们说：取得这样效果我是很满意的，我又能照常工作和生活了！

他能开始用右手写字了，治疗后期，他竟写了长达 110 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领导人，并且作了口头报告，使他们了解中国情况和中共的策略。他多么希望“英特纳雄耐尔”在中国实现啊！

1940 年 2 月，医生同意周副主席回国了，苏联政府派了一架专机送他和任弼时同志一行到兰州。到达兰州后，周副主席向当时国民党战区的司令长官朱绍良借了一辆中型轿车，乘人载物。凭着朱绍良的旗号，一路关卡无阻，经西安，于 3 月 26 日安全返回延安。

此时，由蒋介石发动的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全国性反共高潮刚被压下去，抗战形势大有好转，但是陕甘宁边区的 23 个县被占去了 3 个。这 23 个县本是蒋介石在 1936 年西安事变时亲口允诺的。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就指出：此人历来说话不算数，要他签字！周副主席说：既然他说的话可以不算数，那他签的字也同样可以不算数，周副主席可说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了。

周副主席还没回到延安，消息早已传开，这天中午人们远远瞧见在公路上空尘头高卷处几辆汽车向杨家岭驶去，就断定是他回来了，一定是健康地回来了。杨家岭的人都不自主地不时地向大门外河滩上瞧一瞧，当他们听见汽车加大油门冲上杨家岭山坡的声音，都到路边招手相迎了。前来慰问辛苦的人在欣喜之中才知道那只右臂是永久性的残废了，只能伸屈到 60 度就再也不能伸直了。同志们在失望在埋怨，失望莫斯科的医生并不高明，埋怨莫斯科医生没有治好，他们并不知道这不是医生的过错，而是病人坚持自愿留下的，而且目前病人自我评价是很满意的。周副主席的伤不仅在延安的同志们十分关心，就连远在敌后的同志们也很关心，毛主席看到这已经半残的右臂后发电报给太行山彭德怀，半喜半忧地告诉他：周恩来伤已半愈，已能写字、吃饭。可见毛主席对于治疗的结果是不满意的，他只承认是“半愈”。

当晚，杨家岭农家谷场上挂着通亮的汽灯，燃着几盆火红的炭火，工作人员扛着板凳冒着寒冷到这里开会，党中央热烈欢迎周副主席伤愈归来和任弼时同志自莫斯科归来。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建筑礼堂，也没有较大的房子，不论开会、作大报告都是在场院里或是树荫下。寒夜里毛主席和许多领导人都早已来到，讲了许多话。

周副主席在晚会上为了回答同志们的关怀，为了表示那右臂仍具有正常的功能，能够照常地工作和生活，使担心的人们放心，他将这次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电影放映机架在桌上，自任放映员为大家放映一场电影。这电影机的发电机是手摇发电，放映机是手摇转动，他用右臂摇动放映机一直把《大战张鼓峰》（苏联纪录片，该片纪录了苏联红军 1939 年在远东击败日军的战绩）放完。周副主席用行动来证实他那右臂并不残！

无言之苦

刘久洲是 1939 年 8 月底，随周副主席从延安乘飞机飞抵新疆的，周副主席没有让他一同去莫斯科，叫他在新疆等候，回来后再一同返延安。因为在那里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的警卫人员去保卫，所以刘久洲一直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势孤力单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战斗，甚至准备被抓去坐牢。这种生活，长征时候也好，在重庆久住的时候也好，刘久洲都是过惯了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度日如年，只盼望周副主席能够早日治愈回国，把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打掉。

周副主席乘苏联飞机回到兰州，再到西安，然后返回延安。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沿途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均以礼相待。有的官员甚至自称曾是周副主席黄埔军校时的学生，恳求给予赐见。尽管如此，刘久洲仍防有诈，昼夜紧张地随侍左右，如入虎口，这一趟定要确保安全！

3 月 24 日，周副主席的座车进了家门——陕甘宁边区，住到甘泉县，周副主席同毛主席通了个电话。3 月 25 日上午，又顺利地通过了劳山隘道。通过劳山隘道时，有人指点哪是 1937 年周副主席遭到土匪的伏击遇险的地方，刘久洲还回忆了当时自己身中两弹重伤在地的战斗情况，还觉得毛骨悚然。傍晚的时分，人们盼望已久的延安宝塔，已经遥遥在望了，车上的人又兴奋又轻松。

延河的水清澈见底。延安人从河里排放着躡石上连走带跃穿过去，周副主席的座车则从躡石旁边，加大马力过河一上坡到了杨家岭。

周副主席安全地回到了延安，刘久洲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了紧张的心，但同时又多了一重忧虑。延安这地方位于黄土高原，即便到了夏季，也还带点“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味道，所以尽管现在已是 3 月底，给人们的感觉依然寒气逼人。早、午、晚乍寒乍暖，这种鬼天气，对于受伤的人无疑是一种折磨。刘久洲自己就深有体会，他在劳山负伤后，每遇天气变化，就感到酸痛得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也摸不准是哪个部位。除了忍着，别无良策。常言道：“病身最觉风霜早。”他以自身之痛度周副主席之苦，深知周副主席工作繁累，今后要长期受罪的！虽然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未听到周副主席说过他的苦痛。

那么，在周总理的后半生里，这只残臂有没有给他带来痛苦呢？回答是肯定的。我自 1945 年到他身边工作以来，朝夕未离，也未听到他或是其他同志向我交代过他有酸痛的问题。不过，据我观察（我是十分注意观察的），确有令人担心之处。比如进北京之后，他常到群众中去活动，年轻人和他握手时总是使劲摇他的胳膊，有时还被挤得架空起来动弹不得。每逢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很着急，总担心他的右臂接骨处被摇断。有位医生奚落我这个“土包子”，说愈合的部位甚至比原生的骨头还要结实。——怪不得总理常批评我们不注意学习，回想起来，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们着实闹了不少。

刘久洲和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伤残确实在折磨着他，确实给他在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有难言之苦。

有两件小而又小的事，可以说明。

有一次盛饭，有几颗饭粒粘到了他右手小指的下侧。他想用舌尖舔到嘴里，但是，他的手背不能像正常人手背那样，可以翻过来伸着脖子去舔，只

好放下饭碗用左手去扳着舔。还有件事就是剪脚指甲。周总理认为让工作人员为他剪脚指甲是不礼貌的，每次洗完脚都是自己剪，但伤残的手臂给他造成莫大的困难：勾着腰，盘着腿，扳着脚，将要剪上却又滑脱。他时常因此累得满身是汗。

再就是握手。他大约是世界领导人中握手最多的人之一，每次握手，都被满握而摇臂。有一次他和人握过手之后回到办公桌上，肌肉萎缩的小时使他批文件字都变形了。

摄影师在抓拍人物时，常常是抓住要抓拍人物的风姿，一按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即可完成。他们在抓拍周总理的形象时，总在他双臂交合在身前之际，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时机。这是他们的角度。我们当警卫员的却不同了，我们这时所看到的不是摄影师们认为的风姿，而是他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抚摸他的伤疤之处。

1958年夏天，警卫员赵行杰随周总理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三天，回来说，他自己这次是去干了几天脑力劳动——费了脑筋。

那年夏天，北京十三陵水库开工，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周总理带领国务院机关干部编成的一个队，去劳动。工地组织劳动的人，为了照顾他，派他干轻活，他说那是“象征性劳动”，执意去挥镐挖土石方，扬锨装车。由于他胳膊伤残，动作别扭，镐头下去落不到正地方，装车也装不好，就想推推独轮车也还是可以做到的。谁知独轮车并不那么好推，再加他的两臂不能平衡地使用力量，推着推着，独轮车一歪，把石块倾倒在行车道上，妨碍了整体的工效。赵行杰费尽脑筋想主意使他劳动得满意，但都未成功，后来说，我推车你拉车吧。于是两个调换位置，由赵行杰推车，总理拉车。尽管如此，赵行杰仍不能不动脑筋。他理解总理，得给总理个出力的机会，但是工地的小车道修得很平坦，没有上下坡，要叫总理出力也难，谈到这几天劳动的时候，赵行杰对我们说：我推车如果不出力，叫总理用力去拽，那我还算个什么警卫员呐！但是我一出力，总理就没法出力去拽了，埋怨我特意照顾他，成心不让他劳动。拉车的绳子短了，我担心车上的石头会掉下来砸着他，长了，他又说拽不上劲——那只右臂弄得他实在不痛快。

总理说，他刚60岁，不能算作者年，即使老年，也还要参加劳动。

因右臂伤残终究使他未能和大伙儿一样劳动而抱憾。我们工作人员则因另一件事为他抱憾，就是他一生未能学会游泳。他不是不能学，而是那只右臂妨碍了他，使他难以学会，说明现实生活并不像他说过的“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那么简单。

1960年初秋，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广州议事，暇时到越秀山上的游泳池去游泳。毛主席是行家，很能游。总理和少奇不会，两人每人捧着一块轻质木板学，少奇学会了，总理没学会，但由此引起了他学游泳的劲头。

1961年夏天，中央到北戴河办公。他住在三十四号楼。这楼原是一个旧官僚的松林别墅，出院门就是海上的第三浴场，北戴河的河水吸引着每一个人。中央领导人几乎个个都会游泳，他看着眼热，一天他向我说：我要学会游泳。又说：你们都不会教，就请位会教的同志来教我。看来他是决心要学，我们也为他能够学会游泳增添体力而高兴。

在北京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不仅是个热心肠，而且是个办事不挠头的人，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把少年游泳班的女教练黄莲华找了去，交待说：

“小黄，你马上收拾一下到北戴河去，有重要任务，车站有人接你。去干什么，不要问。”前不久，我们打听到阔别 27 年之久的黄莲华的住处。她和女儿出来接我们，小黄格外高兴。一开头就意味深长地说：我去北戴河以后，教周总理、刘主席、朱委员长、陈云同志游泳，那时的年龄就是我女儿今年的年龄——25 岁。

她说：总理没学会。她用右臂模仿起总理学游泳时的艰难动作，她知道我们会会意的。

那天她赶到第三浴场，总理早已经到了。这是自 1954 年夏天中央搬到北戴河办公之后总理第一次下海。周总理对她说：小黄，你这个教练知道我吗，我这个学生不好教呵。显然，他对学游泳是有信心的。但还是说：你看我能学会吗？

小黄说：“一定能！总理你先掌握仰泳，会了，别的姿势跟着就掌握了。”

周总理在水中试着仰浮，不一会就能浮起来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克服自身的重量浮在水面上，又新奇又高兴。他说：“看样子有希望！谢谢小黄。”他瞅了瞅浴场休息室的大挂钟，走上岸，高兴地对小黄说：“下回再来教呵。”邓大姐也在沙滩上来看，高兴地对小黄说：你要帮总理学会呵。周总理很有信心地接过去：“我是能学会的。”

小黄一边回忆当年的情景，一边寻找她和总理、刘主席等人合拍的纪念照。他说：

接着几天就是练习仰泳前进，他用双臂拨水，常常拨到脸上，又发生了原地转圈，我很着急，没有想到他的右臂是弯曲的（她从未训练过残臂运动员）。总理心里明白，他说：你们用两只手划，而我的右手只能把水拨到自己身上。

小黄教他有意识地让左臂迁就右臂，后来果然成功了。但几天之后，周总理意识到老用左臂迁就右臂很困难，就向小黄说：我是游不到头啦（意思是说他不能单独游到 200 米远的设防鲨网的地方），还得几个人陪着我，从明天起不学了。在场的人无不引以为憾，过两天周总理要回北京。小黄说：“回北京后我去中南海再教你，能会。”周总理欣然答应了。

回到北京，小黄每天带着希望去中南海游泳池，一边等周总理，一边教别人。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他没有来，他从来也没有来这里游过泳，只是毛主席在这里游泳时，他到这里来谈过工作。随后，天气转凉了，小黄，这位怀着报效祖国赤子之心的印尼归侨，当时中国国家女子游泳队的骨干，终于没有教会周总理游泳，荣高棠交给她的“重要任务”终于没有完成。

过后几年，周总理夏天到北戴河办公，也到海边坐坐，再没有下海。

无谱之歌

对周总理当时及以后均未将受伤的真情告诉邓大姐，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一直是想不通的。难道他告诉邓大姐不应该吗？难道邓大姐会去责备江青吗？怎么到 1977 年她还不知道？

1977 年我听到传闻周总理的右臂伤残是被“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害的以后，就去找了王来音，得到王来音的证实，便急忙去中南海西花厅面报邓大姐，说我找到了见证人。当时我以为邓大姐早就知道周总理受伤的真情呢，谁知她根本不清楚，她像日常听取别人讲话一样，默默地倾心地听着。等我

谈完当年总理右臂摔断的前后经过，她才若有所思他说道：噢，怪不得那年我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江青来向我说，她经常去看望恩来，她难过得都哭了。我想：她怎么要哭呢？今天你这一说，我才知道同她有点关系。恩来从没有给我讲过。

邓大姐回忆将近 38 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地说：那年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我留在重庆工作。他走后一个多月，我才在 7 月底或 8 月初收到一个条子，一看是恩来写的，说：因骑马不慎摔伤右臂，很快就会好的，请放心。好像是左手写的。这条子是遇到当时有人从延安来托他带来的。路上那时要经过好多天。我远在重庆，也没过问此事。

邓大姐接着说：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中央给我的电报，说恩来的臂伤急需去苏联治疗。这时我才感到他伤势一定很重，就发电请示中央，要求同去苏联，以便照顾。中央立即复电同意。我乘汽车回延安。路上走了六天。恩来每天仍忙于工作，不顾治病和休息。许多同志都为他的伤势严重而焦急，要我好生劝他。

我这次去见邓大姐的时候，总理去世一年多。大姐的语调稳缓而坚定，情真而意深。从大姐那里，我脑子里存在那些问题，似乎得到深邃的答案，又似乎没有得到答案。我想，这大概便是被世人景仰的“模范夫妻”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一幕既同心相结而又各自隔膜的情理间融的佳作。也许有哪个大剧作家，能挥动如椽的巨笔据此写出一曲不朽的好戏！夫妻之间就是无话不谈的呀，可是他们之间一个未如实以告，一个相信那个河边的大坑为真！

周恩来总理到底有没有向别人讲过这次事故的真情？据我们调查所知，他讲过！他在苏俄就医时曾向任弼时讲过，还向师哲讲过。他向任弼时讲，是因为他要任弼时给延安发电报，请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妥善处理江青的事，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他曾要求毛主席不要责备江青。张闻天接电后亲自安排江青随同马列学院学生去农村考察去了。而他向师哲讲，则完全是因伤痛所致。据师哲老人回忆，周总理当年在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对他已经愈合的右臂采用强力拉展手术，周总理疼痛难忍。师哲说：总理大声地喊叫，疼呵，疼呵……！他这才说：是江青骑马把我从马上撞下来摔断的。师哲老人是 1925 年去苏联的，从未回过国，当时还不认识江青是谁。

当我们告诉师哲老人，总理从未向他人讲过他受伤的真情，就连邓大姐也未知的时候，师哲感叹地说：总理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1928 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我对他就有突出的印象。这回他到莫斯科，我们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我一进门就认出了在座的客人是周总理。我被派担任翻译（我是弼时同志的秘书），天天陪住在医院里。总理是个最坚强的人，治疗中受的罪大大咧，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他经常忙于工作，特别是后期，他向我说：我每天都处在精神兴奋之中，我要工作，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至于周总理当时的伤势究竟如何，除了此文前边所叙述的以外，我们在历史档案里还发现了一帧照片，那是当时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修养》长篇报告的刘少奇去看望他时，由一位今已不知名的人留下的珍贵镜头，读者看了这帧照片，自然会明白当时周总理的伤势确实严重。

几十年来，伤残的右臂不仅在折磨着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在塑造着周恩

来。

谁能说，那只伤残的右臂不恰恰使周总理的风度更加生辉了呢？

在重庆谈判中——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纪实

颜太龙

我是在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那阵，奉调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当时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准备代表党中央去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身边需要警卫人员，就把我调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 1948 年党中央迁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当时属建屏县），我在周副主席身边一共工作了 12 年。在这 12 年中，周副主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有时在西安，有时在南京，有时在重庆。当时，在国统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特务横行，斗争残酷，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监禁和杀害的可能。尽管如此，周副主席为了完成党中央的使命，总是满怀必胜的信心，奋不顾身，始终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1945 年他陪着毛泽东主席冒着极大的风险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那 43 天。

1945 年 8 月下旬，当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周副主席忽然要他的秘书李金德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要校方通知我回周副主席那里去。同时还派了一个同志，牵着一匹马来接我。

我是在 1943 年，随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我们回延安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在延安住了些日子，有一天，周副主席忽然对我说：“太龙，看来我在延安还要呆一段时间。过去，你总没有机会学习，现在，倒是个好机会，你可到中央党校去好好学习一下。”当时周副主席住在枣园，离中央党校有 20 多里。说句老实话，当时我很不情愿去：一来，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已经七、八年了，工作非常顺心；二来，周副主席非常关心我们警卫人员的进步和成长。周副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情，对我说：“你还是去的好，到那里学一点马列主义知识，将来也好更好地为党工作。”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还有什么说的呢！便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周副主席到党校学习去了。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来接我的同志，告诉我要把牙具行李都带上。我问那个同志，周副主席要我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那个同志说，不清楚，你到周副主席那里就知道了。当时保密非常严格，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再问。

我收拾好了牙具和行李，和校方告了别，骑上马，便和那个同志赶往枣园去了。

赶到枣园，周副主席正站在他的窑洞门口。我喊了一声：“报告！”周副主席一看是我，便说：“请进来吧。”我随周副主席进到窑洞里，给周副主席敬了一个礼。周副主席说：“太龙，你回来了，回来好。”然后又十分严肃地说：“党准备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明天我和毛主席要去重庆，你和龙飞虎、陈龙一道去保卫毛主席。你和龙飞虎对重庆比较熟悉，龙飞虎已在重庆。你和陈龙一道去。陈龙不熟悉那里的情况，你要和陈龙很好地配合。”我马上立正回答：“我一定用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保证完成任务。”周副主席说：“主要是保卫毛主席，你们要保卫主席，爱护主席。”

我从中央党校骑马去枣园的路上，曾看到有架美国军用飞机降落到延安机场，当时不知道它到延安来究竟干什么。听了周副主席交待的任务，我这才知道，原来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延

安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

当时，我心里很不安，生怕这是蒋介石耍的一套阴谋诡计，弄不好，怕是去时容易，回来难。其实不安的何止是我，延安的党政领导和广大军民也都很不安，生怕蒋介石心怀叵测，翻脸不认人。

第二天，也就是8月28日中午12时，我和陈龙同志随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以及赫尔利、张治中，乘车赶到了机场。毛主席头戴灰色盔帽，身穿兰布中山装，举止稳重，安如泰山。周副主席身穿褪了色的卡其布中山装，整洁、合身，给人的印象是朴实、精明和干练。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达机场时，机场上已聚集了几千人，其中有党政军领导，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也有工农群众。他们在热烈欢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下车后，毛主席步履沉稳地走向站在前面的党政军领导，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应记者们的要求，在飞机前同张治中、赫尔利照了一张合影，然后踏上舷梯，一步一步走向舱门。

走到机舱门口，毛主席又回过身来，举起灰色的盔帽，向送行的人挥舞着致意告别。

毛主席上飞机前周副主席就叫我们检查了毛主席的座位和安全带。周副主席上飞机后，趁毛主席向党政军领导和欢送的群众告别的时候，又亲自检查了一遍。并特别向我和陈龙同志交待：“到重庆之后，你们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不许有半点疏忽。”周副主席代表我党在重庆工作多年，深知重庆的白色恐怖非常残酷，特务活动横行无忌，抢、烧、杀、抓、抄什么都干得出。

周副主席在重庆工作期间住的周公馆曾家岩五十号，就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包围之中。

曾家岩五十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我们住一楼和二楼、三楼的一部分。二楼就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住在那里，白天黑夜对我们进行监视。五十号大门口还有个卖香烟的就是特务机关安的一个“钉子”长年在那里盯着，什么人进出都瞒不过他。附近还安插了许多便衣特务，有卖甘蔗的，有卖桔子的，也有坐茶楼喝茶的，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此外，在五十号对面和胡同口，还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和特务机关，门口都停着汽车，周副主席一走出曾家岩五十号，他们立即尾随盯梢。他们还经常绑架我们的同志和爱国人士。所以，我们的同志或爱国人士来去曾家岩五十号，都是非常小心。

由于特务盯梢盯得很紧，所以周副主席每次外出都事先告诉我们，他今天要去什么地方。而我们则想方设法开快车甩掉特务。比如本来周副主席去的地方要往东走，我们则把车子往西开。一旦发现有特务汽车跟踪，我们便七拐八拐开快车，把它甩掉，然后再拐到周副主席要去的地方，而且下车后，我们让司机立即把车子开走，并告诉他几点几分把车开到什么地方，去接我们，到时候，我们到了，车也到了，我们坐上车就走。由于我在重庆前后呆了七、八年，对重庆的地理、地形和特务机关都非常熟悉，所以周副主席每次外出或有特殊工作，或其他同志有特殊需要，周副主席常常指派我去执行，我从来没有让特务们跟上过。特务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厉害。我们步行他们跟不上，我们坐汽车他们也跟不上。

不仅如此，有时特务们还寄恐吓信恐吓周副主席。有一次，有个特务将一封恐吓信送到中共代表团办公处收发室，放到桌上就走了。由于信皮上写

的“周恩来先生亲启”，周副主席又曾明确规定，他的亲启信他人不能随便拆，谁也没敢动。等把信交给周副主席手里，周副主席打开一看，里边还装着一粒子弹。周副主席轻蔑地一笑说：“这又是特务搞的名堂。”

正因为周副主席深知重庆暗无天日和国民党特务的种种暴行，所以他特地嘱咐我们，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飞机从 12 时起飞，航行了三个多小时，于当天下午 3 点 45 分即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到机场来欢迎的，除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外，国民党方面有邵力子等，知名人士方面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谭平山等，此外还有我党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中外记者。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了飞机之后，周副主席将到场的人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到机场盛情迎接，接着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了他到重庆来的目的。之后，便乘蒋介石派来的汽车，离开机场，先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休息之后，又前往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住处林森公馆下榻。

一到林森公馆，周副主席又特别交代，要我们仔细检查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检查后，周副主席怕我们年轻粗心大意，仍放心不下，又亲自检查了一遍。他检查得非常仔细，除主要的地方以外，床上床下他都看了，枕头也看了，还在椅子上坐了坐。总之，角角落落他都检查到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才让毛主席进去。并嘱咐我们：毛主席住的房间里不能离人，也不要让外人进去。毛主席走到哪里，周副主席就陪到哪里。

我们安顿不久，周副主席就告诉我们，说一会儿蒋介石要来拜会毛主席。并说：“你见过蒋介石，你到门口去警卫。”大约 5 点来钟，蒋介石来了，陪他来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我马上去报告了周副主席。这时周副主席正好在毛主席的房间里，便和毛主席一起去客厅。蒋介石走进客厅后，我便十分警惕地站在客厅门口，蒋介石的副官也站在门口。

毛主席和蒋介石这次会见谈了大约有 20 多分钟。会见后，双方宣布了各自方面的谈判代表名单。我们方面，毛主席委派的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则派了张治中。邵力子和张群。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林森公馆住了两天两夜后，毛主席对周副主席说：“我们不住这里了吧，还是跟我们的同志住到一起去吧。”周副主席考虑到毛主席住到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会更安全、更方便，就同意了。

我们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到红岩村后，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已经给毛主席安排好了房间，为了毛主席能休息好，周副主席还亲自到床上坐了坐，看是不是摇晃，然后又察看了一下椅子和躺椅，看是否平稳，就连被褥和枕头也都一一看过。

毛主席在重庆一共呆了 43 天。

在这期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特别忙，既要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又要会见和接待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人士。毛主席每次外出，周副主席对我都要做详细的布置，前面的车坐几个人，后面的车坐几个人，谁和毛主席坐一辆车，甚至连汽车的速度，车与车之间的距离，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我是被指定每次外出都坐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共同乘坐的汽车里的，我坐在司机旁边。这辆车是蒋介石派来的。我的任务就是控制司机，使他不要开车过快，在超车和拐弯时发生问题，更不致在车子走山路或沿岸边行走时，

将车子摔到山下或开到江里去。当然我们在控制他的同时，也很注意做他的工作。周副主席曾对我们讲，尽管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当司机不过是为了挣碗饭吃，你们要和他搞好关系，要给他烟抽，到吃饭的时候，别忘了招呼他吃饭。周副主席还抽空亲自找他谈话，说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说重庆这地方车子多，道路又窄又不好走；注意安全。

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设在一个山坡上，坡很陡，原来有石阶 300 多级，后来国民党在山下建了许多小别墅，并建了特务机关，这才把路垫起来修了修。修路后也还有 100 多级，汽车只能开到山坡下石阶那里停住，毛主席和我们下了车再沿石阶走上去。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重庆期间，白天一直都在桂园办公、休息和接待客人，晚上回红岩村居住。桂园是张治中将军的公馆，是毛主席到重庆前夕，张治中将军主动腾给毛主席的。

桂园坐落在曾家岩原求精中学（现第六中学）隔壁，即中山四路十八号。房子不大，二楼一底，在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住宅中属于中等的。一进大门，左侧是汽车库，穿过小院坝便是主楼，主楼靠右，楼下右边是会客室，左边是餐厅。楼上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院子的左角有一间小房子，警卫班就住在那里。

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搬进去之前，我们先去检查了一遍，后来周副主席又亲自去察看了一番，这才和毛主席搬进去。

我们搬进桂园之后，宪兵司令部给派了一个特别警卫班。有这些宪兵们往门前一站，当然可以维持秩序，避免一些反动分子前来捣乱。但也不能全依靠他们，因为他们是蒋介石授意安排来的。周副主席特意嘱咐我们，会客室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要离开人。不仅如此，每天下午 3 点毛主席会客之前，周副主席总要问我们：“卫生搞干净没有？”那意思是问有没有离开过人，我们报告说，都整理过了，即没离开人，周副主席这才放心。

事实正如我们所料，这个特别警卫班除了警卫桂园防止一些反动分子来桂园捣乱以外，还负有监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切活动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当时曾任过这一个特别警卫班“班长”的李介新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据李介新先生说，这个特别警卫班名义上归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似与一般的国民党要员住宅、军事机关、政府各部院会的日常警卫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受宪兵司令部重庆特高组直接领导的，是由宪兵特务组成的一个特别组织。它除了负责警卫毛主席以外，还负有监视的任务，每天毛主席、周副主席有什么活动，会见什么客人，他们都一一记录在案，并编成“情况日报”每天上报给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尔后再转呈给蒋介石。

当然，正如对待蒋介石派来的专车司机那样，周副主席也没有放弃做他们的工作。一有空闲他就到警卫班去，找他们和他们的“班长”谈话，向他讲毛主席来重庆的目的，要他们注意搞好警卫，不要让无关的人员进入桂园。同时还关心地问他们每月伙食费多少。鉴于他们菜金不多，一生活艰苦，周副主席便告诉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拿出一点钱来补贴他们，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每天能有一点肉吃。我们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也尽可能地多和他们接触，做他们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和我们缩短了距离。蒋介石知道后，大为恼火，就采取换防的办法，将他们调离。一星期换一次。开始，我们都有点不高兴，因为刚和他们的关系搞熟了，

蒋介石就给调换走了，周副主席却说：“这不是很好吗？他三天换一次；隔一天换一才更好呢，这样，我们可以扩大工作面。他们来一批，你们就做他们的一批的工作。”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尽管我们处处小心，加倍注意，一时一刻也不敢放松，还是出现了两次意外事件：一次是毛主席去中苏文化协会参观苏联民族生活展览时遭到了群众的拥挤；另一次是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英文秘书李少石同志遭到了枪击。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正赶上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苏联民族生活展览。当时孙科是这个协会的会长，他邀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前往参观，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答应了去。

9月1日那天，我们办事处事先去了很多同志，在展览馆周围进行警戒。龙飞虎、陈龙和我也去了，我们跟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不离左右。当时陪毛主席、周副主席去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张治中将军和邵力子。一进门，有许多苏联人站在那里迎接。

开始，除了馆内的工作人员外，谁都不知道毛主席来参见，在馆内参观的人不是很多。后来由于国民党中的一些要人和社会知名人士陆续前来，毛主席在馆内参观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都要一睹毛主席的丰采。展览馆的房子是用竹子搭盖的，本来就不坚固，一下拥来很多人，而且还在不断往里拥，哪里承受得了？当即摇晃起来。

周副主席怕出问题，忙插到毛主席前面，给毛主席开路，想把毛主席引走。毛主席却不在意，说：“还是看完吧。”我和陈龙、龙飞虎也很着急，既怕房子倒塌压伤毛主席，又怕混在人群中的国民党特务趁人多混乱之际，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毒手，打黑枪。毛主席不走，我们也没法子，只好陪着继续看下去。

又看了一会，冯玉祥将军和张治中将军也感到那里人太多，太杂，房子又不坚固，不宜再在那里呆下去了，便对周副主席说：“还是请毛先生离开这里吧。”周副主席向毛主席转达了冯玉祥将军和张治中将军的关切，毛主席仍然坚持要看完。

等毛主席看完，展览馆的院子里人已经越聚越多，你挤我我挤你，挤得水泄不通。走出展览室没多远，冯玉祥将军、张治中将军就被挤散了。周副主席见此情况，非常着急。他对我和陈龙、龙飞虎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要保护好毛主席。”说完，便走到前边为毛主席开路；一面走一面说：“请大家让一让，请大家让一让。”毛主席走在中间，我们三个搞警卫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后护卫着。

周副主席在前面吆喝着，好不容易开出了一条路，我们这才保护着毛主席穿过院子，出了展览馆大门。不料想走到原来停车的地方，毛主席乘坐的车又不见了。本来挤在门外想一睹毛主席丰采的人就很多，这时又拥来了一些，还有一些也往这边拥，眼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被围困住了。我们三个都急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这时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一个同志挤了过来，告诉我们，由于人多，毛主席的坐车已被宪兵调到他们指定的新地方了。我们便跟着这个同志，护卫着毛主席往前走。这时，有几个宪兵赶来为我们开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冲出群众的包围，来到停车处登上汽车，开回了红岩村办事处。

另一次事件发生在毛主席返回延安前两天，即10月8日晚。

这时国共和谈已经基本结束，关于此次谈判的文件《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已定稿，只等在 10 日签字，12 日公布了。

这天晚上，张治中将军在林森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为毛主席饯行。应邀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宴会开始，毛主席首先讲话，再次明确表示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指出这次会谈解决了一些问题，其他有待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商谈。并指出，在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但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我们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新中国。毛主席讲完，大家频频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祝酒，表示敬意。气氛相当热烈。

宴会一结束，张治中、邵力子又陪毛主席、周副主席去礼堂观看文艺演出。我和陈龙同志、龙飞虎同志坐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后排，随时注意周围的情况和动静。

正当晚会进行之中，忽然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匆匆来到了会场，看样子像是出了什么事，我连忙起身迎上去。他悲愤地告诉我：李少石同志出事了。我吃了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说，今天下午，柳亚子先生去曾家岩五十号拜访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主席、周副主席外出之后，柳亚子先生和李少石同志谈诗未走。谈完之后，李少石同志用车将柳亚子先生送回了沙坪坝寓所。5 点左右，由原路返回来，途经下土湾，突然遭到了一个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同志身负重伤，现已送金汤街市民医院进行抢救。李少石同志是廖梦醒同志的爱人，已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女婿。他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长期为革命工作，曾被反动派抓捕入狱，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工作至今。他的外貌长像很有点像周副主席。李少石同志被刺遇害，不早不晚，恰恰发生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之际，当时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蒋介石所搞阴谋的一部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想刺杀周副主席，他们搞错了，把李少石同志当成了周副主席？想到这里，我不由打了个冷战。当即回到座位上，俯到周副主席身边，悄悄把李少石同志遇害的情况报告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听了也很震惊。这时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看节目，没有看我们，周副主席也没有去惊动毛主席，他回过头来，低声向陈龙同志和龙飞虎同志交待了几句，要他们注意毛主席的安全，接着拉上宪兵司令张镇，悄悄走出了礼堂。

为了保卫周副主席，我也跟着去了医院。

我们驱车赶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时，李少石同志躺在外科门诊的病床上，由于子弹伤及肺部，流血过多，未抢救过来，已于 7 点 45 分逝世，终年 39 岁。我们赶到时，已经 8 点 50 分了。周副主席走到病床前，看了李少石同志的遗体，询问抢救情况，十分悲愤，严词斥责一同前来的宪兵司令张镇。张镇连忙立正：“是！我未尽职，我马上去查！”

我随周副主席从金汤街市民医院驱车回到军事委员会礼堂。这时文艺晚会还没有散。周副主席向毛主席和张治中将军讲了李少石同志遇害之事，并向国民党提出了严正抗议，同时要求张镇，你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并要张镇用他的座车把毛主席送回红岩村。张镇怕再出意外，不好交代，当即满口答应。

当下张镇让毛主席坐上他的汽车，亲自陪着，由宪兵机动三轮车殿后，离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经凯旋路，出通远门，经过上清寺，向红岩村方向驶去，沿途宪兵加了警戒，岗哨林立，从军委礼堂一直布置到红岩村。汽车

开到红岩村，停在红岩村坡下马路的尽头。毛主席和张镇下了车。依照张镇的意思，要登上石级把毛主席护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门口。毛主席说：“不必了，夜太深了，你请回吧。”张镇这才没再送，让两个宪兵将毛主席送上石级。

李少石同志不幸逝世后，毛主席也很沉痛，亲笔写了题词：“李少石同志遇难，少石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要向他学习”。这个题词，后来廖梦醒同志镶在镜框里一直珍藏着。出殡那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特地的市民医院门口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不少中外记者、国民党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中国妇女联谊会、新华日报及营业部同人送了花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马寅初、阳翰笙、张友渔和夫人韩幽桐等知名人士前往医院吊唁，宋庆龄女士在伍管梅女士的陪同下，也到医院进行了吊唁。周副主席亲自致了悼词，下午1时，周副主席又亲自将李少石的灵柩送到小龙坎墓地，并铲了第一锹土进行掩埋。掩埋后，又在墓前默默地站了很久，才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汽车离去。

李少石同志遇害的消息传出后，震动了整个山城，舆论大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的暗害，这是很自然的。中外人士一致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纷纷发表谈话和写文章，后来虽经宪兵司令部会同警察局、地方法院证实，李少石同志之死，系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团第三营第七连下士班长田某某，见李少石所坐之车肇事撞伤正在路旁小溲的一等兵吴应堂后未停车，情急之下开枪所致。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和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分别向报界发表谈话，讲了调查结果。但由于当时开车的司机熊国华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将车开回曾家岩车库，将钥匙交给新华日报社交通刘业富，让他送到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公馆，自己不辞而别，加之国民党当局又将撞伤的国民党士兵移到市民医院，所以仍不免疑云重重。直到全国解放后，熊国华给当时在重庆工作的章文晋同志来信，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才解开了人们多年的疑团：李少石同志的牺牲，确系国民党陆军炮团士兵开枪所致。

（王兰升整理）

今天一定要到达——周恩来乘飞机秦岭遇险纪实

何谦

周恩来总理在乘飞机时曾多次身历险境。像由西安去延安途中迷航；像出访友邦时在阿拉伯一机场夜间盲目着陆；像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再像后面我将详细记述的秦岭遇险和重庆机场拒绝接受在雪雾中降落等。我们知道他在公出时最喜欢乘用飞机这种高速飞行工具，他早在1954年开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就密切注视着喷气客机的出现，并说这一出现将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很多变化。但是他也知道飞机的安全保障系数较差，因此他不很赞成毛泽东主席乘用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要知道早先时候不仅飞机安全性能条件比之现在差得太远，而且气象预报工作几乎没有，所以那时人们虽然都盼望坐飞机“开洋荤”，但又都视为畏途，害怕从天空摔下来，有人诙谐他说飞机离地之后你便只能“听天由命”了。周副主席秦岭遇险的险情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然而到今天提起它来我还是余悸犹昨。那时我是他的副官，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

这天是1946年1月30日。先一天下午周恩来副主席决定从延安先飞到西安到八路军办事处过夜，今天趁早从西安赶到重庆，明天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和会议文件上正式签字。这个会议的结果如何，是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所关注的，而我党在所有议定的问题上态度如何则更为人们所注视！

虽然办事处值夜班的黄金友同志答应我今天早6点一定叫醒我，但我有个老毛病，心头有点事就睡不好觉，自己老早醒来，只见办事处里担任夜间警卫安全的同志已经连轴转地在庭院里轻手轻脚地忙活起来。他们知道周副主席昨晚给大家讲了当前形势、政协会议，又出门会见了西安军政当局的一些官员，凌晨才上床。我内心感到我们的同志真是好。

不到9点，我们赶到西安机场。飞机已是启动待发。这飞机是周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临近闭幕的时候，要返回延安和中央商定在这次会议上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他请美国政府驻中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派用的，是一架美军C—47型运输机。机长照例立正在机舱门舷梯旁向周副主席打敬礼作报告。在他们的心目中周副主席是中国军队的上将。这上将衔是在此次“政协会议”期间为实现国共两党军事停战临时定的，因新组成的调处停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共、美三方各派一代表，都佩戴军衔，周副主席就佩戴了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因而都以周将军相称，其实他并没有穿着上将军眼。周副主席向机长答了礼登梯入舱，陆定一和我们相随而入相依落座。这个客舱实是货舱，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保温隔音设备，沿着左右舷窗各有一条金属长板凳，这便是“坐椅”，凳上有系人的安全带。因为周副主席事先向几位未曾乘过飞机的同志打过招呼，说飞越秦岭时空高寒冷要多穿衣服，所以大伙儿都穿得鼓鼓囊囊的（那会儿飞机里没有供暖设备）。只有出国参加世界工联执委会议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穿着独有的棕色皮短大衣，显得与众不同格外精神。机舱里大家不顾马达的轰鸣高兴地大

声交谈着。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不久又获得“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使人们的精神早已进入兴奋状态之中。再加昨天晚上办事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到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在延安洗这种澡简直是办不到，衣服上还有虱子），今天又遇到最放心飞行的响晴的好天气，万里无云——大家并不知道天空越晴得出奇越可能预伏着恶劣气候的危机。这一行中还有作家戈茅，有军事参谋童陆生，有这一路大家话题的中心人物、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扬眉。因此有着说不完的话。周副主席还不时地同新到重庆工作的人谈着开展工作问题，也显得很高兴。

周子健目送我们飞上天便电告延安，延安电报瞬即转知重庆中共代表团：专机于上午9时已经从西安起飞。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团成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和秘书长齐燕铭在等候带回来党中央的最后抉择。我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负责警卫的龙飞虎、朱友学等准备到白市驿机场去迎接我们。

从西安飞往四川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飞机升空之后不是大仰角飞向远方，而是一个劲儿地以大上升角度做螺旋式爬高。因为西安城南不远便是3000米左右高的秦岭山脉，它一字儿排开耸立在航线上，迫使飞机飞越它之前必须先爬升到4000—5000米以上高度。飞机油门加大，马达震耳，仰角大而倾斜，每个人不但系紧安全带，有时还拿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未曾经受过的那种寒冷直向人们的心窝袭击，许多人不由自主地颤抖不停，希望身上的棉衣能拿出点看家本领来抵挡抵挡。呼吸器官也不够用了，接着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往外倒出来才痛快，很快一个接着一个熬耐不住，大多数人倾吐出来，既是苦相又是洋相。这个困难还没渡过，忽然机身也颤抖起来，忽升忽降左右飘荡，它的金属骨架嘎嘎崩崩像在断裂。那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也像被什么魔怪变得如深夜一样漆黑，真怪吓人……好在我们早有精神准备，思想上仍不以为怕。我见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的精神一直很好，我放了心。周副主席说：飞越秦岭，海拔高，这种情形是常发生的，要克制住。他讲了要把口张开等一些方法。这时，忽然听到一阵有什么硬东西密集地砸到机身上的声音；一阵强似一阵，是遇到了冰雹。这一段时间估计全程只不过一个小时，可是感到时间是那么难熬，根据手表时间计算我们还没有到达秦岭山脉的上空，距离飞越还将需要一段时间。飞行组里那位大个子美军来到舱里。我们发现他的脸上没有笑容，表情并不轻松，和周副主席、陆定一用英语讨论着什么。他们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很严肃很紧张又很镇定，说些什么我们听不见也听不懂，看来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周副主席去到驾驶室，一会儿走来招手把李金德（周副主席的秘书）和我叫过去说：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甩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把文件箱子和公文包保管好，这是命令式的语言，坚决而简单。我们知道保障安全是第一位重要，就毫不犹豫地协同大个子美军甩我们的行李货物和箱子。那大个子是军人作风，早已转身拉开舱门，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等东西向舱门外甩。可是我们两人却带着忍痛牺牲的心情，把几箱延安梨甩出，接着是几捆给南方局同志御寒的羊皮筒子和几疋延安纺织生产的毛呢料，还有一大箱蒋管区银行20万元钞票（为延安医院购药之用）：手枪箱子，大批的个人行李一件一件甩。要知道那时候延安以及每个人在物资上和经济上是多么困难，一支香烟几个烟鬼都轮流每人深深地吸一口！甩了这么多东西并没有减轻压在我们心头的重量，而是更加重了。不言而喻，同行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必需这么干。

这次险情我过后才弄清楚，当时飞机遇到了高空冷空气团和冰雹，机翼和机身轻度结冰，自身加重，机组人员采取多种措施都没有奏效，飞机不能继续升到应达高度，不仅不能安全地飞越秦岭还很可能撞山。这次航行舱内所载货物重量很大，只有甩下货物。周副主席的今天一定要在达重庆的决心是不可更改的。他这次返回延安，党中央非常重视。1月27日那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和杨尚昆等在延安的领导人冒着数九严寒去延安机场迎接他，和他同车到枣园（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周副主席的窑洞也在这里），感谢他在“政协会议”的斗争中做出的特有贡献。现在这会儿我更明确地感到在他的肩上所压的重担，一定要战胜恶劣的政治气候，把“政协会议”的舵轮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扭转，而且要亲身去扭转！

我们的同志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虽然熬受着痛苦出了许多“洋相”，但却神情自若好像没那回事似的。这一则大家有坚强的精神，二则大家看见周副主席等领导人在自己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三则我们共产党人在美国人面前要表现出我们的国格、人格而不能出丑相。美军人员也观察出我们这群人在困难的时候人们互相照顾，在向机外甩箱子的时候，像执行命令一样毫不犹豫（美军人员可能会以为我们个人箱子里总有点值钱的东西，老实说一点没有！），再加上亲眼看见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大伙儿平等相亲而无上下等级隔阂，较之他们所见所闻国民党的官员、太太们就是另外一种人了。他们感到共产党人个个都是令人尊敬的人！

二

几十年来每一提起这次航行，各种各样的感受常常是重重叠叠地涌到我的心头，其中最深刻的是在处境危难的时刻周副主席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小扬眉背用！

这一天的天气脾气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脾气一样，你让多少步它也对你不放松，本来这飞机上除了我们十个人、一个小孩之外什么负重都甩了，心疼的东西都甩了，可以安全飞过秦岭了吧。下，不一会儿更危险的麻烦来了，气温愈来愈低，冰愈结愈厚，重量愈来愈加，机翼的冰引起气流变异致使升力骤减。而且更危险的是厚厚的冰已经阻碍飞机的升降和转向，难以进行操纵（我听说那时候美国从印度方向空运物资援助蒋介石抗战，飞机在缅甸、云南高寒地区航行失事比率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机长坚守在驾驶舱注意着险情的变化，那大个子美军又走到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跟前，俯下身予以无奈的神情报告着什么，不一会儿，周副主席到驾驶舱里去，陆定一同志充当那美军的翻译向我们宣布：外面气候恶劣，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背用降落伞。顺手给我们每人一个伞包。然后又边讲边示范：如何背法，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和带来的危害，我们的心情随着他的每一个新的要求而更加紧张一步。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头一遭。心情之紧张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人们都关心着周副主席。邓发同志面孔特别严肃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保卫好他的安全呵！”这当然是作为我的上级下达给我的命令。但是我应该怎么做我完全想不出一办法，我从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我只能下决心。大家都在忙着背伞，互相检查是不是按要求背带。周副主席叫我去帮助别人背好。背好

后，每个人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希望等来情况好转的消息。我想为什么背伞？唯一的原因是周副主席是争取今天一定到达重庆！做冒一点险的航行。美军人员都不背伞，看来这是他们的条令所规定的——机组人员不得跳伞。那大个子美军在舱里站着，看样子是在等待机长下跳伞的命令招呼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跳（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自动开伞的装置），他们的这种责任心感动着我们，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

果然乱中出错。在小扬眉身上出了错，小扬眉在哭。先前一直十分高兴的小扬眉、大伙话题中心的小扬眉，俯着身体在哭泣，可我们谁也没发现！

小扬眉是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小女儿，她是随周副主席去重庆会见即将被蒋介石释放的爸爸的。这次“政协会议”上，我党强烈提出释放被国民党迫害关押的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俘获的马法五（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人，我们出于无奈允许以放回马法五等作为他们放回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允诺在3月份恢复叶挺和廖承志的自由，但不说明日期。周副主席对叶挺的处境一向至为关切。他在蒋介石罪恶地发动皖南事变消灭我新四军军部擒我叶挺时真是怒不可遏。在1943年的一天，周副主席得知蒋介石将叶挺由贵州秘密转至湖北关押施行新的阴谋，这天正在重庆嘉陵江上一艘军船里的时候，他多方交涉终于能到船上与叶挺晤谈。我们一位同志见叶挺将军头发披肩胡须很长，好意地想为他理发，不料周副主席批评道：“这是对蒋介石的抗议！”可见他对叶挺是深为敬佩的。这次周副主席在“政协会议”闭幕之前赶回延安，百忙之中在一个晚上他把叶挺的孩子们（在延安学习）都找到身边，告诉他们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答应给你们爸爸恢复自由，我们要热烈地欢迎他，欢迎他光荣出狱，但是蒋介石不讲在哪一天释放。孩子们听了高兴万分，都偎到周伯伯身边要去迎接，周伯伯告诉他们飞机坐不下，你们派一个代表好不好。乖孩子们真听话，他们都知道爸爸最喜爱小扬眉，一致举了她。因此一路上小扬眉对我们这些陌生的叔叔自然地十分亲热，也就自然地成为我们这一行人的话题中心，我们从她身上分享到这次斗争胜利的欢乐和表达对叶挺将军的怀念。她又生得那么聪颖！有人把那交换的故事讲给她听，她摇头不信。怎么会拿大坏蛋换我爸爸呢？她知道这是玷辱，不客气地瞪大眼睛责问说：叔叔你骗人！——这真是令人潜然泪下的场景。不幸，万分的不幸，我们党未曾经受过那么重大的意外损失的一天突然来临：在叶挺将军3月份恢复自由立即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并且参加停战谈判之后，4月8日乘美军飞机飞回延安时迷了航，将军和扬眉竟在飞机撞黑茶山时和王若飞、邓发等同时遇难，他二人本来可以避免这场灾祸的，行前一日周副主席告诉他不要搭乘这架飞机返延安，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多位重要领导人一同罹难的损失，叶将军返回母亲怀抱——党中央心切，执意地乘坐了……

周副主席发觉小扬眉在哭泣，便过去坐到她的身旁抚摸她。小扬眉说：伯伯，我没有伞包！她想，没有伞包她就不能够会见到爸爸……慰暖孩子的心最为要紧，周副主席立即将自己身上的伞包解下来给小扬眉，帮她背好，叫她勇敢点，不要害怕！（后来我走过去帮忙，把我的伞包递给周副主席，美军人员又拿出伞包来）。周副主席又环视了每个人，看看是否背得妥当。在座的各位同志见此情景深有感触，过后他们便传扬出去，成为当时尽人皆知又被编入学生语文课本的在飞行历险中周恩来让伞的佳话！

美军人员是一批坚持科学态度的人，何况是马歇尔将军亲自派遣的，那位大个子美军又向周副主席报告说情况未能好转，机长说选返回西安为妥。周副主席当即同意。我们得知返航，虽然觉得怕误了周副主席的大事，但精神却从紧张的弦上松弛了下来。11点左右又在西安降落，果然机身上的冰块当啷当啷落地作响，令人咋舌！周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几位领导人向美军人员表示钦佩和感谢，说中午请诸位先生到“鸿宾楼”吃中国的名菜，美军人员受此厚遇自是高兴。周副主席便商量着说：下午的飞行可以先超越秦岭地区结冰冷空气层的高度，5000米甚至高些再冲过秦岭。机长说是可以做到的，但抱歉这个高度将严重缺氧，机上携带氧气很少。周副主席说缺氧时间很短就下降了，可以克服。于是决定下午两点起飞。

我们大家登上一辆西安美军空军的中型吉普车直奔“鸿宾楼”大饭庄。周副主席要我打电话找周子健处长立刻来，他赶到这里，又是惊讶又是庆幸。他按照周副主席的交代以他的名义宴请美军其余同志一律便饭。周副主席特意交代：很多人呕吐了，你买些天津萝卜（那时名称不叫心里美），大家都感到周副主席待人理事真是想得周全。于是互相关照午餐少吃点，晕机时呕吐会轻些。

周子健处长是位出名的精明的干才，他懂得周副主席总是利用机会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了解情况，所以席间安排得周副主席很满意，饭后周副主席并不稍憩，他走到美军人员休息的房间里去看望他们，他们以军人的习惯站起来衷心地感谢周将军的款待，说今天能够脱离险境是上帝保佑你将军！周副主席说：完全靠你们有高超的技术和艰苦的努力！我要感谢你们！美军人员说：下午一定成功，请将军放心！周副主席出来向我们交代：下午要增加高度，氧气更稀薄，气温更冷，首先要增强信心！他把困难和要求都说在前头。

谁料下午在渡过秦岭之险以后，雾都重庆的上空又出现了新的妖魔呢？

三

过午两点，飞机带着人们的信心轻快地腾空而起，不论它怎么仰怎么旋怎么冷怎么嘎嘣嘎嘣响都比上午好过得多，时间也在手表针上加快了频率。有人向下俯瞰着说下面的山就是秦岭，我们向下看它竟是那么低那么小。有人摇着头说不是不是，那个小山它如何能把飞机挡住飞不过去？！忽然窗外是白茫茫无边无际的云海，这是神话里的奇景，我们都是头一次欣赏，个个十分高兴！然而，严酷的现实也在面前：冷，奇冷，比上午更冷，我过雪山草地也没有遇到这样冷，很担心周副主席冻病，今晚和明天要开会，他可不能生病。我看到他脸色不好，呼吸不对头，但没有衣物为他加，我那时也不懂得给他吸氧气，只希望别人不要打扰他，多休息会儿。机舱里被奇寒的低温统治得十分寂静，无人说话，如果继续这么冷下去，我担心大家真的受不了。

忽然，一句话驱走了寒冷，苏醒了沉寂。机长含笑走来向周将军报告某时某分安全飞越秦岭山脉，高度即将降低。人们立刻活跃起来，有人说发明了飞机工具的今天到你们四川（我是四川人）还这么困难，怪不得古人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陆定一同志是位常常发点幽默的人，他说：“我不管蜀道难不难，我们是飞过来了，平平安安

地飞过来了。”他的话语中好像还包含着当年长征中在四川一带胜利地过大渡河、越夹金山、涉草地、破腊子口的回忆，有人说我们今天可以写一篇“新蜀道难”，仍然可以写“嗷呼兮，危乎高哉！”有人插话说山高倒不必害怕，只是这样寒冷真叫人受不了，苏东坡知道高空寒冷，他在诗词中说天上宫阙高处不胜寒，所以他就不乘风上天。

依航线规定，不能从西安直飞重庆，而要弯道成都，在成都天河机场降落加油。从天河机场起飞以后，我们便解除了一切负担，做下飞机的准备了。

飞了两个小时，飞机在缓缓地降低高度，四周云雾浓密，还降着雨雪。时光已是傍晚，有些昏暗，又冷又潮湿。重庆四季尤其冬春多雾，人称“雾都”。大个子美军站出来连说带比划通知准备降落，系好安全带。

已经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上空。这机场位置在重庆市歌乐山西南 50 公里，三面环山一面是丘陵。美国空勤人员报告说外面降水、浓雾，能见度低，还没有发现机场，正在和机场塔台调度人员联系。我们听见飞机放下起落架向下滑，可是又拉起头来向上升，原来是他们作穿云低飞寻找机场，没有发现。周副主席到驾驶舱去询问情况，要求他们沉着冷静以做到安全降落。机长说这个机场是少有的降落难度大的机场，但是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和各种目标，只要能够判明几个就有安全降落条件。这些美国人从来比较自信。飞机再做一次穿云下降试探，仍是落空。这时塔台指挥说不同意降落，应该返回成都。机长认为那将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自信依靠经验和技術是可以安全降落的。我们的心情又同上午那样紧张起来，谁都没有说话。不知是谁说起俏皮话来：这回没有箱子行李往外甩了。周副主席主席告诉我们一定要镇定，镇定！我这时的思绪是复杂的，我想我们本来不应该有这次航行，不然就什么风险也不会遇到，就是为了在“政协会议”上向国民党再作一些重大让步，才掐着日子去延安，又赶着日子今天一定要回重庆。这些步本来就不应当让：日本打哪里，他丢哪里，汉奸政权建到哪里；共产党领导抗日人民收复失地建了抗日政权，那时他骂抗战有罪，今日他说民主非法。讲道理他没有，论打仗他又在上党、邯郸全军覆没，可是这会儿在“政协会议”上我们还要表示和平诚意要让，我们何意不诚何处该让呢？！硬是怪了！真是事有凑巧，我们的飞行联络不知在哪个环节上又中断了，造成重庆和延安都不知道我们飞机的位置！重庆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龙飞虎和段廷英带领车队到白市驿机场等候几个小时，眼看过了下午，雨雪交加，大雾弥漫，机场又说飞机今天不能降落，他们便回去向董老、邓大姐报告说没有接到人。延安的电报却说飞机自西安按时起飞，早该抵达重庆了，为何仍不见踪影？互相查询十分焦心！尤其是坐落在重庆中山三路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院子里的人更急得要命，虽然这时节正是数九寒天又冷又潮，许多人还是急得冒汗！我党“政协”代表董必武、邓颖超等早在等候，关心此行的民主人士、朋友也在打听延安中共中央有什么新精神……

天暗得很快，飞机的客舱里只有两只灯泡发着昏黄的光。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降落！周副主席相信美军人员的航行本领，他又去到驾驶舱里，这皇他的习惯工作方式，“事必躬亲”。飞机在盘旋中忽然发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目标，他们不约而同地互相关照一声：机场！希望之门就在眼前，决定试降——他们并没简单地决定着陆，再次试降时钻下云雾发现了跑道。当我正在担心可能发生事故而祈望千万不能发生事故的当儿，飞机下部忽然猛的一撞，崩！经验又从脑子里反射出来：着陆了。在跑道中段着陆了，可能因为

负荷很轻，它很快停住，幸而没有冲出跑道。一块石头落了地，每个人的心落了地。我们高兴得要跳起来，可是安全带把身体系在坐凳上了。飞机突然轰鸣之后开始滑行，雨雪沙沙地打着舱壳和我们的笑语声反而和谐起来。我们走出舱门。周副主席脚一踏地情不自禁地对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反射地哈哈大笑。我随他这么多年从没有见他这样笑过，往后几十年我也没有见他这么笑过……雨雪向脸上身上纷纷落下，刚刚有声，它在我们心目中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可惜，虽然它曾把我们考验得够呛。

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我们大家一起热情地和机组人员握手，祝贺他们成功的飞行，赞扬他们高超的技术，慰问他们的辛苦！——虽然我们大家多数人只能用中国话说，但人心是相通的。那机长对周副主席说，能为周将军服务而感到荣幸。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会保佑您。显然他们对周副主席有了深刻的印象。

我出了舱门直奔塔台附近去找汽车，没有，到处没有。我想：龙飞虎怎么会不在此地迎接？！向代表团驻地打电话，打不通。机场没有候机室，周副主席他们全挤在一个四周没有遮拦的布篷下躲避雪雨。折腾一天，又饿又冷。今天运气不好，实在急人。这时周副主席见我们急了，他反而不急，叫人一面继续打电话要车，一面叫我搭坐美军入城的货车回代表团联系，这样龙飞虎、段廷英他们才又赶回机场。雨雪越来越大，回城时歌乐山的路面上积雪已有半尺多厚，路迹不辨，龙飞虎、朱友学等不得不拿着手电筒步行引路。回到中山三路驻地已近晚上 10 点钟了。

汽车进入代表团院子大门，马达的声音把等候已久的人们吸引着跑来。周副主席没有来得及也许他不必要讲今天的险遇，他向董老他们打了招呼，就说中央都已同意，董老说吃罢饭就开会。晚餐草草吃毕，冰冷的会议室里灯光久久地亮着。

第二天将是中国在八年抗战胜利大喜后又一个大喜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一天的奔波，奔波的一天！没料想在通往和平、民主的大道上，在地面、在空中横亘着一道立体障碍！

今天一定要到达，果然到达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历史决定它必然一个接着一个的不可阻遏的到来！

（崇横整理）

万隆之行——周恩来不避艰险参加亚非会议纪实

成元功

1955年，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那次万隆之行，到现在虽然已有近40年了，但那紧张和惊险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叫人难以忘怀，叫人惊心动魄。

那次万隆之行，对周总理来说，真可谓不避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那一次，退踞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了大批特务杀手，妄图乘周总理前往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那一次，真可谓荆棘遍布，险象环生，若当时我们的防范措施不力，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两次重要警报

1955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因开会地址设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故又称“万隆会议”。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五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们当然要参加。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会议定于4月18日召开，会期是一星期。

正当我们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3月初我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

情况十分严峻！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会。去，固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可以在亚非国家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决定去之后，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的问题。先是周总理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

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时从香港启德机场启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察，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正当我们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我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

我们刚要离开机场候机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同志们都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总理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周总理一行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大姐，说他虽不坐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同志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向艾惕恩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恩：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恩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我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我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

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我们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周总理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总理去仰光之前和到仰光之后，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是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突然病倒；一是参加缅甸的泼水节。

周总理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我两个人。姚力同志已经打前站去了。人手本来就紧张，不料这时何谦同志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真是行船又遇顶头风！我正着急的时候，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不然，我真担心我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鉴于周总理和在昆明的代表团人员4月14日即启程去仰光，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副部长和李福坤同志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李福坤同志做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将就穿用何谦同志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了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总理的安全，邓大姐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总理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他们说：

“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大姐，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谏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作者），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总理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总理又找留在昆明的同志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告诉邓大姐：“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作者）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总理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时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我和李福坤同志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迎进客厅，我和李福坤同志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钟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我和李福坤同志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我们。我们一看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我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我们说什么服务员不懂，服务员说什么我们也不懂。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我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同志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同志把情况一说，我们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浦寿昌同志他们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我们到达缅甸那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材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和李福坤同志唯恐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我们一共参加了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我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文明，他们只是用小碗向我们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我们身上

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我们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我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我们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我和李福坤同志，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我和李福坤同志对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所去的五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飞机迫降新加坡机场

因为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我们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总理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总理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总理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我们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总理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总理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我和李福坤同志，随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我们招手。我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

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我们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们也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同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我和李福坤同志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同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我们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我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我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我们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总理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我们失去了 11 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廖承志等同志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我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我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同志守在外边，我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同志也才回到接待室来。我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 2 点 45 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三个钟头，于下午 5 点 30 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甚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我们不由又想起了那 11 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我们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总理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总理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十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我们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我们已经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我们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他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我们在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副总理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总理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二同志在周总理前边走，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这是康矛召同志对我讲的）。

同时，我们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总理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我们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我们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

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我们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 2000 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总理，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5 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总理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 8 名宪兵和 8 名机动警察、3 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总理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 50 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同志说，听说给周总理开车，当时有四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当局、我代表团内部，以及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和李福坤同志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总理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总理的身后，情况复杂时，我们则干脆把周总理包在中间。这次大使馆给我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我们的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总理也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总理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 8 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总理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 8 点一直争到下午 6 点半（中午仅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

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总理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总理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碓达之助,10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七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七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总理,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七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总理,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我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七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总理的嘱托在我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我才告诉邓大姐。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事实正像那位开始对我并不友好的先生讲的,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总理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不,是在全世界飘扬!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

京后，于 5 月 9 日和 5 月 15 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同志，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 18 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 5 月 18 日到 6 月 1 日，他们先后传讯了 88 人，其中拘留了 19 人，以

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 8 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 12 时 15 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 6 时 30 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 5 月 18 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阜成门车险——周恩来乘车遇险纪实

成元功

周恩来总理工作日程安排一向很紧，常常是放下这个就是那个，很少有间歇时间，因此，他乘车也要求快，有一次从中南海西花厅到西苑机场，竟快到只花了13分钟。他之所以要求快，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上。

周恩来总理可说是国家领导人中乘车行驶里程最多的人，他启程的时间晚，又必须准点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快而且选行最佳路线。在那时北京行车秩序不良的情况下，每次出门我们警卫人员也每每为之担心，生怕会遇到不测，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座车从来也未出过大小事。

然而，险情还是未能避免，我这篇文章记述的险情就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们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我是周总理的卫士长。6月15日下午我一上班，照例先看了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看上面记了些什么活动。周恩来总理一向有这么个习惯，就是把一天的日程安排头一天写在台历上。我一看上面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了，他两点半要到钓鱼台，然后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于是，我便去找值班秘书了解全过程的情况。

为了事先有个精神准备，不致临时慌乱，我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随手我用电话通知了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他们早已得知这次大会的安排情况。我又通知总理的汽车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两点把汽车开到西花厅，张树迎在准备必需的东西。

杨金明准时把汽车开到了西花厅前院。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停在树荫下避开烈日的炙烤（那时车里没有冷气设备），而是把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因为正下小雨，为的是让周总理从后院办公室走到这里能少淋点。他习惯地到我们值班室露了一下面，一则表示他已按时到位，二则看我们还有什么对他要交代的。我向他谈了这次活动的有关过程，他便擦车去了。这也是他的老习惯，每逢下雨或是车上有灰尘，他总要擦干净，保持车身的清洁。

这是一辆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3 C—115型防弹车。总理日常活动一般都是乘坐苏制吉姆—3 M。因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重大国事活动，所以调用这辆吉斯车。这种车是按莫斯科气候寒冷条件设计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难适应，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老杨手里从来没出过一点小问题。

出行之前，我先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去看了一下，一则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比如他没有剃须而又没有时间剃，我们就得把热水瓶、毛巾、剃须刀带上，以便他在行车途中剃须；二则天正下雨，路上不一定好走，外事活动又不能迟到，想催他提前出发。

我走进办公室时，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听到我去，他的眼睛从老花镜框上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闹钟，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没有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总是把富裕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见他不动，反正我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等候。

往常，下午西花厅前院总要停很多车，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排着队来找总理谈话和汇报工作。今天下午却只有一辆车，这就是准备乘坐去钓鱼台的吉斯 3 C—115。院里很清静，从与西花厅一墙之隔的府右街，传来的自行车铃声、汽车的汽笛声、交通民警的呼叫声，比往日显得更加清楚和嘈杂。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重量非常大，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我向门卫哨点点头，他会意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这时，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往常，遇到汽车自行车便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过去，今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情愿相让，行人也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坐在司机座上的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道路情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驳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鸣笛。我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尽管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但我们仍旧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吉斯 3 C—115 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城门城楼，出了阜城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档，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 3 C—115 立即来了个 180 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或是“有惊无险”。

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是因为“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张皇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本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

我跟随周总理多年，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车险。总理也只是在苏联遇到过一次。那次，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一道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总理的座车沿着马路中间只准苏联主要领导人车辆通过的“中央线”行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来一辆汽车，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刚过去，没有撞上，却撞了陈云、李富春同志的车，弄了个车损人伤。万没有想到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这一次。

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我巴不得狠狠去处理一下那个卡车司机，恰好周总理又作了这样的指示，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办。”总理接着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我和张树迎也问：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并告诉他可以开慢一点。杨金明嘴里低声咕噜了句什么，又照旧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因我们警卫人员有一种职业病，遇到问题，往往会先人为主觉得对方是冲着总理撞来的。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了，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自己则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

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特别是将会不会痛头更大，不玩一玩手就发痒。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班长也知道他给车加油是假，想开着玩玩是真，又不好当面给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他还从来没有开着车上过街，他决定试试，于是就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他说：幸亏主车司机处理及时、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要是总理的车出了大祸，我也得背上铺盖卷自动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又说：这次也太险了，吉斯车车身长，约6米，车身重，约5吨，方向盘很不灵便，又遇上下雨，地面有水，车速又快，没出事真是万幸。最后向我们强调一定要有安全措施，要沿布设的专勤路线走，不能老图快。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厂公司许步宁经理很快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公安部的负责人和我接待了他们。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档时间，把许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恼，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此事的。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煞车的措施。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煞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也许是电车公司许经理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过的缘故，不然，他是决不会让我们再到电车公司去了解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向来也不直接处理各单位的事务。

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以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他说：北京的交

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曾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劳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前不久，我在整理撰写本文的时候，又去访问了原北京市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当时的当事者张兴辰谈谈，原电车一厂厂长张维仁向我讲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断电源就伏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未能救活。我听了不由一怔：怎么这回又是他？又是违反制度和纪律……周总理如果尚在，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也不知他又该说些什么。

最真挚的友谊——周恩来冒险访加纳纪实

赵桂来

周恩来总理一向关心、同情和支持亚、非、拉美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为了支持他们，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有时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1964年1月，周总理的加纳之行，就是其中的一例。

—

周总理这次访问加纳，是在我国经济经过两年的调整，克服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其全部专家所带来的严重困难之后进行的。

1963年12月13日，周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包租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波罗的海号，从我国南方城市昆明出发，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亚、非、欧国家。加纳就是周总理这次访问的14个亚、非、欧国家之一。

周总理这次亚、非、欧14国之行程，前后历时72天，行程10.8万公里，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周总理第一次访问这么多的国家，也是第一次访问非洲。周总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东道国政府和人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周总理走到哪里，哪里便会万人空巷，倾城而出。

12月13日，周总理从昆明起飞后，首先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着又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31日飞抵欧洲巴尔干半岛，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按原定计划，周总理在阿尔巴尼亚停留10天，然后再飞往非洲，继续进行访问到非洲继续访问的第一站，便是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加纳共和国。这是1963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在开罗答记者问中公开宣布了的，而且在周总理飞抵地拉那的第二天，即1964年的1月1日，新华社和加纳通讯社同时括发了中国政府总理即将访问加纳和其他非洲国家的消息。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周总理即将前往访问加纳之际，突然有消息传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不幸遇刺。这一消息，是周总理在阿尔巴尼亚结束了一天的访问活动回到住处这后获悉的。这一消息有如一次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不仅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上上下下引起了密切关注，而且在机组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关于恩克鲁玛的遇刺事件，在非洲颇有影响的合众社和法新社在其1月4日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1964年1月2日中午，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离开他在总统府的办公室时，意外地发现门卫哨兵在扳弄枪机，他并未在意。谁知这名哨兵却向他连开五枪，一名随身警卫被击倒。恩克鲁玛灵机一动，应声扑倒在地，好像身负重伤，凶手们以为达到了目的。闻声赶来捉拿凶手的其他卫兵到达时，恩克鲁玛一跃而起，与凶手展开搏斗，两人扭抱在一起，在地上滚打，直至其他卫兵上前将凶手制眼。在搏斗中，总统的面部、臂部受了轻伤……

随后而来的消息表明，刺杀恩克鲁玛的凶手叫尼科拉斯·克韦姆·阿梅特韦。此人于1958年10月加入加纳警察部队，在进入总统府担任门卫之前，曾在多个警察局任职。

这究竟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加纳国内某些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是门卫哨兵尼科拉斯·克韦姆·阿梅特韦的个人行动，还是有什么深刻的背景？一时难以弄清。

在此情况下，是推迟、取消这次访问，还是如期进行，便成了人们的谈论的中心话题，就连一些通讯社也猜测纷坛。

周总理推迟或取消对加纳的访问，也不是不可以。这种做法，在国际交往中并不乏先例，往访国也能理解，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但周总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密切关注着加纳时局的发展。

1月6日，他给阿克拉发了一份电报，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表示慰问，之后，又打电报给我驻加纳使馆，向黄华大使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并就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还是不去的问题，征求恩克鲁玛总统的意见。

党中央、毛主席对周总理这次出访极为关心。特别是加纳总统遇刺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毛主席更是放心不下，不时把电报打到地拉那，询问情况，并要求将代表团的行止，随时报告国内。

邓大姐也很不放心，她打电报给代表团工作人员，嘱咐他们“一到目的地就打电报回来”。

二

周总理在地拉那一面进行繁忙的国事访问活动，一面关注着恩克鲁玛总统遇刺事件发生后加纳的时局，看能不能在结束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后按期去加纳首都阿克拉。

当时的国际形势虽然有时出现某种逆流，但总的是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已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去支持中间地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周总理这次亚、非、欧之行，目的就在于在亚、非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中，广泛结交和争取朋友，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

当然，在当前加纳时局还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去阿克拉访问，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及代表团的同志们衡量了一下利弊，觉得去要比不去好。去，固然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可以说明中国对朋友是真诚的，可以信赖的，从而可以赢得更多的朋友，关于这一点，1955年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去参加那次会议，也是很危险的，会上有一些国家代表的挑衅，会外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布置搞暗杀活动。周总理去后，不但给亚非国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和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交了朋友。

加纳警察部门虽然出了问题，但从我驻加纳使馆提供的情况看，加纳的武装部队对恩克鲁玛总统还是支持的。

加纳在独立前，武装部队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军官一律都是英国人，受英国人的指挥。1957年，加纳独立后，英国人拒绝交出指挥权，直到1961

年，部队图谋颠覆加纳政府的阴谋被发现，英国人参谋长被遣送回国，恩克鲁玛才接过武装部队的指挥权，并任命和提拔了一大批加纳人为军官。1月2日，门卫刺杀恩克鲁玛的事件发生后，1月8日，恩克鲁玛会见了国防部参谋长、副参谋长、各旅旅长和海空军司令及其高级军官，他们一致表示支持恩克鲁玛和现政府。正是由于武装部队的支持，所以虽然发生了门卫谋刺总统的事件，首都阿克拉的局势依然平静如常，全国各地也未发现有骚乱的迹象。

基于以上情况，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代表团的同志们商量后，经报党中央同意，决定还是去，而且派当时随行的外交部黄镇副部长先坐包租的荷兰飞机前往，征求恩克鲁玛总统的意见。临行前，周总理对黄镇副部长说：“你先去吧，到加纳后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打电报联系。”

据黄镇副部长回忆，他坐一架荷兰飞机，离开地拉那先到突尼斯，与突尼斯谈了周总理租用的专机在突尼斯机场作短暂停留以便加油的问题，然后飞往加纳首都阿克拉。

到阿克拉后，黄镇副部长和黄华大使一起去拜会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当时，恩克鲁玛已从总统府搬到了沿海一座戒备森严名叫克里斯兴的城堡里。这座坚固的城堡，原来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早年作为掠夺加纳的黄金和贩卖加纳人口的基地而建造的。像这样的城堡，在全加纳有40多座。这座城堡离首都阿克拉最近，加纳独立前，英国总督府就设在这里。

黄镇副部长和黄华大使去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时，恩克鲁玛总统的创伤尚未完全痊愈，脸上贴着纱布，头上缠着绷带，面色憔悴。他们首先代表周总理对恩克鲁玛总统进行了慰问，接着与恩克鲁玛总统商量周总理来访的具体安排，并转达了周总理的建议：考虑到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和加纳目前的困难处境，这次访问可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到城堡外面举行什么仪式，以及会谈和宴会。恩克鲁玛总统在遭到枪击之后，本来作了周总理可能取消这次访问的打算，没想到周总理不但没取消，而且考虑他和加纳目前的处境，免掉一切应有礼仪，这使他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因为周总理如期来访，不仅是对他本人的最好的支持，也是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的尊重，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因此，他对周总理的建议，不但完全接受，而且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

当负责代表团安全的李树槐把代表团将如期访问加纳的决定通知给机组后，在机组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政府总理在加纳总统遇刺的情况下仍然如期前往加纳进行访问感到新奇，感到了了不起，另一方面为他们能继续为中国代表团出访服务到底，感到兴奋和骄傲。

中国代表团包租的这两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包括两名空中小姐在内，一共有18名空勤人员，他们全都受过严格的训练，服务水平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曾到世界许多国家，真可谓见多识广，但到中国来为中国代表团出访服务，这还是第一次。

也正因为是第一次，曾经闹出过一些笑话。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接到公司的指令刚刚飞抵昆明的时候发生的。当时，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昆明饭店订了两桌饭菜宴请他们，为他们接风洗尘。当他

们进入宴会厅的时候，大家不由地一怔。只见他们一个个身背大包，手提小袋，鼓鼓囊囊，甚至连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较贵重一点物品，通通带到了身边，就好像一个个出征的战士，带上了自己的全副武装。但俞沛文司长、李树槐副局长和在场的有关人员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带在身边，是不放心，怕留在房间里会丢失。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头一次来中国，根本不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不知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当时并非天方夜谭。莫说在设备、服务都堪称一流的昆明饭店，就是在一家普通的旅社，也不会有旅客丢失东西的现象发生。当时，俞沛文司长、李树槐副局长和在场的有关人员，只是互相会心地笑了笑，谁也没有说什么，等宴会过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才向他们说明。

通过接触，机组全部空勤人员不但对中国的治安状况留有好的印象，每逢外出不再大包小袋都带在身边，甚至连黄金首饰和美钞也都放心地留在房间里，而且对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特别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感到可亲可敬，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架子。

因此，当代表团于1963年12月31日飞抵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之后，按荷航机组人员每个月轮换一次的规定，他们的轮换期已经到了，但他们谁也不愿离开。他们推举机长A先生来找负责安全的李树槐副局长，向李副局长表示，机组全体人员都愿意为中国总理周恩来、陈毅元帅出访继续服务到底”，希望中国方面能满足他们这上愿望。并表示荷航方面他们可以去说。

当时考虑到机组人员已离家一个月，各有各的困难，特别是C先生和S小姐。C先生的夫人身怀六甲，下个月就要临产，需要C先生在身旁照料。而S小姐，她的男友赴美多时未归，几经周折和经过漫长的期待，双方才取得在S小姐完成在我国的飞行任务后，即返回结婚，不进行轮换，就意味着要推迟婚期，俞沛文司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一再向他们说明，希望他们回去，但他们坚持留下来。S小姐甚至说：“我已与男友通了电话，请相信我们。”对此，李树槐副局长生前曾不止一次地慨叹：“想不到这些异国朋友，对周总理、对新中国有这样的感情。”

四

从阿尔巴尼亚直飞位于非洲西海岸几内亚湾的加纳，大约有1万里，中间需要在突尼斯机场加油。

当时突尼斯尚未承认中国，在诸多外交政策上对我时有非难，亚非舆论公认突尼斯为西方大国在非洲利益的代表。在中国代表团访问的日程表上也没有突尼斯。周总理乘坐的专机，也只是预定在突尼斯机场停留半天，加油后再飞往加纳。

谁知、周总理的专机飞到突尼斯，在机场一降落就受到了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布尔吉巴总统的欢迎。布尔吉巴总统这样盛情欢迎周总理，看起来事出偶然，实有其必然因由。因为周总理在访问阿尔巴尼亚之前，首先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使布尔吉巴总统对中国的内外政策有了新的了解。特别是现在，加纳总统遇刺事件尚未完全平复，周总理甘冒风险往访，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但震动了非洲，也震动了世界，布尔吉巴总统自然不能无动于衷。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应布尔吉巴总统的邀请，在突尼斯紧张地进

行了两天的访问之后，于1964年1月10日夜间接别了布尔吉巴总统，从突尼斯机场乘荷航飞机起飞，经过8个多小时的航行，飞越撒哈拉大沙漠，于次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8时，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机场徐徐降落。

这天，阿克拉这座林木森森、一片葱翠的热带城市，到处悬灯结彩，中国和加纳国旗迎风招展，一片节日的气氛。这天，为欢迎冒险来访的中国贵宾，全城市民男女老少几乎倾城出动，从郊外机场到周总理下榻的总统府国家大厦，道路两旁到处挤满身着多彩民族长袍的人群，他们在鼓声中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与早已等候在机场迎接的加纳外交部长博齐约和政府各部部长，以及部队高级将领，一一握手、拥抱。一阵寒暄过后，便分别乘车进城去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下榻的总统府国家大厦，沿途，车过之处，群众挥舞着中加两国国旗，有些人手里还举着恩克鲁玛总统和周总理的画像，不断高呼：“自由，自由！”“埃库（欢迎）周恩来！埃库周恩来！”

周总理在国家大厦下榻之后，当晚便和陈毅副总理乘车到克里斯兴城堡，拜会了恩克鲁玛总统，并转交了毛泽东主席写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赠送了礼物。恩克鲁玛总统对在目前情况下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如期来访，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双方举行了几小时的会谈。之后，恩克鲁玛总统又在克里斯兴城堡设宴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洗尘。

第二天，加纳各大报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毛主席致恩克鲁玛总统慰问信的全文，并就毛主席的慰问信和周总理来访配发了社论和评论。社论和评论一致称，中国是加纳和非洲的“真正朋友”。

加纳，原名黄金海岸，以盛产黄金而闻名，15世纪，葡萄牙、丹麦、大英帝国等相继入侵，大肆掠夺这里的黄金、象牙，贩卖这里的土著男女，使加纳人民受尽了剥削、掠夺之苦。经过多年的斗争，1957年终于获得独立。独立后，恩克鲁玛任政府首任总理，1960年加纳改为共和国后，又担任首任总统。

恩克鲁玛出身于小手工作坊金匠家庭，早年留学于英美，并参加了民族独立斗争，曾任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几次被捕入狱。任总统之后，由于恩克鲁玛对内倡导发展生产、废除封建，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觉醒的非洲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被誉为“非洲独立的旗帜”，因而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忌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曾屡次对恩克鲁玛下毒手，1962年8月就搞过一次，但被挫败了，发生在1月2日的这次谋刺，就是其阴谋的继续。

1月12日，恩克鲁玛为周总理来访，在克里斯兴城堡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恩克鲁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欢迎词，对中国在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表示钦佩，并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指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争取世界和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地球上被消灭之前，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周总理致了答词。在答词中，周总理首先对恩克鲁玛总统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在指出中加两国过去都有过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压榨的命运，今天又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后，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席间，宾主为中加两国的友谊频频干杯。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加纳停留了5天，1月15日，周总理在总统居住的克里斯兴城堡举行了告别宴会，恩克鲁玛总统和夫人应邀出席，宴会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恩克鲁玛的荐引下，会见了恩克鲁玛的夫人，并一起合影留念。之后，在恩克鲁玛及其夫人的陪同下，还看望了他们出生才两个月的婴儿。周总理和恩克鲁玛还赛了一场乒乓球，陈毅元帅是这次乒乓球赛的裁判。当时曾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

对周总理访问加纳，世界舆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日本广播协会从非洲发出的一篇专稿称“周恩来总理的笑容，给加纳政府和人民以好感”，周“这次出访加纳，可以说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法国一专栏作家在文章中说：周恩来“这个人亲切而有礼貌的态度，（加纳人）不会无动于衷的，这个人的一切都对一切都感兴趣，但不要求任何东西。”英国的《论坛》周刊，则把周总理此行与赫鲁晓夫不久之前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对比，说“周恩来以一种翩翩的谦逊风度，以对他所发现的东西表示一致而不去表示异议的做法，巧妙地赢得了友谊”。

五

周总理这次亚、非、欧14国之行程，特别是非洲10国之行程，在刚刚觉醒的非洲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不但赢得了加纳、突尼斯等10国的信赖，而且赢得了非洲其他国家的信赖。他们从周总理的访问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非常尊重他们，只有中国才是他们最可信赖的真正的朋友。就在这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但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今贝宁）等国，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六

周总理结束亚、非、欧14国之行程，回到昆明已是阳春3月了。昆明春暖花开，到处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生机勃勃。至此，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机组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他们在中国的飞行任务。为了答谢他们，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在昆明饭店为他们举行了宴会。席上，宾主欢聚一堂，频频举杯，无拘无束，亲若家人。

机组中有的已飞行20余载，曾到过许多国家，为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和买办大亨服过务。他们说，在这些人中“从没有见过周总理、陈毅元帅这样的伟人”。E先生眼睛湿润，激动他说：在我见过的那些人中，“没有看到有哪一位像周总理、陈毅元帅那样，尊重、爱护和关心我们这些‘天上的车夫’”。并表示愿意继续为新中国客人服务，期望能有机会再到中国来。

他们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关照让他们游览昆明，并到北京看了世界奇迹——雄伟的长城，非常满意。当陈毅副总理征求他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时，他们提出要“与周总理、陈毅元帅留张影”。陈毅副总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当工作人员把印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笔签名的、与机组全体人员合

影的大幅黑白照片，送到他们手上时，机长 A 先生非常激动，表示他回国后一定要买一个最好的镜框镶起来，挂在客厅里，让亲朋好友都知道，他“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总理周恩来、陈毅元帅开过两个月的飞机”。S 小姐红着脸兴奋地说：“只要把照片拿给我的那一位一看，我相信，他对我推迟婚期肯定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几年之后，当我国一位老外交家，在非洲搭乘一架荷航客机时（当时我国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在国际上形象很糟），一位机组人员认出了他是中国的外交官，便主动过来与他搭话。他说，过去“我给周总理开过飞机，为中国代表团服过务……”言谈之中，表现出他对那一段非常自豪，对周总理非常崇敬。

后记

我们几个人都是做警卫工作的，都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周总理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很早就想把我们接触和了解到的情况都写出来，尤其是与我们警卫工作有关的一些事情。而与我们警卫工作有关的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我们亲眼目睹和亲耳听到的周总理多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意。

1988年4月16日，成元功同志把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邓大姐很赞同。她鼓励我们说：“很好，你们写这方面的文章很有意义。”又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重大问题都是派恩来同志去处理的，结果是好的。这方面的东西，也只有你们才能写得出来。但要实事求是。”

得到邓大姐的同意和鼓励之后，我们在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八局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写作小组，便着手进行，开始，我们觉得不是大难，只要到周总理过去遇险的地方考察一下，找一找当时的一些见证人，查阅一下当时的有关报刊和档案资料，也就成了。等一进行，才感到远非原来所预想的那么简单，别的不说，单是找当时的见证人就相当困难。因为有一些人早已牺牲或去世，有一些人因时代变迁，工作流动，一时查不到去向，有一些人虽然去向清楚，但也在天南海北。然而又非见不可，不见则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实情况，写出的东西也不会像邓大姐所要求的“实事求是”，不会扎实。

困难虽然大，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走访了广东、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一些省份。这些省的党史部门都很重视，不但热情接待，而且积极支持，帮我们查线索，寻找当时的见证人。而我们见到的每一个见证人，也都很热情，积极地向我们提供当时的情况和细节。除了上述各省的党史部门以外，我们还拜访了另外一些知情人和见证人，其中有王炳南、郭洪涛、王鹤寿、孔原、赵苍壁、于桑、孔石泉、黄镇、叶子龙、董小鹏、罗青长、熊向晖、浦寿昌等几十位同志。他们虽然很忙，有的人身体不好，但也都给了我们以热情、诚挚的帮助。

在此，还应当提一下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外交部档案馆的有关同志，他们也都给了关心和大力支持。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毛崇横同志积极组织本书史料的核实，他年近古稀，亲赴延安调查，还为一些文稿作了文字加工。群众出版社副主编王兰升同志为本书的编写、文字整理作了很多工作。罗青长同志在百忙中还为本书写了序。张震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在此，谨向所有关怀和支持过我们写作的部门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所记述的事件年代久远，加之我们的水平所限，难免有不足或不妥之处，希望看到本书的读者，特别是了解本书所述事件的同志，给予指正。

成元功 赵桂来
1993年7月28日

